

785531-35

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

林家有

河南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

林 家 有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研究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的书，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辛亥革命前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并通过对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详细叙述，论证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及这次革命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

林家有

责任编辑 庄 昭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印张 125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1105·38 定价0.56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清政府的投降卖国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10
一、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清政府的投降卖国	10
二、少数民族特别深重的灾难	13
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反满”民族 主义纲领的实质	39
第二章 武昌起义前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奴 役的英勇斗争	56
一、东北各族人民反抗俄、日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56
二、藏族人民抗击英、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	62
三、云、贵、川各族人民抗击英帝国主义武装进犯和反对 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71
第三章 武昌起义前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斗争的 新高涨	82
一、同盟会建立前各族人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	82
二、同盟会建立后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兴起	92
第四章 各族人民热烈响应武昌起义	108
一、各民族反动上层的垂死挣扎	108

二、各族人民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参加反清斗争·····	115
第五章 武昌起义后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134
一、东北和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粉碎沙俄策划外蒙古、呼伦贝尔“独立”阴谋的斗争·····	134
二、新疆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和分裂活动的英勇斗争·····	146
三、西藏各族人民抗击英、俄侵略和维护领土主权的斗争·····	153
第六章 台湾高山族等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日本殖民主 义野蛮统治的斗争·····	158
第七章 少数民族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辛亥革 命对少数民族的深远影响·····	167
一、少数民族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67
二、辛亥革命对满族历史所发生的深远影响·····	173
三、辛亥革命失败后各族人民的新灾难和继续奋斗·····	179
结 语·····	191
后 记·····	201

绪 论

一 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①“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②我国各族人民在创造和发展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共同缔造了统一的祖国，创造了祖国的历史。

今天在我国这个伟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里，除了人口最多的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难、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崩龙、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基诺、赫哲、门巴、珞巴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这些兄弟民族的人口虽然不多，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但分布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全国有70%的县市，都有

^{①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横排合订本（以下凡用此书者皆同），第585页、584页。

两个以上的民族，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团结聚居的大统一局面。许多兄弟民族的大部分集中居住在边远地区，长期和汉族密切联系，对开发边疆，创造文化和巩固国防，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族不论大小，都有长处和短处。中华民族的各民族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珍贵的文化遗产，对祖国的历史都作出过贡献。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中国广大的疆域，不是那一个民族独自开发出来的，而是许多已经消失的和现在正在发展着的各民族共同努力，经长期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开发出来的。东夷族最先开发了东南沿海地区，苗、瑶族最先开发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青海、西藏，高山族最先开发台湾，黎族最先开发海南岛，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西南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西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最先开发蒙古地区，东胡族（包括肃慎、乌桓、鲜卑、女真、契丹、满洲）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祖国，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我国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善于学习和总结，涌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①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项成就，都浸透着各族人民的血汗，都是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和英勇奋斗的成果。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85页。

果。中华各族的劳动者既然是中国的创造者，中国当然是属于他们的。中国各族人民从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主人。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被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任意奴役的苦难深渊。但也因此，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唤起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解放斗争。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居住在我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和汉族人民一样，遭受种种凌虐和残害，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为了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反抗侵略者的奴役和压迫，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反侵略斗争，一幕又一幕地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居住在我国黑龙江流域的赫哲、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蒙、满各族人民，对沙俄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作出过巨大贡献。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各族人民，为捍卫祖国的边疆，反对里通外国的叛乱分子，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维护祖国统一，也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为我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的史册谱写了光辉篇章。居住在西藏的藏、门巴、珞巴等各族人民对英、俄侵略者的疯狂入侵和破坏中国统一的卑劣行径，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和斗争。居住在云南边境的傣、佤、景颇等各族人民，为了抗击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出了巨大牺牲。台湾高山族人民，发扬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长期进行了驱逐荷兰、日本殖民者，收复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斗争。各族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粉碎了外来势力的侵略阴谋，捍卫

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使得帝国主义永远不能瓜分、灭亡中国。

上述可见，在我国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生死与共，亲如手足，同命运、共呼吸，各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在中国没有汉族不行，没有少数民族也不行。历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把各族人民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兄弟关系。

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汉族和若干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充当过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也出现过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地区性政权和王朝。诚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在古代又是不完全统一的，甚至各民族彼此作战，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是很多的。在各民族互相侵犯中，如果算总账，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次数多、时间长。虽然历史上汉族也被一些兄弟民族多次侵犯过，被统治的时间也不算短。”“但这总是过去的事情了。”如果我们总是纠缠这些历史旧账，“这对民族间的团结不利，对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不利。”^① 在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尽管出现过“不完全统一”的历史现象，但这是我们大家庭内兄弟民族之间的事情。“不完全统一”，就是说有些少数民族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建立过地区性政权或王朝，但这是在中国版图之内，同为中国历史的一

^①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79年12月31日，《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3页。

部分。它并没有割断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某些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曾进行分裂活动，有的甚至勾结外来侵略势力，发动反对中央王朝的叛乱，进行分裂、背离祖国，这是违背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利益，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因而是不得人心的。中央王朝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用武力加以镇压，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则是正义的行动。

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区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经济联系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彼此在生产和生活上都互相依存、互相帮助、互相影响，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祖国的统一，不仅为各族人民创造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提供了客观的有利条件，而且也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辛亥革命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以孙中山等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指导这次革命的理论基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创立的资产阶级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它所要完成的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除了与反对革命的改良派开展论战外，还出版了大量革命书刊，广泛深入地制造革命舆论。他们一方面通过充分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说明反清革命、救亡图存的必要性；一方面派出革命党人深入全国各地宣传人民，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和武昌起义后，各民族的会党群众、学生、士兵、工人以及海外华侨都积极投身革命，特别是各民族的工人、农民在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全国各民族工农群众的自发斗争，也配合着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正是在各族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冲击下，腐朽的清王朝终于垮台。这次革命摧毁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中华民国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保卫民主政治的临时约法。从此在人民思想上建立起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为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少数民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

所以，辛亥革命，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①它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的最高阶段。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缺乏建立新中国的明确方向和切实方案。这些斗争都还是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27页。

属于旧式的农民的自发斗争的范畴。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的旧式的骚动”终于“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①它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在我国建国初期，学术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和结论。可是，在我国史学研究横遭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期间，苏联史学界以齐赫文斯基为首的一伙，在他们编写的《中国近代史》^②和所发表的有关文章中，为了替新老沙皇侵略扩张的霸权主义辩护，竟对中国的历史进行篡改和歪曲，把我国汉族以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视作“外国”，把少数民族诬蔑为“外敌”、“异族”。近年来，在齐赫文斯基的一连串歪曲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歪曲，就是把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歪曲成一部“反满”斗争史，把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歪曲为仅仅是一场汉族反对异民族满族统治的“反满”斗争，似乎这次革命只是“满汉矛盾”的结果，只是“汉人革满人的命”而已。另外还有些人，由于对满族历史发展情况缺乏了解，简单地认为，辛亥革命是以“驱除鞑虏”的“反满”革命口号为号召的，因而满人参加革命是不可能的，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参加革命也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都妨碍我们对辛亥革命历史的正确认识。因此，对辛亥革命时期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

①列宁：《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9页。

②苏联莫斯科出版社，1972年出版。

历史进行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辛亥革命运动的内容，而且有助于深刻揭示辛亥革命的性质，以及各族人民对辛亥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对于澄清满汉民族关系的糊涂看法和扫除国外如齐赫文斯基之流对辛亥革命性质的种种歪曲，都会有帮助。

我们这本小书，就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辛亥革命时期我国的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以及通过对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的叙述，从一个侧面去正确回答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揭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关系，正确估计少数民族人民对革命的贡献和所起的作用。一方面是要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和一致的革命要求，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反抗封建统治，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卖国，他们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正主人。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对我国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爱国革命精神的歌颂，批驳国内外反动派对辛亥革命性质和少数民族关系的歪曲，还历史本来面目，澄清各种错误的看法和认识，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祖国的统一。

各少数民族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斗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册中光辉灿烂的篇章。但是，多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里，或中国近代史的教学里，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无论从辛亥革命史的完

整性或者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捍卫伟大祖国的作用来说，都是不相称的。我们这本小书，就是想做点补课工作，尤其期待得到史学界的共鸣。

第 一 章

清政府的投降卖国与孙中山领导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一、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清政府的投降卖国

义和团运动后，清朝统治者已完全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屈服。从前轻视外人的心理，已被恐惧感觉所代替。但是，各族人民经过义和团运动，则增加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认识，蕴积着更加强烈的仇恨心理。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认识到，用武力是不能征服中国各族人民的，因而在侵略中国的方式上就不得不由过去的赤裸裸的武装进犯，改变为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手法。腐朽反动的清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又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向帝国主义献媚讨好，企图以卖国来换取帝国主义的庇护与支持。所以，义和团运动以后的十年间，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深重，我们的祖国面临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

清政府在十九世纪末，大量出卖利权，本来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还不那么忠驯，有时还闹些别扭，甚至有时还进行某些抵抗。但历史刚进入二十世纪，情况就发生了很

大变化。义和团运动的飞快发展，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严重威胁着清朝的反动统治。清朝统治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和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便采取了投降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反革命措施。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西太后、光绪帝仓皇逃离北京。西太后匆忙下罪己之诏，下“剿匪”之诏，向各国求和。她说什么一九〇〇年中国人民的反帝行为，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直隶义和团蔓延尤甚，着该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绝根株。”所谓“罪己”，也就是请求外国侵略者宽恕她过去“剿匪不力”，以后当“努力效劳”。清朝统治阶级，当初要利用义和团保江山时，称为“承义民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搏”；如今却要反动官吏带兵“相机”“剿办”所谓的“土匪乱民”，“以靖乱源”，^①作为向侵略者乞怜的礼物了。

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各国在华的权益，十二月底，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驻华公使团根据“门户开放”原则，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款，包括惩凶、道歉、赔款、使馆驻兵、毁炮台、京榆沿线驻兵、永禁军火入口、设外务部等项内容，强迫清政府接受。所谓《议和大纲》，明显是一个侵略性条约。可是流亡西安的那拉氏，当她知道帝国主义仍愿意保持她的地位时，“曷胜感慨”，立即下令李鸿章、奕劻“所有十二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8页。

条大纲，立即照允。”^① 责令他们要早日完成投降卖国的任务。“和约”尚未签字，西太后就匆匆发布悔罪诏书。胡说：

“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表示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② 这伙卖国贼要把中国所有的财富宝藏尽其所能地贡献给帝国主义来博取侵略者的欢心，完全丧尽了民族气节，表现出一副奴气十足的走狗卖国贼嘴脸。

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美、日、德、法、俄、意、奥、荷、比、西等十一国公使，签订了空前耻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它共有十二款，另有十九个附件。

《辛丑条约》的签订，表明清政府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死心塌地充当帝国主义忠驯的走狗。帝国主义成了中国封建势力的保护人，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则充当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傀儡和工具。在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下，中华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了。因此，清政府成为当时全国各族人民仇恨的焦点，反清救国是当时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当时的情况，正如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所回忆的：“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钳制家奴之

①《清德宗实录》卷476页。

②《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①当时的“满清政府不特签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成为外国侵略者的“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②

二、少数民族特别深重的灾难

前面说过，由于《辛丑条约》的订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压榨，造成祖国贫穷落后，人民患难愈深。少数民族除了承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外，还要加上民族歧视与压迫，所以，他们的苦难尤其特别深重。

（一）东北满、蒙各族人民的苦难

（1）满族

满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入关前，他们世代生息、战斗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这块广阔的肥美土地上。一六四四年，满族封建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后，满族逐渐散居于全国九十多个城市和地区。但是大部分还是集中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和北京、西安、成都、广州等大城市。

十七世纪初，以满族封建贵族为头子，勾结汉、蒙古各族封建地主阶级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权的继

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0页。

②《总理全集》（胡汉民编）第1集，第1019页。

续。清朝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力，虽然被满族封建皇帝（即清朝皇帝）所掌握，但它的政策是维护各族封建地主、王公贵族的利益的。所以，清朝封建政权不仅压迫和剥削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对满族劳动人民也同样实行压迫和剥削。满族人民没有压迫和剥削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汉族人民也没有压迫和剥削满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民族都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过去有人否定清朝时期满族不同阶级的存在，把满族全体人民都看作是“压迫者”、“剥削者”，这是跟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的。

二十世纪初，满族的阶级状况怎么样？由于材料不足，还不能详知。但据奉天《承德县志》记载，生活在辽宁一带的满族阶级状况，则可知其概况。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承德全县满族人口职业情况如下：全县共有满人一万八千六百八十七人，其中官兵一千一百六十四人，占6.1%，农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人，占68%，工六百四十八人，占3.4%，商四百零七人，占2.1%，佣工一千零二十人，占5.4%，无业一千零六十九人，占5.7%，其他一千六百二十八人，占8.6%。^①又据《奉天旗务处档》记载，一九一〇年奉天省满族人口职业统计，全省共有满人二十九万零八百二十五人，其中官兵占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五人，闲散者共有二十七万六千五百四十人，四孤七十人。

从上述记载得知，二十世纪初年，在满族的聚居区奉天

^①《奉天省承德县志》上册，第47页，户口志。

省，满族劳动人民占满族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兵与民之间的比数为1比20。这就清楚表明，靠钱粮俸饷过活的人只占5%。从前满族只有封建社会中的贵族地主、官兵和农民，而今除地主、官兵、自耕农、佃农和佣工外，工商业者也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工”，就包括手工业者和近代产业工人。随着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的加重，农村经济日益恶化，满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并促成了贫富的分化与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满族贵族和官僚地主的“天堂”，就是满族穷人的地狱。“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①。到了清末，根据东北政书、档案、家谱记载，除少数满族封建贵族、地主官僚以及各地驻防满人的上层，仍然坐食汉族和包括满族在内各族人民的“脂膏”，过着奢侈淫佚的腐朽生活外，而占满族绝大多数的都是从事“耕凿樵牧”，“各执一艺，足以自存”的劳动人民。虽然还有部分满人在全国各地驻防，有“钱粮俸饷”，但旗兵的情况也不一样。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看，驻防旗兵则包括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一些下级军官和从贵族子弟中选拔的“亲军”是旗兵，占有二三千亩土地和上百个奴仆的富家子弟也有充当旗兵的，这后一种是旗兵的上层，属于封建统治阶级范畴。他们克扣兵饷，勒索余丁，奴役奴仆，压榨佃户，过着鲜衣美食的奢侈腐化生活。但是旗兵的基本群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18页。

众是马甲和步兵。他们大多数没有奴仆，得地很少。虽有“钱粮俸饷”，但到了清末，由于“俸饷有数”、“兵额有定”，多数“闲散”及其家属都不能“赖饷而食”，生活十分贫困。^① 马甲、步兵和余丁不仅在生产、行动、婚姻等方面受到满族贵族的严格控制，而且还受到八旗将领折扣兵饷，重行盘剥和辱骂殴打，生计异常艰难。例如，青州驻防满人“因粮饷缺乏”、“衣敝履穿，形同乞丐”者不少。入冬以后，这些满人“男妇赴乡乞食，死者甚多。”^② 我们不能把只占满族人口小部分的旗兵，当作是满族全体，更不能把部分旗兵脱离生产寄食于人的情况，当作是旗兵全部的面貌。其实盛京旗兵每年除差操时间而外，依然从事生产。在若干边疆地区，旗兵生产也有成效。

由此可见，清朝末年，满族内部的农民、工人、民族资产阶级、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和旗兵、余丁的中下层都属于人民范畴。但革命的基本力量则是农民和工人。

在东北，清末满族农民约占当地满族人口总数的70%左右，是满族主要劳动者，也是满族人民参加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斗争的主力。

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的占有情况，决定农民的生活。清初，满族封建贵族为了笼络满族人民，对本族人民施行小恩小惠政策，颁布了“俸饷”制度。“八旗王公、

^①参考杨学琛：《清代旗兵和余丁的地位和反抗斗争》，《民族团结》1963年9月号。

^②《清穆宗实录》卷88。

官员、兵丁，国初各给分地。”^①“驻防官员量给园地。”^②

“凡官员兵丁，俱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垧；满洲披甲人，或父子兄弟所得之田不过数垧。”^③

“其余闲散人户亦行量给。”^④到了清末，由于满、汉地主疯狂兼并土地，使东北许多满人都丧失了土地，生活无着，度日十分艰难。

二十世纪初年，畿辅地区满人的旗地已典卖殆尽，旗人有地耕种者，“大抵十无二三”^⑤。过去奉天旗户皆有地产，后来“大抵典兑于人”^⑥一九〇九年奉天省窃呼兰旗有满族三千一百余户，其中无地者实有一千九百一十四户，男女共七千余丁口。无地满人，“既无钱粮养贍，又无地亩可耕，生计日蹙，渐转沟壑”^⑦，因而“饥不堪命”，“绝亡相继”者屡见不鲜。吉林旗户也迫于生活，原有产业，“半皆转相典售”，后离乡背井。满、汉族地主趁机兼并土地，使许多正身旗人破产，造成吉林省旗地“半成民产”^⑧。大批满人无地可耕，生活艰难。清朝满族统治者曾想试用所谓“迁旗实边”办法，把丧失土地的满人重新固定在土地上，

①乾隆《户部则例》卷10。

②雍正《大清会典》卷28。

③《清世祖实录》卷127。

④《清高宗实录》卷206。

⑤《北洋公牍类纂》卷14。

⑥东北档案馆：《奉天旗务处档》庚子第132号。

⑦东北档案馆：《宣统元年十二月奉署档》第101捆，第3卷，第28807号。

⑧《东三省政略》卷7。

继续进行盘剥。但因需要迁旗的破产旗人很多，例如一九一〇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迁奉天旗人一百户到安图垦荒，结果要求迁旗者竟达五千户之多。^①可见，“迁旗实边”，虽然也开垦一些荒地，但它根本不能解决满族农民的土地问题。有部分满人被迁旗“垦荒辟土”，但因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诸多剥削，“劳碌终日”，竟无一钱到手，饥寒交迫，“生计益难”。^②少数失去土地的满人，继续留在本地租种满、汉地主土地或垦荒种植，但因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佃户终年勤劳亦“不得一饱”，^③痛苦不堪。

满族农民还要受苛捐杂税的繁重剥削。清中叶前，“塞东边地，经营最后，赋轻税薄。”到清末，清朝政府为了弥补《辛丑条约》赔款造成的国库空虚，拼命榨取劳动人民血汗。捐税种类极其繁多，仅以满族聚居的奉天省为例，各县不一，有的多达数十种，诸如什么牲畜税、小麦税、包米税、皮货税、木税、地亩捐、车捐、警学亩捐，等等。各种捐税，满人、汉人一体缴纳，连一向作为八旗兵饷特殊支給形式的随缺田，也要每亩交学堂经费二百文。^④反动地方官僚、封建地主还经常诬说满人“隐种偷种黑地”，要他们“自行首报”，缴价升科。除苛捐杂税外，满族农民交纳的地租也逐年增加，如一八七六年在奉天，一般是交土地收入的三

①《试办迁旗实边报告》初编。

②《吉林通志》卷40。

③东北档案馆：《奉天公署档》第51捆，第1号。

④《奉天通志》卷108页。

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而一八八八年增至“占收成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二，或七分之三不等。”^①到清末满人久年承种的土地暂且不说，仅流民开垦的土地，自开垦四年后便分别上中下地纳租，本来由于耕作粗糙，这些新垦荒地所收无几，但不管收成好坏，都要“上地每垧每年纳租九斗，中地六斗，下地三斗，租分谷子、豆子、高粱三班。”此外，还随便起租，加收捐款。从未纳粮的吉林旗地，一九〇二年也要“通省旗户自占土地、出卖之地及站丁、官庄等地，悉行报明，派员查丈，一律升科。”^②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对正身旗人的“徭轻赋薄”政策，使满族农民负担日重，贫苦益深。

满族工人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二十世纪初年，东北的矿厂、面粉、榨油、纺织等各种企业中都有不少满人做工。北京的土木建筑、纺织刺绣、特种工艺等行业中，也有满人学徒和工匠。各地驻防满人在各种工业部门作工的也不少，如羊城(广州)灯市，就“以旗人所制为最伙，且又最工。”^③随着满族阶级分化加剧和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加强，清朝政府妄图通过给驻防兵丁解决“生计问题”，安定民心，从一九〇六年起，接连颁发有关旗人就业的诏谕。先后在北京、热河、奉天、锦州、吉林、珲春、黑龙江等地设立八旗工厂和工艺传习所，吸收八旗子弟入厂学习。这

①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第三种：《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3页，652页。

②《东三省政略》卷7。

③《驻粤八旗志》卷24。

样，满族从事手工业工作的人数就迅速增加。后来这些手工业工人进入中外资本家经营的工厂、铁路、矿山做工，成为我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满族近代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在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帝国主义开采的煤矿、银矿、金矿以及各地兴办的铁路、纺织、榨油、制糖等大规模企业中，都有满族工人。他们和汉族工人一样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层层剥削，处境十分艰难，生活极其痛苦。当时在抚顺煤矿工人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一到千金寨（即抚顺），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它真实地反映出抚顺煤矿各族工人的悲苦情景。抚顺各族工人“起居饮食”都“苦不可言”。每天工时长达十二小时以上，工资却很少。居住条件，极其恶劣，他们十有八、九没有被褥，“下井一身破窑衣，升井一条破麻袋。”^①工厂设备简陋，空气污浊，疾病丛生，伤亡事故层出不穷。由于各种矿井事故“压死坑内者，时有所见。”^②仅一九一一年，在抚顺煤矿就发生劳动灾害达一千二百三十三次，死伤人数达一千二百四十七人。^③此外，工人还受中外把头、工头的打骂，有的厂矿驻有军警、设置刑庭，处罚工人。满、汉各族工人不仅生活最苦，政治上连最低的自由都没有。

①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辽宁省抚顺市厂矿企业满族职工情况调查报告》，《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上册，第四辑。

②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第二辑，下册，第1222页，1218页。

由上述可知，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满族内部阶级分化加剧，满族内部贫富异常悬殊，形成鲜明的阶级对立和斗争。满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一样，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共同剥削、压迫，他们有着相同的悲惨遭遇和命运，这就决定满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也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2) 蒙古族

蒙古族人民的遭遇也跟满族人民同样悲惨。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清朝反动统治阶级和蒙古族封建王公贵族的大肆搜刮，造成蒙古族农牧业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和北部蒙古族地区疯狂争夺，给蒙古族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沙皇俄国除了凭借通商、免税等特权，在蒙古族地区倾销商品，掠夺蒙古族人民财富外，还以华俄道胜银行为中心，在东北呼伦贝尔及内蒙古东部各地投资设厂开矿，经营林场，大量掠夺原料，剥削和欺压当地蒙古等各族人民。与此同时，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也伸进内蒙古地区，除政治上扶植傀儡，猖狂进行侵略分裂罪恶行径外，还在经济上大肆倾销如布匹、煤油、烟草等日用品，拼命搜刮和榨取各种皮、毛及药材等土特产。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更加有恃无恐。他们不仅继续倾销商品，掠夺资源，还派遣大批特务进行阴谋活动。一九〇八年被任命为蒙务局督办的朱启铃说过：“日人经营之机关则在长春，其东亚测地会则以辽源为行部，其事务长为成田辰之助。率徒八十余人，皆系陆军学生，改装易服，学习蒙

语，市集村屯，所在散处。其在洮南者，为上田传八，则以卖药为名，专事结纳，刺探内政。”^①

帝国主义对蒙古地区的侵略，摧毁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在帝国主义、满汉地主和蒙古族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蒙古族人民极端贫困，生活濒临绝境。一九〇二年清政府允许蒙古族封建王公开放蒙地。汉族封建地主趁机纷纷深入蒙古地区，同蒙古族封建王公一起，疯狂侵占蒙族人民的资源和土地，使大批蒙族农牧民丧失土地和牧场。一九〇五年，清政府又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在蒙古族地区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行，在客观上增加了蒙汉人民接触的机会，多少也开辟了一些土地。但是，统治阶级假借“移民实边”名义，增设衙门，派遣爪牙，趁机抢占蒙古族人民的牧场和土地，使农牧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此外，蒙古族人民除了经常性的沉重徭役外，还要负担形形色色的临时性摊派，凡王府一切费用，“无不派诸蒙户。”所以，二十世纪初，蒙古族人民流离失所，无以为家者，比比皆是。

（二）两广地区壮、黎各族人民的悲惨生活

广东、广西位于我国的最南边，是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较早，危害较深的地区。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象贪婪的恶狼吸吮着两广地区各族人民的膏血，使世代生息、劳动在这里的汉、壮、黎、瑶、苗、回、满、畲、彝、侗、仡佬、毛难、京、水、仡佬等十多个兄弟民族人民生活

^①《螭园文存》上卷，第20页。

在水深火热之中。

(1) 壮族

壮族是我国历史悠久和现在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绝大部分聚居广西，少部分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自治州和广东省连山县等地。

广西地处边陲，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素称贫瘠，但是各族人民遭受的剥削榨取，却异常严重。据记载，二十世纪初，广西各族农民除了各项田赋负担外，还有大批负责征税的大小封建官吏采取加收房费，科重小户，折算寄零，折价浮收等等勒索形式来进行敲剥。因此，赋税负担比邻近省分都高。当时人吴贯因曾在《田赋私议》中指出这种不公平的情形说：“广东下等田赋额八厘一毫，米六合五勺，广西下等田为二分四厘，米三升七合。今广东地味当优于广西，而赋额仅及三分之一。”^①因此，中小农“于输赋以外，所余几何，仰事俯蓄之不足，则必割弃基本之财产以为报偿，如是则中户渐为下户，下户渐流为无业之游氓。”^②当时，广西一般称地主为“大户”。地主阶级趁机兼并土地，以致各族农民破产，普遍陷入水深火热困境，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更加深了人民生活的困苦。一九〇二年上思、贵县等地瘟疫流行。同时，全省发生旱灾，“饥民亿万，待哺嗷嗷，卖妻鬻子，惨不忍言。”^③一九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田赋”四，第7536页。

②刘庚光等编：《广西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卷2。

③光绪癸卯年三月二十六日，广西巡抚王之春片《谕折汇存》

○三年，南宁地区霍乱，左右江一带瘟疫流行，死者枕藉。这一年广西闹饥荒饿死七千人以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破坏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族人民陷于极端困苦，无以为生境地。当时《岭东日报》报道说：“广西近数年来，既遭丧乱，又值凶荒，居民之卖儿数以千计，积岁计之，更不知其几千几万也。”反动清政府不仅置各族人民的死活于不顾，而且为了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一九〇三年又在广西举办团练，抽收“团谷”较正赋多至数倍。仅派定给广西的烟酒税就十万两。^①此外还要承担清政府摊派给广西的《辛丑条约》七十多万两，对外赔款，这对于山多地少、地瘠民贫，土地问题严重和依赖外省饷银支援的广西来说是不堪负担的。统治者于是增加捐税，仅国税和省税就增加到二十三种，其他苛派更多如牛毛。这样沉重的负担，“小民何以堪此”。加上广西的吏治又腐败到极点，官员滥杂而贪酷，扣饷中饱，贿赂公行、任意苛派、纵兵劫掠、肆行杀戮，“流毒于全省”。在天灾人祸的严重威胁下，广西各民族“民穷财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间恨怨刻骨”。

（2）黎族

世代生活在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在二十世纪初，处境更是每况愈下。海南岛是个好地方。它象一颗灿烂的明珠，闪耀在浩瀚的南海碧波上，风景秀丽，四季常青，物产丰饶，宝藏很多。由于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海南岛一直都是

^①《练兵处筹款清单》，《东方杂志》第三卷，第2期。

外国侵略强盗觊觎和垂涎的地方。早在一八五八年英、法侵略者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开辟琼州等地为商埠，并允许英、法等国在当地设立领事馆，进行各种侵略罪恶活动以来，德、意、比、奥和美国都抢着在海南岛建立侵略据点，从事危害中国主权的种种侵略活动。在经济上，外国侵略者通过控制我国海关权，把大量鸦片、洋纱和洋油等，向海南岛倾销。压价抢购黎、汉各族人民的农副产品，图谋劫取海南岛的丰富矿藏。这不仅加速了海南岛广大农村的土纺业和榨油业纷纷停业倒闭，而且黎族地区的土特产如槟榔，药材如益智和牛只等，也被外国侵略者掠夺出口。外国侵略者在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还加紧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侵略。二十世纪初，法国天主教安南东京传教会，美国耶稣教长老会都派来大批传教士到海南岛设教堂、立学校对海南黎、汉各族人民进行精神奴役。仅美国长老教会派遣来我国五百多牧师中，其中在海南岛就有二十五人，教徒达四千人，其设立的教堂遍于海南各地，即使“黎峒亦派人传教办学。”^①它们在海口、那大、加积和崖县等地设立教堂，并以这些教堂为基地，向现今的乐东、白沙、琼中、保亭等县黎族地区进行所谓“传教”、办学。传教士在海南岛飞扬跋扈，肆意占霸田产，荼毒人民，引起海南黎、汉、苗等各族人民的普遍愤慨。

与此同时，清朝对黎族人民的横征暴敛也达到空前严重

^①陈铭枢等撰：《海南岛志》一九三三年，上海神州国光社，第207——208页。

地步。除苛重的田赋、色米负担外、还有所谓“厘金”、“战败赔款摊派”和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居住山区的黎族人民每年还要负担巨额的所谓“皇粮”。黎族人民还经常遭受到贪官污吏的强横勒索、巧取豪夺。地方官吏和民族头人“苛派黎人”，兵痞流氓借口“生日”和“纳婿”，“勒派各村钱牛米谷”。^① 层层敲榨勒索和重重的残酷剥削，使大批黎族农民丧失了土地。黎、汉族地主，特别是黎族封建上层如“总管”、“哨官”、“头家”等，又贪得无厌，通过租佃、雇工、高利贷以及带有原始掠夺性质的械斗和各种无理的罚款，向黎族农民进行残酷榨取和摧残，使广大黎族人民生活无着，极其凄惨。

（三）台湾高山族和东南沿海畬族人民的痛苦

（1）高山族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的领土。在这个宝岛上，很早就居住着勤劳勇敢的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他们披荆斩棘，艰苦经营，把台湾开辟成美丽富饶的宝岛。并在共同反抗国内反动统治和外来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写下可歌可颂的光辉篇章，结成兄弟般的亲密关系。

台湾省位于我国的东南海滨，和大陆只有一水之隔，是我国海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台湾历遭外国侵略者的骚扰和践踏。但是，“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② 一八九四年

^①谭钟麟：《谭文勤公奏稿》第四册，第19卷。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86页。

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日本侵略者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设“总督府”，任命桦山资纪为第一任台湾总督。日本侵略者任意杀人放火，蹂躏和平居民，强奸侮辱妇女，美丽富饶的祖国台湾岛成了一座暗无天日的牢狱。高山族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

一九〇一年日本殖民主义者颁布了《土地收买规则》，肆意霸占汉族和高山族人民土地、山林供日本财阀、资本家投资经营或设立企业。一九〇三年，又实行台湾全省“户口调查”，按人口强征苛捐杂税，强迫台湾人民负担上百种的捐税、劳役，还先后将鸦片、食盐、樟脑、烟草和酒类列为专卖品，获取高额利润。^①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还扶植“三井”、“三菱”等大财阀，竭力投放资本，掠夺台湾原料，倾销日本商品，通过促进日本资本在台湾的发展来加紧掠夺台湾人民。

从一九〇六年起，日本侵略者实行所谓“理番”政策，对高山族人民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一九一〇年又制定了所谓“讨番五年计划”，对高山族人民进行血腥“征伐”，强迫没收高山族人民防卫的枪枝及其他杀伤武器，把高山族和其他族人民，赶出家园。对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台湾人民，

^①施联朱：《台湾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光荣斗争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

则大肆杀戮“每年何止数千人”^①。作战中被杀的更不知有多少。

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造成台湾省高山族、汉族人民的贫困化。台湾各族人民在失业、饥饿、死亡线上挣扎，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恨。

（2）畬族

畬族，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和战斗在我国东南沿海闽、粤、赣、浙的一些山区和安徽等地。在二十世纪初，畬族人民也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遭受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沉重压迫和奴役，过着“蜡烛弯弯倒，火笼当棉袄，辣椒当油炒，番薯丝吃到老”^②的辛酸痛苦生活。

随着我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到十九世纪末，畬族人民居住的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均为英、日帝国主义所控制。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加紧以传教、办学校、设医院为名的文化侵略。畬族人民聚居的浙江省丽水、平阳和福建省的霞浦、福安等地教堂遍布穷乡僻壤。仅福安一县就先后建立了四十四个教堂和布道所，外国传教士凭借特权，逞凶肆虐，残害人民，强夺田产。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维护他们的特权，帝国主义侵略者还在教堂里设立武装。例如，一九〇九年帝国主义侵略者在福安县教堂设立的“保教局”，就为非作歹，任意

①（日）守屋典郎著、丁未译：《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转引自来新夏：《中日马关条约之际的反割台运动》，载《中日甲午战争论集》，第43页。

②少数民族史丛书：《畬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第3页。

欺压和屠杀人民。侵略者还通过种种诱骗办法把许多畬、汉族孩子送进“育婴堂”，仅一九一〇年建立的福安“育婴堂”，就先后有两万多名畬族和汉族婴儿被侵略刽子手虐杀了。可见，这些披着“文明”外衣的豺狼多么狠毒！

在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支配下，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对畬族人民的剥削和搜刮也十分残酷。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规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清政府摊派给福建每年负担九十九万两，用加重地丁漕赋的征收科派和向人民加征所谓捐款作为抵偿。为此，清朝在福建广开税源，拼命勒索。据记载，福建省向畬、汉各族人民征收的捐税，除什么“随粮捐、贾捐、铺捐、膏捐、酒捐”外，还有什么“竹木税、烟税、肉税、果税、地捐、亩捐、房捐、铁路随粮捐”等等新捐税数十种。^①在浙江省平阳县畬族居住区还征收赔款费，每征银一两，加随粮捐三百文。^②此外，统治阶级还不断增税，用来补充兵费，镇压人民的反抗。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畬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使畬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到处都呈现一片凄凉景象，广大畬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饥饿和死亡时刻都在威胁着勤劳俭朴的畬族人民。

（四）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藏、维吾尔等各族人民的灾难

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和天山南北是多民族聚居区。这里土

^①民国《福建通志》赋税志。

^②民国《浙江省平阳县志》卷12，食货志。

地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中外反动派的疯狂掠夺和残酷搜刮，使世代生活在那里的各民族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

(1)藏族

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藏族地区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逐步侵入中国藏族地区，尤其是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更为英、美、俄、法、日等国所垂涎。他们采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种种方式向我西藏渗透，派遣间谍分子，以“传教”、“学经”、“游历”等名义，向我藏族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特别是英、俄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我国西藏，都在藏族反动僧侣上层中培植走狗，策动民族败类背叛祖国，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西藏的反动民族上层，妄图借用帝国主义的势力达到其掠夺藏族人民的目的，便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剥削和压迫人民，更加深了藏族人民的灾难。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英帝国主义认为吞并我国西藏的时机已到，便发动对我国西藏的野蛮武装侵犯。一九〇二年英国侵略者从锡金越境，侵入我康巴宗南甲冈地方。一九〇四年又进犯江孜等地，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掠地劫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活象一伙豺狼。与此同时，英国财政资本集团还通过垄断贸易来霸占西藏市场，搜刮西藏物产，剥削西藏人民。仅以羊毛为例，从我国江孜、亚东一线向印度出口的羊毛总值在一八九〇年只六万余卢比，至

一八九三年为二十四万余卢比，到一九〇三年已达四、五十万卢比。^①我国青藏地区的矿产、皮革以及其他土特产品也源源不断被掠夺运往当时英属印度。

帝国主义侵略者还竭力支持藏族地区的封建领主如官家、寺院中的上层，对藏族人民实行残暴的农奴制剥削。约占西藏总人口5%的封建领主霸占着西藏的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财产和全部农奴。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奴，祖祖辈辈属于农奴主，固定在一定土地上，被迫为农奴主劳动。农奴终年辛勤劳动收获的粮食，70%至80%为农奴主阶级所攫取。农奴没有丝毫人身权利，是被封建农奴制度压在最底层的一个阶级，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农奴主可以任意出卖、转让或杀戮农奴。农奴生了孩子要缴出生税，人死了要缴销名税、送尸税，年老残废要缴免差税，被农奴主抓进监狱，还要交入狱税，真是“苛税象牛毛，从生交到死！”

西藏地方封建政权，为了维护其反动农奴制度，对藏族农奴的反抗动辄给以暴力镇压，并规定了一套极其野蛮、残酷的刑法：如抽筋、割舌、砍手、刖脚、剜眼、挖心，扔进蝎子洞等等。在万恶的农奴制度下，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农奴被酷刑残害致命，更不知有多少农奴被折磨成终身残废，真是野蛮残酷到了极点。

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屠杀和农奴制度的残暴摧残，二十世纪初，西藏人口大量减少，到处田园荒芜、生产凋敝，

^①成田安辉：《英藏交涉沿革小史》，高黎贡译，载《东方杂志》第五卷，第12期。

西藏人民之苦，真如在十八层地狱！

(2)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

二十世纪初，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十三个兄弟民族也蒙受无穷无尽的灾难。

随着英、俄在中亚争夺霸权的斗争趋向激化，大批侵略者涌进新疆。据一九〇九年统计，全疆仅是沙俄侨民就有二千二百多户，九千余人；英籍侨民一千二百多户，三千余人。这些侨居我国新疆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政府的法律限制，而由其领事馆委派的阿克撒卡尔（绅约）管理。在这些侨民中有不少是奉帝国主义侵略者之命来我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侵略分子。在政治上，这些侵略分子为非作歹，欺压当地中国各族人民，收买和培植民族败类，灌输反动的大土耳其主义，进行分裂和颠覆活动。在经济上，通过在新疆开设银行，投放资本，垄断新疆的金融和财政，吸吮中国新疆各族人民的膏血。沙俄在伊犁、塔城、喀什设立道胜银行分行，办理借贷、存放、汇兑业务，还发行纸币卢布代替中国货币作为交换手段。^①英国也在喀什设立汇丰银行分行，控制南疆金融。此外，帝国主义还通过高价倾销商品，廉价掠夺原料，来剥削人民。据清朝官方记载：这时，我国哈萨克族牧放马牛羊所收皮毛，大部分都是转售给俄国商人，“盘剥受欺。”^②塔城出产以皮毛为大宗，也是历年由俄商潜赴各游牧区“以贱价收买，贩运出洋，蒙（古）、哈（萨克）受其愚弄，贫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72页。

^②《清德宗实录》第545卷。

困日益”^①严重。帝国主义在新疆进行赤裸裸的强盗式掠夺，直接动摇了我国新疆的财政经济基础，严重地阻碍了新疆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随着帝国主义对新疆政治、经济侵略的加剧，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加紧了。英、俄、德、法、日、美等帝国主义不断派遣所谓考古队、探险队、医生、传教士等到新疆来，一方面搜集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阴谋服务。另一方面掳掠我国新疆的历史文物，设立教堂、医院和学校，明目张胆地在新疆扶植和培训帝国主义走狗，灌输反动的大土耳其主义与大伊斯兰教主义，从事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清朝封建统治者又同新疆各族剥削阶级的上层勾结起来，任意鱼肉人民，趁机“浮收勒索”。维吾尔族封建王公对维族人民的“差役”支派，劳役剥削，不胜其繁。哈萨克族部落头人对人民的临时摊派，更是名目纷繁，从则难于抵偿，违则性命不保。哈萨克人民无法忍受沉重的剥削压迫，大量向外逃亡，流落新疆各地，甚至流离到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生活在新疆西南部的柯尔克孜族人民所遭到的剥削也极其沉重。起初，清政府为了笼络柯尔克孜族人民，只要他们担任沿边卡伦稽查、侦探、修路各差，其他各项赋税一概豁免。但因清朝对各族封建头人及地方反动统治者采取放纵态度，柯尔克孜族地区，从前清朝官更加在牧民头上的那些五花八门的负担，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到二十世纪初

^①《宣统政纪》第31卷。

反而更加节外生枝，变本加厉了。他们“巧立名目，假公济私，欺其愚蒙，恣意鱼肉”，“借端浮勒，奚啻加倍。”因此，清朝末年柯尔克孜族人民的负担十分苛重。一九〇七年，清政府虽明令取消马租，但实际上柯尔克孜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缴纳。^①此外，柯尔克孜族的乡约、比、千百户长等民族头人，还通过处理审讯民间大小司法案件，任意吊打、拷问老百姓，随意把人投入监狱。所以，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日亟，新疆的经济文化愈加落后。各族人民的生活更为贫困。

（五）云、贵、川三省各族人民的贫困

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共居住着傣、白、彝、苗、布依等三十多个兄弟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就深入到云、贵、川三省的民族地区。法、英帝国主义在云南修筑铁路，开设厂矿，操纵云南的金融。一八九八年，法帝国主义掠得了修筑滇越铁路的权利。一九〇一年法国组成滇越铁路法国公司开始修筑。一九一〇年修建完毕，全线通车。法国为什么要急于修建滇越铁路？法国驻印度支那殖民总督都墨不打自招地说过：“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②这充分暴露了法国侵略者利用修筑滇越铁路，掳掠我国物产和各种矿产资源的强盗野心。英国对于在云南修筑铁路也颇为垂涎，但

^①《新疆克孜勒苏自治州档案馆旧档案》。

^②盛襄予：《法国对华侵略之滇越铁路》，《新亚细亚》月刊，第3卷，第6期。

由于遭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才未得逞。

滇越铁路沿线多为哈尼、彝族聚居区。法帝国主义在铁路沿线拆毁无数民房，霸占大量良田，利用哈尼、彝、汉各族的物资，强迫云南各族人民为筑路充当劳役，使许多人家散人亡。各族筑路民工遭到的残酷虐待，正如清政府的官员在一个奏稿中所说：“工人到工后，死于烟瘴者，不知凡几，加以克扣工资，无钱觅食，逃亡、饿毙者不能以数计。”“甚有以铁索贯十数人之辫发驱之力作，偶有倦怠，即以马棒击之，……无故殴毙者，不能悉数。”到一九〇七年，“路工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病、于饿毙、于虐待者，实不止六、七万人计。”^①一九一〇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各族的廉价物资，被法帝国主义掠夺运走。个旧锡矿开采的锡，被源源运往法国或香港，精炼后转运英国。

帝国主义对云南边疆的经济侵略，在初期主要是以买办资本家作为桥梁，一面以其过剩商品肆意摧残我民族工商业，破坏我国金融和人民生活；一面为帝国主义掠夺云南省的重要工业原料和土特产，从中谋取暴利。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九〇八年后，车（景洪）、佛（勐海）、南（勐遮）三县年产八、九万斤樟脑，全区年产六、七万斤的紫梗，被帝国主义全部或大部套购夺走。英帝国主义还串通私商，将我国澜沧等地的矿物资源偷运缅甸。著名的“普洱茶”更是英、法垄断和争夺的重点。在掠夺我国云南物产资源的同时，帝

^①《案事编》：《奏派云南查办事件禀稿》；《国风报》第二年第九号，62页。

国主义的商品也大量倾销云南市场。据腾越商务调查：二十世纪初年，云南“入口货以棉花、棉纱、棉布、意大利布、……哔叽、洋火、煤油为大宗。余如洋铁货、磁货、石硷、洋伞、燕窝、海菜、干鱼等类，销数亦巨。所入之货，在腾越销售者百分之十一、二，其余则销之本省之各府州县，四川、贵州亦可销少数。”“出口货以黄丝（四川省产，滇省仅产少数）、……石黄、牛皮、牛角、丽江马匹数者为大宗。余则如铁锅、纸张、袜帽、鸡鸭蛋、底线、棕盖等类。”^①大宗外货进口，每年入超数目相当惊人。一九〇六年腾越关商情统计：进口洋货，共估值达该关平银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二百十六两，去年则有一百七十四万七千八百二十两。出口土货查本省迤西一带土产……出口共值该关平银二十三万六千七百八十三两。^②全部进口货必须以净银购买，这样每年入超数达净银一百二十万两至一百五十万两左右（行商小贩之数尚不计算在内）。此外，英帝国主义还通过抬高英属殖民地货币“卢比”的价格，贬低华银的价格来掠夺我国财富。大量洋货充斥云南各民族市场，这不仅严重地摧残和阻碍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在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下，各族人民也极端贫困。

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的侵略，还派遣大批打着“行善救人”幌子的传教士到云南进行文化侵略。它

①《云南杂志选辑》（1906年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181页。

②《云南杂志选辑》，第178—179页。

们以昆明、大理、昭通、东川、曲靖等处为基地，向全省各地广泛扩张。而清朝反动官吏和地方各民族反动上层，对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又谄媚逢迎。云南昭通基督教的一个教徒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说：“自庚子之变后，我国官吏因见于排外之王公大臣及文武官吏之诛戮，均一变其从前仇教排外之心理，而作投机取巧行为（即逢迎帝国主义）。”^①不仅如此，他们还以镇压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

到二十世纪初，披着宗教外衣的英、美、法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已深入到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彝、傣、傈僳、怒、景颇、苗族及其他民族的大部分地区。帝国主义传教士和反动教会与地方官吏勾结，强夺民财、霸占田地、奸淫妇女、残害人命。例如，帝国主义传教士深入四川省盐源后，反动教会就强占了长坪子葛蒲塘一条山沟的全部土地，把卫城龙河地区三百多彝、汉族人民横加驱逐，弄得无家可归。西昌天主教堂霸占了上万亩的好地，并拼命掠夺各族人民的财物。帝国主义传教士还卑鄙地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经常制造冤家械斗。例如一九〇五年，美国传教士、大特务永伟礼就在云南省双江县制造流言蜚语，唆使勐勐傣族土司把汉人赶走，但他的奸计被傣族土司和人民识破，没有得逞，接着便煽动拉祜族和佤族人民向勐勐的傣、汉族挑唆，制造事端，造成各族人民互相残杀。在贵州省威宁石门坎等地的外国传教士，还经常唆使当地少数民族教徒去欺侮汉族的非教徒，制造矛盾纠纷，破坏民族团结。此外，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还以

^①《西南教区六十年宗教史略》（未刊本）。

传教为掩护，在我国西南各地测绘地图、搜集我国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物产、资源情报。外国传教士在各地骗取群众入教，建立教会组织的同时，又普遍建立教会学校、设立医院、诊所和孤儿院等附属机构，向教徒进行奴化教育和种种人身摧残。帝国主义“慈善家”们，给我国西南各族人民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

当时，清朝内政又极端腐朽，地方官吏昏庸腐败到了极点。而各民族的反动上层如土司、头人，还任意巧立名目，征调沉重的徭役、官租和制造事端，挑起“兵差滋扰”。此外，还有无休止的租税剥削和人身奴役。贵州省西北部和云南省苗族地区，清朝末年虽然普遍设置流官，但土司仍保留着各种特权，成为流官的统治工具。他们残酷地“凌虐苗夷，假借地方官之命，颠倒诡诈，以行其朘削，恶为官而利归己”，对农民进行沉重的租税剥削。由于层层搜刮，各族人民终年辛劳所获的粮食，正如云南纳西族一首民歌所说：

“大麦黄，未登场，不进穷人口，先入富人仓”，过着饥不果腹的生活。

云南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二十世纪初，内地的民族多数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聚居云南边远地区的民族，尚处于封建领主制、奴隶制或更落后的社会形态。封建领主制地区各族农奴所受剥削十分沉重，除负担清政府的各种剥削外，还要给大小领主服劳役和交纳各种土贡。车里、武定等地区，领主还可随意把农奴的子女打死或拉去作奴隶，保留着野蛮的奴隶制剥削残余形态。地主经

济地区，各族农民（或称庄户）遭受清朝反动政府和各族地主（或称庄主）的地租剥削外，还要忍受大量的劳役剥削和特权欺压。地租的剥削极其繁重，如开远县附近彝族聚居的山区，在一九一〇年滇越铁路通车后，地租从占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增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在景东县，汉族地主商人还通过高利贷盘剥各族农民，利率之高十分惊人。商人“重利收债，二三月一换木刻，不过期年，一两之银可至十数两，每酒一壶，换粮食一斗，零星记账，至一两年始照数收取。故夷人（彝族）终岁苦作，不得自食，尽以偿债，饥寒交迫，逼讨之状，急于星火，于是牵牛拉猪作抵本利，不足，偿以田地，付以儿女。夷人（彝族）非死则逃，于是产业尽为他人有矣！^①这种惨状，正是当时云南内地各族杂居区劳动人民受高利贷剥削的写照。

在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肆意剥削和奴役下，贫苦的西南各族人民，一年中大半没有口粮，被迫常以树根、野菜充饥，不少成年人因为没有衣服而赤身裸体，每到十冬腊月，许多人只得围睡在火塘边度过严寒的夜晚。一遇荒年，更是哀鸿遍野，饿殍满道，惨不忍睹。

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 兴起和“反满”民族主义纲领的实质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

^①《云南省景东县志稿》（民国十年修），第22卷，杂录志。

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 孙中山开始革命，又以他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标志。

兴中会，一八九三年秋冬酝酿于广州。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正式成立于檀香山。它的诞生地在海外，总部设于香港。它的成员约有三分之二是华侨资产阶级。^② 从它成立时发表的宣言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组成，区别于旧式会党组织的一个革命团体。

兴中会宣言，一方面揭露清政府的黑暗腐败，说它“政治不修，纲维败坏”、官府“剥民括地，暴过虎狼”，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面又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瓜分豆割”，痛惜“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号召有志之士，“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③ 起来挽救危局，振兴中华。所谓“振兴中华”，斗争目标不明确，但在香港兴中会的会员入会誓词中，已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战斗口号，明确地提出了推翻清朝的民族主义和初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纲领。经过几个月的活动，孙中山决定利用广州人民重阳（旧历九月九日）扫墓的风俗，举行武装起义，夺

①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27页。

②据冯自由《革命逸史》（1946年版）第四集，37页记载：兴中会成立两个月以后，兴中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五人（名册上一百二十六，其中一名两见），华侨资产阶级约占三分之二。

③《总理全集》（胡汉民编）第二集，第1页。

取广州为根据地。起义前夕，因内部步调不一，消息走漏，起义流产了。七十余人被捕，陆皓东等数人死难。

广州起义，带着单纯军事冒险的性质，缺乏群众基础，终于失败了。但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勇敢地选择了武装反清道路，并发动了广州起义，这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①的起点，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正规时期。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口号，表面看来带有地主阶级反满派和旧式会党的“反满复汉”、“反清复明”的单纯“反满”色彩，但它们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不仅反映了清王朝是当时中华民族人民仇恨的焦点，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推翻清政府，恢复中国的主权和国威，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合众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取代腐朽的清朝封建政府，作为“驱除鞑虏”的最终目的。可见，孙中山为兴中会提出的民族主义纲领口号，是封建主义的尖锐对立物。它不仅扬弃明末清初以至近代传统的“反满复汉”思想，添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内容，而且也是对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保清”思想的初步否定。

列宁说：“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

^①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10页。

势（趋向）。”^①当然在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跟西方都不同，因而民族运动的内容也有别。孙中山为兴中会制定的民族主义纲领不是推翻清朝后要建立汉民族的“民族国家”，而是要把一切革命阶级的人民群众吸引到政治中来，“推翻满清政府”，建立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民主立宪政体”，让国民“来行民权”，“建国民政府”。^②所以，孙中山为兴中会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纲领，不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而是孙中山总结性地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为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而提出来的革命纲领。也是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思潮在理论上的总结和提高。

由于孙中山从兴中会成立之日始，就打起了革命旗帜，并领导了广州起义。事虽不成，但他在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心中树立了威望，逐渐成为各族人民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因而，清廷把孙中山视为“大逆不道”，缉捕在逃的“国事犯”。总理衙门还通知驻外使节“密切注意”孙中山的行踪。一八九六年十月，孙中山从纽约到伦敦不久，就被清朝驻英公使馆设计拘禁并将押解回国，“明正典刑”。因得他前在香港读书时的英籍老师康德黎的“竭力营救”，才脱虎口。孙中山虽遭迫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相反的，还更加锻炼了他的革命毅力和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正如他在一八九

①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08—509页。

②《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

七年写的《伦敦蒙难记》中所指出：“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更加决志革命“以谋吾祖国之进步”，并谋取“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①他利用伦敦脱险以后，继续留欧两年的机会，认真考察欧洲各国社会情况，细心攻读革命理论，在他思想上起了很大反应。他于“民族革命”之外，更加明确了“民主革命”的重要，又产生了“社会革命”的思想。这样就构成了旧三民主义思想的雏型。此后他就为实现三民主义纲领竭力奋斗，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领袖。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新觉醒，而且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总趋向。

正当孙中山积极为推翻清政府而奔波操劳的时候，一九〇〇年发生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镇压中国义和团爱国反帝的事件。清政府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中华民族的灾难更加严重了。“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中国近代又一次民主革命风潮和革命运动逐渐兴起。孙中山深受这一风潮激荡，认为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实现自己救国的革命主张时机已到，便于一九〇三年在日本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立了革命的政治方向。一九〇五年八月，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又把上述十六字革命宗旨定为同盟会努力奋斗的政治纲领。孙中山并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它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①《总理全集》（胡汉民编）第一集，第914页。

兴中会和同盟会是以孙中山为中心所组织的革命团体。此二团体先后代表着清季革命运动的主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网罗了世界各地革命运动中的重要理想；孙中山的领导，趋于联合而摒弃分裂。”^①兴中会之后的同盟会再以孙中山为中心而使革命力量结合，使全国各族人民有了一个革命的中心以及共同奋斗的明确革命纲领和目标。

关于同盟会的纲领，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有解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覆彼政府，还我主权”，“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②“创立民国”，是打倒清政府之后，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即“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③“平均地权”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即土地问题，企图达到“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④

孙中山为同盟会制订的政治纲领，虽然还不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但它却把资产阶级革命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明确地提了出来。所以，同盟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加快了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新形势的到来，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时期。

①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1976年2月初版，第452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二）第14—15页。

③④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二）第14—15页。

在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出现最早，宣传最力。

但民族主义是什么意思？对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何种影响？过去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满”民族主义，主张恢复“皇汉民族”统治，“实行种族同化，具有种族复仇主义色彩。”因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是消极作用。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阶级实质究竟是什么？它在辛亥革命期间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关系到对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评价以及对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发生何种影响的问题，有必要澄清。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推倒清政府，使汉族能够得到自由独立地位；但另一方面孙中山认识到以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中心的各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不能因为汉族独立了，就去压迫其他民族。所以，孙中山主张在清朝压迫汉族时，便去推倒清朝。清朝推倒以后，就主张国内民族“一切平等”，实行“五族共和”，建设一个统一、自由和独立、富强的中华民国。因此，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提出“民族主义”、“民族革命”；另一方面又提出汉、满、蒙、回、藏各族“共和”，作为解决清朝封建主义专制统治民族压迫这一矛盾的纲领。可见，孙中山要进行民族革命，显然是借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武器，去反对清朝封建地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并以民族主义作为一面革命旗帜，用以号召

和动员人民团结起来，把清政府打倒，然后建立一个以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实现“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①那种把孙中山民族主义简单说成是“驱逐满洲民族”的种族复仇主义口号，是违背孙中山为同盟会制订的民族主义纲领原意的。

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民族人民争取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和巩固政权。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摆脱民族压迫的问题是政权问题。”^②政权就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权。所以，摆脱清朝民族压迫的民族革命，实质是“政权”问题。正因如此，孙中山从未把民族革命仅仅局限在单纯“反满”这一点上，而是把民族革命与民权革命（即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孙中山认为，民权革命“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要改变当时“恶劣政治”，只有实行“民族革命”以后才能办到。但是，孙中山认识到要打倒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也“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③因此，孙中山说，民族革命必须与政治革命“并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④民族革命是干什么呢？孙中山说，民族革命不是要反对满族，而是要推翻以满族封建贵族为头子的

①《总理全集》（胡汉民编）第一集，第923页。

②斯大林：《反革命和俄国各民族》，《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197页。

③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

“穷凶极恶”的“满洲政府”，“还我主权”。^①“还我主权”，不是要建立汉族人掌权的封建政权，而是要“建立民主立宪政体。”^②孙中山说：清政府是“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③这个政府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不仅汉族人民不能忍受，也“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所以这个政府必须打倒，不仅是满人为君主革他的命，“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④并明确指出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取代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号召“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⑤所以，孙中山喊出“驱除鞑虏”口号，不是因为清朝是什么“胡虏异种”的朝廷，而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牢狱，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堡垒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不能容忍的敌人。

但是，认识问题受很多条件限制，因而程度有所不同。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族主义与反封建政权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 and 态度是很不一致的。有的革命者，如章太炎、汪精卫、朱执信、邹容等人，在痛斥清朝“满洲野蛮政府”时，满腔义愤，充满着对清朝腐败统治的仇恨。这样做，完全正确，因为他们充沛的革命热情对于人们革命激情的发扬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受大汉族主义思想影响，在揭露清朝罪恶行径时，却流露出一种狭隘的自居优越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在封建时代大汉族主义思想支配下，存在狭隘的大汉族

①⑤《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②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

③《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3页。

主义观念，本来是不奇怪的。但是在动员和宣传各族人民起来革命的过程中，大肆宣扬这种思想，并要革命人民起而效尤，就不对了。因为这种思想任其泛滥，不但会把人们引向大汉族主义单纯“反满”的斜路，转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向，而且还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团结和革命事业。对于这点，孙中山则比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比如，在同盟会成立时，就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作为会名，这些人特别强调组织“同盟会”是为了什么“反满”。孙中山当即解释说：“不必也。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①又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②始说服人们采用“中国同盟会”。但那些抱着单纯“反满”情绪或者具有报复思想来入会的人，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并不那么容易清除。所以，同盟会成立后，汪精卫等人就在《民报》上大发议论，一味宣扬复仇主义，非常错误地诬蔑满人是“丑类”，^③是“蠢如鹿豕者。”^④汪精卫还提出汉族要对满族实行“同化”政策，说什么：“如果不这样做而象以前明朝那样，汉族对于满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不辨地位”而“并包兼容”，那是不应“当”的。”^⑤朱执信还错误地提出：“今之革命，复仇其首”，^⑥要对清朝入关时大屠杀进行报复。当时的情

①田桐：《同盟会成立记》，《太平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②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2页。

③④⑤汪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一号，第30页。

⑥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一号，第34页。

况，正如鲁迅先生所回忆的：“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革命者的一些民族情绪，如改名“扑满”“打清”之类，“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①所以，对于当时所谓“复仇主义”宣传要作分析。清末革命者的复仇主义宣传，显然是有不少弊病的。但是，他们的宣传跟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是迥然有别的。因此，鲁迅先生说：清朝统治者“怕别人来报复”，便骗以人民说人家革命是“复仇”，借以反对革命，就这个角度说来，“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这是一。二是“城破之时，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了么？”鲁迅先生说，知道情况的人告诉我：“并不然。”^②汉人并没有对满人搞种族报复。由此可见，清末一些革命者在当时清朝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宣传民族革命，以民族精神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肠”，当然也表现了他们对于清朝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精神。然而，用丑化的恶言进行“反满”宣传，无疑对民族团结发生有害影响。特别是种族“复仇主义”情绪的大肆宣扬，只能是加剧满汉民族之间的恶感，引起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猜疑和民族仇恨的爆发。这种情绪不克服，不仅“反满”民族主义的目的达不到，还会给革命带来危

①鲁迅：《坟》，《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一卷，第318页。

②鲁迅：《坟》，《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20页，319页。

害。孙中山意识到这些不纯思想的严重危害，因而早在《民报》发刊周年纪念会上，他就严肃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种族复仇主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①“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②当初清人入关，“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那就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为此。”^③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权”，是反对“满洲人专制”，不是“复仇”。只要清朝满族封建贵族“始终执迷，仍然把持政权，制驭汉族，那就汉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视的。”但是，我们进行民族革命并不是恨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对于一般满族人民，只要他们不反对革命，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孙中山还明确指出，有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④，建立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共同参加管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列宁说：“民族压迫的政策就是民族分裂的政策。”^⑤针对清朝民族压迫所造成“国家衰弱”、“四分五裂”，民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1页。

②③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9页、74页。

⑤列宁：《民族平等》，《列宁全集》第20卷，第232页。

族不团结的情况，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发出号召：各省应该迅速“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提出了“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①并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②明确宣布了满、蒙、回、藏各族“与汉人平等”，实行“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这是很大发展。“五族共和”建国纲领的提出是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长期孕育起来，对自己祖国的统一和各族人民团结无比关切精神的发扬。中国是由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维护祖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清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不仅影响到祖国的统一，而且给中华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所以，孙中山在当时能够提出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为中心内容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建国主张，实为中国历史“亘古以来未有之盛举。”^③中国在过去很长历史时期内，由于存在过一种罪恶的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历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反动统治阶级，它不仅残酷地压迫本民族人民，而且更残酷地压迫其他民族，挑拨离间各民族关系，造成了民族间仇恨和隔阂。近百年来，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2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30页。

③《总理全集》（胡编）第二集，第81页。

国，各族人民在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反抗内部反动统治斗争中，认识到各民族命运密切相关，形成了各民族骨肉关系。但由于清政府执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各民族仍然互不信任，不够团结。这种现象的存在使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得不到应有发展。要使国家独立富强，必须加强民族之间的和睦和团结。所以，“五族共和”就成为孙中山在推翻清政府后解决“国家衰弱”，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中心口号。通过“五族共和”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境内各民族，首先是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政治上得到平等，使中国境内各族“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①

由此可见，“五族共和”不是孙中山想当然提出来的权宜口号，而是他根据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提出的一项带根本性的革命决策。正如孙中山所说：实行“五族共和”，此是为了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使“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不平等之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②所以说，由“反满”到“五族共和”，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总理全集》（胡编）第二集，第82页。

②《总理全集》（胡编）第二集，第84页、83页。

这种思想无疑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清斗争的一大进步，也是当时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所能达到的思想最高度。因为：

第一，他总结和继承了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以来至清末，各族人民“反满”斗争的长处，克服和纠正了当时流行的“种族复仇主义”偏见，把“反满”斗争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目标结合起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运动显示出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性。第二，他把“反满”同反对民族压迫和列强瓜分结合起来，^①指出“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推翻以满族封建贵族为头子的“穷凶极恶”的满洲政府，“还我主权”^②，“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这样就把“反满”斗争纳入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范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组成部分。第三，他利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去反对清朝统治阶级“宰制于上”的“大满族主义”，而代之以“一般的”“民族平等”观念，提出民族平等、团结的进步主张，开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平等的先河。

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虽然还不能把清朝满族贵族和满族人民彻底区别开来，但从他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可以看到，民族主义不是要反对全体满人，这则是无疑的。他所谓

①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回忆说：“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5页。

②《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

的“驱除鞑虏”，正如辛亥革命时重庆蜀军政府的对内宣言所说，“驱除鞑虏”，就是“扑灭虏建清政府”。“至对满洲人民，惟驱除有权力之首要”，^①即打倒满洲封建贵族。武昌民军《告荆州驻防文》亦公开声明过：“排满云者，不过推翻政府，并非剪灭旗人。”^②所以，“驱除鞑虏”，正如孙中山本人所说：不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而是要打倒“死命把持政权”，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一小撮满族贵族，“扑灭他的政府。”^③孙中山要“扑灭清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做得对不对呢？毛泽东同志说：孙中山先生做得“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④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倡“反满”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综上所述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强调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平等。在民族受压迫时，他强调发扬民族精神去反抗压迫；夺取政权后，他又强调“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发展中华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增强国家民族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民族压迫。所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跟一般资产阶级的民族主

①《蜀军政府之对内宣言》，《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六）第21页。

②《告荆州驻防文》，《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五）第267页。

③《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4页。

④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26页。

义是有区别的。

首先，它剔除了民族利己主义，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利益；

其次，它极力排除民族沙文主义弊病，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

再次，它宣传和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和光荣历史遗产，强调民族自信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因而，孙中山用以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所根据的原则是通过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反对民族压迫，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最终使我国各族达到政治理想上的共同性和利益上较前更大的一致性。正由于孙中山具有这种实事求是和诚心诚意地考虑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的民族观，使他比起一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站得高，看得远，较能正确地观察和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因此，孙中山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的民族革命主张，对于被统治的各阶级，对于中国的全体民众都是休戚相关的。它不仅能动员汉族人民起来革命，而且还能号召包括满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投身革命。

第 二 章

武昌起义前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 侵略与奴役的英勇斗争

一、东北各族人民反抗俄、日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沙皇俄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它为了肢解中国领土，分裂中华民族，长期来在我国东北、北部和西北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完成，沙俄向外扩张、争夺殖民地的活动也日益加剧。在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沙俄就充当了急先锋。它一面参加八国联军疯狂镇压和屠杀我国各族人民；一面又趁机大举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

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的三年中，沙俄出动十几万侵略军，对我国东北进行军事占领。沙俄侵略者和反动的清政府对义和团和忠义军采取“一律查拿法办、以绝根株”^①的手段，残酷屠杀无数英勇抗敌的中华优秀儿女。对我世代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赫哲等各族人

^①《盛京户部侍郎清锐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3页。

民，大肆奸淫掳掠，甚至大吃人肉，干下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行，犯下滔天大罪。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沙俄又违约不撤兵，死赖在我国东北不走，妄图把我国东北三省变成“黄俄罗斯”，把沙俄的国界延伸到中国长城脚下。

沙俄的疯狂入侵和强盗行径，激起东北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对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进行了反占领、反侵略的英勇斗争。义和团余部同东北各族人民组成的忠义军，联合作战，抗俄革命烽火燃遍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强盗。

“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① 早在一九〇〇年，沙俄侵略者的魔掌伸进黑龙江时，在保卫瑗琿的战斗中，鄂伦春士兵直接参战的就达五百人之多。^② 多布库尔路鄂伦春族马队也与俄军交战，而且“颇称勇敢。”^③ 沙俄入侵骚扰，大多数饱受苦难的鄂伦春族人民则“伏处深山，时出掳掠”，使侵略者“虽在城中，几同化外。”^④ 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以东，嫩江西北的鄂温克族、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族人民对沙俄侵略强盗的掳掠烧杀更是切齿痛恨，进行了长期的武装反抗。遍布东北三省的满族人民，从一九〇〇年起同蒙古、汉各族人民一起踊跃参加忠义军。他们在“誓同生死

①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402页。

②《瑗琿县志》卷8，卷13。

③《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呼伦贝尔附件。

④《黑龙江志稿》卷43，职官志。

共甘苦”，“御俄寇，复国土”战斗口号下，肩负起抗俄反清历史重任。以忠义军为中心的东北各族人民群众的抗俄反清斗争，到一九〇三年虽然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但分散的小规模的抗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沙俄在远东扩张，霸占我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看作是他们对外侵略的障碍。为了阻止沙俄对东北的垄断，日本和英国结成联盟，“准备了日本对俄国的战争。”而野心勃勃的沙俄帝国主义妄想战胜日本后，更肆无忌惮地分割中国，便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领土上，发动了一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日俄战争。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别国领土而互相厮杀的战争。这场战争从一九〇四年二月开始至一九〇五年八月结束，历时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战争中，不仅俄国、日本无数的人民送了命，带给中国东北各族人民的损害和灾难更是罄竹难书。我国东北各族成千上万的人民在炮火下死亡了、残废了。免于死难者，则“无家可归，近于流莩”^①。无数的房屋被轰毁，仅奉天盖州海城县满、汉各族被“扰者有三百村，计遭难者八千四百家，约共男女五万多名。”^②辽阳附近“大小战”，造成“村舍为圯，小民转徙流离哭号于路者，以数十万计。”^③自旅顺迤北，直至边墙内外，俄日军队所到之处，多被侵袭，沿途抢掠，“菽黍高

①《日俄战纪》第15期，第87页。

②《日俄战纪》第16期，等77—78页。

③《程中丞奏稿》第2卷，第27页。

粮，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①“至此民已不复聊生。”^②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就连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办的《盛京时报》都不得不供认：东北各族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③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置东北各族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在日、俄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不敢“出一言”为百姓“辩护”。^④地方官吏“坐视吾民之破家荡产，断脰绝脰”，充分表现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反动。

富有反抗精神的东北满、蒙、汉等各族人民，为了保家卫国，勇敢地站在斗争最前列。一九〇四年六月，由汉、满、蒙等各族人民组成的抗俄反清义军，在铁岭、金州、复州、岫岩、海城、大石桥、营口、辽阳以及兴京（今新宾县）等地，对俄军发动一系列袭击，歼敌甚多，并曾夺回兴京城。在敌占区内，汉、满各族人民到处拆毁铁路、割断电线、烧毁仓库、袭击俄军。日本侵略军占据辽东后，辑安（今集安县）一带各族伐木工人对日寇“抢劫骚扰”，极其“忿恨切齿”。他们利用山林的有利地形进行伏击战，“视死抗拒”，大量杀伤日军。并阻碍了安奉军用铁路修筑。^⑤安东（今丹东县），

①《日俄战纪》第13期，第85页。

②乔芝三（德秀）：《南金乡土志》第11页。

③《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十八日。

④《东三省权宜策》，《东方杂志》第1卷，第9期。

⑤《辑安县乡土志》外交公牒，第2—5页。

貔子窝等汉、满各族人民也经常袭击日军，使日军的狂妄野心不能得逞。

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吉林省延边地区。仅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两年中，就有一千多名特务在延边地区进行军事侦察和间谍活动。同时大肆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策划和煽动民族分裂，来达到其侵占我国延边地区的罪恶目的。一九〇八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借口“保护朝侨”，公然派遣侵略军进占我延吉县龙井镇，并在那里设立侵略机构——“朝鲜统监府派出所”，任命曾在延边长期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日本侵略分子斋藤和筱田为正副所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占延边，然后把朝鲜和延边连成一片，最后吞并整个中国东北的罪恶目的，采用诱迫办法在一九〇九年同清政府签订了所谓《中日图们江界务条款》即《间岛协约》。根据“协约”，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吉长铁路的兴修权和掠夺性的贸易特权。并且将原设于龙井的“统监府派出所”，改为“日本总领事馆”。同时，还在局子街（今延吉市）、珲春、百草沟、头道沟等地先后设立了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及其走狗机构——“朝鲜人民会”，对我国延边朝鲜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奴役和掠夺，使朝鲜族人民蒙受日本侵略强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双重统治和压迫。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延吉一带朝鲜族和汉族人民的誓死反抗。东北其他民族人民也采用各种形式开展斗争。

吉林满族知识分子松毓，在一九〇八年五月创办《公民日报》，发表爱国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竭力抨击日本掠夺吉长铁路修筑权，侵犯我国主权。由于日本侵略者借机寻衅，诬陷安奉路“苦力”茹世臣“诬窃妄拿”，激起各族“苦力”工人的愤怒，群起与侵略者展开搏斗。奉天抚顺千金寨日本居留民“仗势逞凶”，“华工大愤，环殴日人神谷茂三郎身死。”^①铁路沿线各族人民反对日寇占地筑路的斗争，更是层出不穷。例如，砍取电线，破坏铁轨，阻碍运务，连年不断。据《盛京时报》一九一一年秋记载，“南满之日本电线，两年内被中国人砍取共至一百八十次之多。而铁路被华人之害，自一九一一年正月起到五月止，未及半年，已至十三次之多。”^②

这时，正在成长起来的东北满族工人阶级也参加了斗争。一九〇八年六月，清政府答应日本帝国主义“中日合办鸭绿江木植公司”。日本侵略者趁机大肆掠夺木材，甚而“查验流筏”，激起安东（今丹东）附近大沙河子满、汉各族伐木工人无比愤慨。他们结队赴东边道衙门前示威，“势甚汹汹”，打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山田左，终于迫使日本领事署“将木材厂派员查验木筏暂时停办。”^③同年九月，在奉天省城“油房”中做工的满、汉各族工人，为抗议厂主

①《清季外交史料》（宣统朝）第19卷，第36—37页。

②《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二十日。

③《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九日，六月十一日。

减低工资，“一律停止工作，以资抵制。”①

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刚开头的几年里，我国东北各族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是作出过贡献的。他们在反对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二、藏族人民抗击英、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中国西南的屏障。西藏居高临下，俯视整个印度半岛，在战略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沙俄为实现其征服亚洲，建立俄罗斯大帝国的狂妄计划，早就把中国西藏列入它们侵吞的殖民计划之中。而老牌的帝国主义英国，为了称霸亚洲，把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由东到西结合在一起”，早就把侵略魔掌伸进中国西藏。沙俄同英国为了宰割中国的西藏，在二十世纪初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沙俄为了击溃英国在西藏的势力，把我国西藏捞到手，早在十九世纪末，宫廷内外一些决策人物就开展了侵藏的猖狂活动。沙俄侵藏的主谋人物之一——华俄道胜银行总裁埃·埃·乌赫托姆斯基，② 早在一八九二年就发表了《到拉萨之路》一文，③ 鼓吹俄国必须占有西藏。一九〇四年，乌

①《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十四日。

②埃·埃·乌赫托姆斯基，即清文献中的乌和他木斯科侯爵，参看《清德宗实录》卷404。

③见《俄罗斯观察》杂志，（1892年4月份），第四册，第709—764页。此据张广达：《沙俄侵藏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1期所引。

赫托姆斯基就英国进军侵我西藏一事，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漫谈喇嘛教地区》。^①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叹息：“我们来晚了。”^②充分流露出沙俄侵藏不甘居人后的决心和意志。乌赫托姆斯基声称，往者不可复，来者犹可追，希望沙俄政府趁早在精神上征服和控制西藏，并包括蒙古、青海等广大信仰喇嘛教的地区。一九〇〇年，沙俄在镇压义和团运动，霸占我国东北的同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又在策划把包括西藏在内的尽可能多的中国领土括入俄国版图。为此，沙俄除派出大批以所谓科学“考察队”之名的特务分子闯入青海、西藏外，还派遣大批间谍分子到西藏进行策反活动，妄图通过拉拢、收买、控制以十三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贵族，投靠沙俄，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散住在拉萨三大寺中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就达二百多名。^③其中名声最丑，罪恶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德尔智的家伙。德尔智出生于贝加尔湖地区，是俄籍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就学时，就被沙俄选中。早在一八九八年，沙俄就派德尔智带着许多“礼物”到拉萨，妄图通过大量“布施”，即贿赂来收买西藏官员，煽动达赖十三世叛国投靠沙俄。^④达赖在沙俄的利诱煽动

①《漫谈喇嘛教地区·论英人远征西藏之役》，第128页。

②彼·叶·斯卡奇可夫：《中国学书目志》，莫斯科，1960年版，第189页，第5100目。

③《西藏通览》第二编，第四章。

④（日）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下册，1904年东京版，第169页。

下，终于选定德尔智为自己的侍讲。并在一九〇〇年和一九〇一年两次“派遣”德尔智及达赖的仲译钦波（主任秘书）为其“代表”前往俄国活动。沙皇及其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和财政大臣维特分别接见了德尔智，并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讨论了在“俄京彼得堡设立西藏永久使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①当德尔智等返回西藏时，沙俄趁机派参谋部军官专程护送，并运去一批枪枝、弹药、货物。接着，沙俄派两支军队侵入西藏。一支由军官亚历山大·尼克拉维奇·奥罗夫率领，打着“科学探险队”名义，由两百匹骆驼运着枪弹，经库伦（今乌兰巴托）到拉萨；另一支由受参谋部间谍训练的外交官员、布里亚特蒙古人赖穆皮尔率领，以“商队”名义，由十匹马和两百头牦牛载着枪械、弹药、经青海到拉萨。

沙俄加紧对西藏的侵略活动，引起英国的忧虑。当英国得悉达赖派“特使”赴俄后，便于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以英印事务大臣的名义向沙俄外交部发出照会，声称英国对他们的接触“势不能沉默不问。”②一九〇二年六月，英国派军队从锡金北部越境，侵入我西藏南部康巴宗南的甲冈地方，作为对沙俄侵藏势力的抗衡。一九〇二年七月，当时许多报

①黎敦岛：《俄人东侵史》，哈尔滨1930年版，第267页。

②荣赫鹏：《印度与西藏》，孙煦初中译本改名为：《英国侵略西藏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6页；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七章《英军远征》，一九三〇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纸盛传所谓中俄之间签订了西藏密约，英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俄若派兵西藏，英必效之，且所派之兵力，必厚于俄之兵力。”^①英国侵入西藏，不仅加深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也引起沙俄统治者暴跳如雷，并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声称：“英国此次远征，或将发生异常严重的局势，因而迫令俄国不得不采取一切手段，“以保护该处俄人之利益。”^②这不仅赤裸裸暴露了沙俄妄图霸占中国西藏的侵略野心，而且也笼罩着沙俄与英国争吞中国西藏的阴云。

英国看穿沙俄正忙于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三省，无力西顾，不但不理睬沙俄对它侵藏的质议，并以它当时的殖民地印度为据点，猖狂准备入侵西藏。

一九〇三年十月，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英印殖民当局武装侵略西藏的计划。^③第一批侵略军由两千余人组成，于十一月初由哲孟雄侵入西藏。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英国再次派出军队，在以侵略头子荣赫鹏为首的所谓“商务使节团”的伪装下，越过中印边界再次占领我国康巴宗，对我国领土完整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年冬天，英国侵略者搞了一个假撤军真备战，将康巴宗军队撤回，马上又调整部署组织一支

①《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致英驻俄大使斯科特电》（一九〇三年二月十八日），见《英国蓝皮书》1920年第183页。

②《英国蓝皮书》（第2370号）译文，载华企荣：《西藏问题》第三编《西藏之外交》，一九三五年版。

③荣赫鹏：《印度与西藏》，孙煦初中译本《英国侵略西藏史》第116页。

由荣赫鹏、麦克唐纳率领的四千余人的“远征军”，突然侵占我国西藏的卓木，并迅速向西藏腹地挺进。英国强盗所到之处，烧杀掳掠、逞凶肆虐，激起西藏人民的极大愤怒。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三日，英国侵略者利用清政府的昏庸软弱，以及沙俄因日俄战争无力西顾的机会，向我西藏大举入侵，攻占江孜。八月三日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拉萨。^①

英、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引起中华民族，特别是藏族同胞的愤怒抗争。

一九〇〇年十月，沙俄匪徒窜入我西藏东部地区作恶，藏族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得“象一堵墙一样”，屹立在侵略者面前，责令沙俄侵略者滚出中国领土。当这批强盗开枪逞凶屠杀藏族同胞时，藏族人民奋起反击，严惩强盗。

一九〇一年和一九〇二年沙俄特务德尔智率领所谓“西藏代表团”到俄国活动，侵犯中国主权，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尤其是引起西藏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慑于人民斗争的压力，也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令清政府驻俄国代办胡惟德，指斥这个所谓“代表团”的非法行为。并严正声明：沙俄政府“如与藏人订约，中国决不承认。”^②一九〇四年德尔智裹胁达赖十三世到外蒙，企图挟持达赖叛国投俄。各族人民奋起斗争，终于挫败沙俄妄图通过控制达赖吞

①《有泰奏牍》卷一，第11页，载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第三册。

②张荫棠：《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载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第一辑，第三册。

并西藏的阴谋。

与此同时，藏族人民对英国的侵略也进行顽强抵抗。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英国强盗偷越则利拉，向中国西藏腹地进犯，突然袭击帕里。西藏爱国军民在帕里选择险要地点，用羊毛包构筑工事五六十处，阻击敌人，多次打退英国侵略军的进攻。一九〇四年一月，英军进占帕里，悍然扣留了中国西藏地方代表。帕里藏族人民机智勇敢，于当晚手持各种杀伤武器冲进敌军盘踞的宗政府，救出了谈判代表。藏族爱国军民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还在喜马拉雅山第三峰角下拉莫湖畔驻军设防，修筑工事，抗击入侵者。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斗争，虽因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秉承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旨意，同英军头目荣赫鹏勾结，竭力破坏，造成了藏族爱国军民反侵略斗争的失败。^①但是，藏族人民并没有被侵略者的凶焰吓倒，当英军向江孜进犯时，藏族人民又沿途进行偷袭和阻击，仅在康马一地，藏族爱国军民就给英军严重打击，连英国侵略者也不得不惊呼：“（西藏军民）几十个人奋起猛攻比他们强大得使他们的斗争成为绝望的敌人，拼死命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②一九〇四年四月，西藏爱国军民又在著名的乃尼寺一带同英军激战。藏族人民奋不顾

①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是个软骨头。一九〇四年四月十八日，有泰致英国侵略头子荣赫鹏照会，声称：英国“恩威并著，造福西藏”，完全丧失民族气节。并同荣赫鹏勾结破坏藏族人民的抗英斗争。（吴丰培辑：《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1集，“藏印往来照会”，第59页）

②康特莱：《拉萨真面目》，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西藏地方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7页。

身，冲入敌群，挥刀砍杀，击杀英国侵略军官兵多人。西藏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打乱了英国侵略西藏的日程表，正如荣赫鹏在给英国政府的电文中供认：“藏民两次抗拒，致不得达甘志（即甘孜）。”^①但是，由于清政府腐败和西藏地方以十三世达赖为首的农奴主统治集团，不可能依靠人民坚决抗战，因此，广大藏族爱国军民的抗战，尽管英勇无比，战果辉煌，终将无法扭转战场上的败局。四月十一日，英军终于侵占了江孜。英军到江孜后，立即要挟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要压服西藏地方当局对英军投降，不准反抗，对待英国侵略者要“恭而且敬。”^②并在江孜烧杀掳掠，逞凶作恶。英国侵略强盗侵占江孜犯下的残暴罪行，正如西藏人民编成的一首歌谣中所传唱的一样：“年楚河的波浪滚滚，流不尽江孜人民的心头恨，雅鲁藏布江的江水哟，也洗不尽西藏人民的满肚子冤。”^③但是，英军的嚣张气焰，不仅没有把藏族人民吓倒，反而更加激起藏族人民的复仇怒火。为保卫江孜，藏族爱国军民跟侵略军展开白刃战，浴血奋战三个月，击毙大批敌人。一九〇四年五月，西藏军民经过英勇的斗争，并一度把英军赶出城内，收复了江孜宗政府，控制整个市区，英侵略军头目荣赫鹏狼狈万状，穷蹙万分。六月五日荣赫鹏，带着三、四十人滚出江孜。当他们逃窜到康马时，

①《藏英战事纪要》，《东方杂志》（1904年）第四期，第205页。

②《荣赫鹏致有泰照会》，《西藏地方史资料选辑》第203页。

③魏克：《一九〇四年西藏人民抗英斗争调查记》，《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34页。

又为三百多藏民包围，险些被活捉。^①在我藏族爱国军民的英勇打击下，侵略军威风扫地以尽。从五月初到六月下旬，西藏军民把入侵江孜的英军围困达五十天。七月五日英军集中兵力猛扑江孜宗政府的所在地宗山，爱国的藏族军民修筑工事，用土枪、石头，坚守山头阵地，袭击敌人营房，敌人围攻了几天仍然打不上去。后来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西藏各族爱国军民还临危不惧，奋勇搏击，杀得英军尸首遍地，哀声遍野。在藏军撤离江孜后，当地藏族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抗英斗争。他们同来不及撤走的藏军一起，用石头、木棒同敌人搏斗。^②他们奋不顾身，闯入敌营，英勇杀敌，狠狠地惩罚了这伙帝国主义侵略强盗，把敌人打得狼逃鼠窜。西藏爱国军民的英勇斗争，给侵略者狠狠地上了一课，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西藏人民所表现的坚决、机智和英勇，对我们这些曾亲眼看见他们袭击我们营地的人们来说，完全不足为怪。那种认为西藏人不能战斗的荒谬想法，应当消除净尽。他们的勇敢，是超等的。”^③

七月十四日，英军数千人向拉萨进犯。英军每到一地都遭藏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八月三日，英军侵占拉萨。侵略者在拉萨烧杀淫掠，并将布达拉宫各种珍贵宝物和文物劫掠一

①杨建新：《一九〇四年英国对我国西藏的武装侵略》，《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2期。

②向阳：《一九〇四年西藏江孜地区抗英斗争史料》，《民族研究》1959年第6期。

③华达尔：《拉萨和它的神秘》，《西藏地方历史资料》第207页。

空。①英军进入拉萨后，即以胜利者姿态，提出事先拟定好的条约草案，强迫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字划押。但是，清政府慑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指示驻藏大臣不得在草约上签字。恼羞成怒的英国侵略者只好于一九〇四年九月，与噶丹池巴和拉萨三大寺的代表，在所谓《英藏条约》（又称《拉萨条约》）上签了字。②整个条约除了规定开放商埠、赔款、销毁从边界到江孜、拉萨等地的炮台和防御设置外，还妄图否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把西藏看作独立国。全国各族人民对此十分气愤，纷纷起来声讨英国侵略者。拉萨各族人民指斥英国侵略军为“洋鬼妖精”，拒绝给英军供应粮食，并组织游击队经常袭击英军。拉萨各寺庙的两万多名爱国宗教人士还准备执干戈“坚守城垣”。在各族人民不断打击下，侵略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正如荣赫鹏所招认的，他们处在“内慌乱而外镇定”③的绝望之中。

二十世纪初，西藏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在我国近代各族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斗争锻炼了人民，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友谊。在西藏的汉族人民也同其他

①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孙梅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6页。

②该条约见《西藏外交文件》第76—82页。

③荣赫鹏：《印度与西藏》。译文见孙煦初译：《英国侵略西藏史》第207页。

兄弟民族人民一起，进行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在“西藏阵亡的战士中，有许多是与藏族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外国殖民者的汉族人。”^①这是西藏各族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光辉业绩。西藏各族人民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将彪炳千秋，为中国各族人民所继承和传颂。

三、云、贵、川各族人民抗击英帝国主义武装进犯 和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十九世纪下半期，正当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时候，英帝国主义也向我们的友好邻邦缅甸疯狂进犯。一八八五年英国并吞缅甸后，就以缅甸为据点，猖狂向我国西南边疆入侵。英国侵略者妄图通过侵占云南、西藏，然后把魔爪伸入长江上游，同他们在长江下游的侵略行动相配合，一举控制长江流域，并把它作为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这个侵略目的，从十九世纪末起，就不断派兵侵犯我国云南省德宏陇川边境和镇康县西部的许多村寨。虽遭我国景颇及其他各族人民和驻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抗击，连遭惨败，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不死。一九〇〇年英帝国主义悍然入侵云南高黎贡山以西，我景颇族聚居地片马附近的茨竹、派赖等寨，兽性大作，“屠杀一空。”^②我

①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张方廉译，民族出版社，1959年版，第85页。

②华企云：《滇缅界务之实况》。

当地景颇、傈僳、汉族人民，同我国驻防的爱国军队一起，英勇抵抗，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军。在这次战斗中，我爱国军民百十余人亦壮烈牺牲。^①随后，英国侵略者还在我国云南边境不断窜犯，但所到之处都遭我云南各族人民的英勇反击，不能得逞。一九一〇年冬，英国侵略军又由缅甸密支那进兵二千余人，侵占了我国的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并驻重兵于片马，胁迫各族人民投降。片马、古浪、岗房位于云南省西部，西北控野人山，西南蔽高良工山，高屏高黎贡山，为云南西部的门户，是缅甸入滇、川、藏最便捷的要道和由云南赴江心坡必经之地。占领片马、古浪、岗房三地就等于扼守滇西要隘。所以，英帝国主义武装侵占片马等地后，便急忙强设军事机构，设置侵略据点，私立界桩，修筑军事运输马路，为进一步侵占我国西南领土作准备。

英帝国主义侵犯我国片马等地，践踏我国领土主权，“举国愤慨”。各族人民纷纷要求清政府“派兵驱逐，保全疆土。”各地的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强烈要求英国侵略者撤出片马等地的愤怒声震惊中外。深受其害的云南省各族人民，情绪更高，反抗更坚。他们组织了“中国保界会”，宣言抵制英货，全力抵御英国侵略。英帝国主义畏惧中国各族人民一致奋起抗争，便于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给中国政府照会，被迫承认片马、古浪、岗房是中国领土。^②但又以“永租”

①尹子章：《茨竹隘土守备左孝臣传》，《永昌府文征》列传，卷3；尹明德：《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载《云南边地问题研究》。

②周恩来：《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新华月报》1957年第15期。

为借口，不撤退侵略军，在片马遍布警岗，并继续进占登梗。在茨竹、丫口等地私立界桩，强征户税，步步进逼。中国政府再三要求英国撤兵，英国置之不理，继续霸占。我当地各族人民为了保家卫国，英勇不屈，前仆后继，进行了长期的可歌可泣斗争。但由于英帝国主义的阻挠，片马问题一直成为悬案。只是到一九五六年根据中缅两国边界条约规定，片马、古浪、岗房等地，才由缅甸联邦政府归还中国。

在云南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斗争的同时，云、贵、川三省各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文化侵略的斗争也继续发展。

二十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在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中，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猖獗起来了。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反动统治者要维持压迫、剥削大多数人，要实行反动的统治，除了靠反动的国家机器，如反动的军队、警察、监狱等，硬的一手外，还需要软的一手，在这软的一手中，宗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手段。同样，帝国主义在侵略别国的时候，除赤裸裸武装进犯外，也常常派遣牧师进行宗教侵略，用以麻醉和愚弄被侵略国家的人民。

恩格斯说：“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②。为了用谎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

^②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48页。

话来欺骗和麻醉中华各族人民，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派遣大批以传教和办“慈善”事业为幌子的侵略分子疯狂地涌进我国，深入到中国各民族的穷乡僻壤。他们与地方官府勾结，包揽词讼，任意欺压和奴役各族人民；勾结清政府在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反动官吏，收买地痞流氓、恶霸、罪犯入教。他们在宗教伪装下进行侵略，也始终掩盖不了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各族人民对帝国主义宗教分子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极为愤慨，自始至终都坚持反抗和斗争。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的加强，各族人民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也在经过义和团运动这次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总爆发之后，又继续发展了。

在这场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生活在祖国西南云、贵、川三省的各族人民表现得极其勇敢和坚决。彝、藏、傣、傈僳、怒、纳西、景颇、苗族及其他民族的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投入斗争行列。早在一九〇〇年五月，云南省昆明各族爱国人民为抗议法国领事方苏雅偷运武装入昆，就集合二万余人，奋起捣毁了平政街天主教堂，并放火烧了“主教公署”和小东门外的法国修道院及法国侵略者的工程师住宅。昆明东郊金马山下的农民群众，为应援城内人民的斗争，他们也烧毁了金马寺附近狗饭田的天主教堂（若瑟堂）。法国驻昆明领事方苏雅被昆明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吓破了胆，匆忙逃离昆明。^①经过昆明人民的打击，据法国人古德尔孟所

^①《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贺宗章：《幻影谈》；杨琼：《滇中琐记》。

著《云南游记》中说：“自领事撤退事件宣传巴黎，凡抱野心者皆徘徊瞻顾，裹足弗前。”^①在四川，各族人民反教会侵略的斗争更是接连不断。西昌地区黄连关农民出身的张耀堂，自一九〇二年起，便在西昌、大凉山地区积极组织彝、汉族人民，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宗教侵略。这些起义虽为帝国主义传教士和清政府官吏所镇压，但是帝国主义传教士和清政府的罪恶行径，却为人民所识破，更加激发了彝、汉族人民的斗争热情。此后在西昌、凉山各地彝、汉各族人民毁教堂和赶走教士的斗争便接连发生。四川省其他地方也是“人心浮动，各处堪虞，仇教、仇洋之广告，几乎无地无之。”^②一九〇五年在犍为县各族人民掀起仇教运动和反对地方官府无故对各族人民进行勒索后，川边巴塘藏族人民又举行反对清政府及其庇护下的法国天主教會的武装暴动。

这次群众暴动的诱因是凤全。凤全是清朝反动官僚，因他一九〇四年在四川嘉定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被清政府提拔为驻藏帮办大臣，去整顿西藏局势。凤全到川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便立即“招募士勇”，强化反动武装，加紧对藏族人民的镇压。到了巴塘见“地土膏腴”，即招汉人开垦，引起巴塘藏民不满，出而阻止。凤全不听，于巴塘的茨梨陇筑垦场，委任巴塘粮员吴扬玲、都司吴以忠兼垦。又因凤全所带卫兵，“司洋操，用洋鼓号”，藏民疑

①《云南杂志》（1907年）第六号译文。

②四川大学藏原区县档案《义和团专卷》。

凤全为“洋官”，阻垦更剧烈。藏族人民怀着对清朝封建压迫的强烈不满和对“洋官”的极大仇恨，群起“劫垦场，杀垦夫”，逐凤全。一九〇五年初，凤全又请求清政府限制喇嘛寺人数，每寺不得超过三百名，其余一律遣送回家，并规定要在二十年内“停止剃度”出家。凤全这些作法激起川边藏民的无比愤慨，并触犯了僧侣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便利用广大人民反压迫，反对“袒护洋人”、专事媚外卖国官吏的革命情绪，来实现其扩大地盘野心，煽动群众杀死了凤全及其随员百余人，劫掠“粮署”，并焚毁外国教堂，惩处了为非作歹的法国传教士。^①

川边巴塘藏民武装暴动虽然遭到镇压，但是风潮很快蔓延到理塘和滇边一带。一九〇五年云南阿敦子（今德钦县）藏族人民在巴塘藏民武装暴动的影响下，联合当地纳西族、汉族人民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清政府“护教杀民”的武装斗争，围攻阿敦子教堂，驱逐英、法侵略分子。卖国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相勾结，从丽江府维西厅出兵剿杀爱国人民。愤怒的各族人民不畏强暴，同前来“护教杀民”的反动清军进行坚决斗争，放火焚烧了阿敦子和况中两处教堂，并处死了英、法侵略分子和助教为恶的清朝官兵。在三个多月的英勇斗争中，藏、汉各族人民包围了丽江府维西厅和清军三个营，击毙清军官兵数百人。被围困的清军弹尽粮绝，

^①关于凤全和巴塘藏民暴动经过，见《清史稿》卷459，列传240；《清季外交史料》卷191，19—22页；吴丰培：《记清光绪三十一年巴塘之乱》，载《禹贡》（1936年）卷6，第12期

面临绝境，被迫杀死二名替罪“祸首”向人民求和。各族人民解除对清军的包围，给被围困的清军以生路。但是清军解围后，即对人民进行疯狂报复。从大理、鹤庆等地调集重兵对阿敦子各族人民进行镇压，野蛮地屠杀起义的藏、汉等各族人民，镇压了轰轰烈烈的阿敦子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①同年，英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派遣披着基督教外衣的特务间谍分子潜入我云南省阿佤山区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企图用“牧师”和武力相结合的手段，先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上打开缺口，强迫佤族群众信奉基督教。佤族人民识破侵略者的卑鄙目的，坚决拒绝信奉基督教。班洪和班老等地佤族人民坚拒外国侵略者入境，致使英国侵略分子的阴谋大受挫折。

二十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贵州省苗、布依、水族居住地区的侵略活动也极其猖獗。披着宗教外衣的法国侵略分子在都匀、三脚、独山、贵定、八泰、贞丰、罗甸、安龙、册亨等地，建教堂、办学校、设医院，横行无忌，任意欺压各族人民群众。他们还亲自出马镇压人民的反抗；调查贵州省地下资源、搜集政治、经济情报；甚至包庇恶霸地主，收容地痞流氓为教徒。

受外国传教士欺压的各族人民屡次向清政府申述，请求限制帝国主义传教士的违法行为。但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卑躬屈膝，竭力袒护，互相勾结，仗势欺人。贵州都匀府知府潘家恂屈服于帝国主义传教士压力，委派大批教徒充当“团首”，作为帝国主义在农村中的代理人。并以举办洋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2；《民国维西县志》大事记。

务，招练“新军”为名，向各族人民按户摊派粮饷。不堪忍受欺凌的都匀内套外套（今基场、潘洞、富河三地）的苗、水、布依各族人民，便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在吴朝俊的领导下，以“联团灭教”、“灭洋兴汉”（汉即祖国）的口号相号召，发动了反教会运动。起义群众驱逐法国传教士，杀戮庇护侵略者的民族败类。起义群众还打入都匀府砸开牢门，救出因反对招练新军及苛捐而被迫害的各族群众。^①接着贵定、独山、荔波、都江、定潘、青岩、开州（今开阳县）、兴义、永宁（今关岭县境）、遵义、仁怀、清平等地各族人民亦纷纷响应，举行起义，捣毁教堂，惩罚侵略者及那些欺压群众的宗教徒。参加反教会斗争的各族群众建立武装，扎驻营盘，控制着广大农村，声势浩大，致使法国侵略分子惶恐不安。法国传教士谭尚礼气急败坏，向贵州巡抚提出所谓“严重抗议”，并要挟地方官吏派兵保护教堂和镇压群众。清政府腐败不堪，他们把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斗争说成是什么“凶顽不法”，并杀气腾腾地狂吠，对各族起义群众“非痛惩不足以慑服。”随之便派遣贵东道反动官吏瞿鸿锡领兵分路进剿起义群众，并严令各级地方官员派兵保护传教士和教堂，充分表现了清政府充当帝国主义走狗，镇压中国各族人民的反动本质。清军的镇压，遭到苗、水、布依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与清军周旋战斗整整一年。到一九〇七年二月，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是，这次斗争严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动摇了法帝

^①《贵州省都匀府志》第七卷《年纪》。

国主义在黔东南的统治。各族人民通过斗争，又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面目，更加激发了斗争的热情。

一九〇七年，法帝国主义神甫任安收等侵略分子，在云南省怒江贡山县白哈罗、茶兰等村，胡作非为。他利用当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等条件，大搞投机生意和放高利贷残酷剥削群众，迫使各族人民成为外国教会的奴隶。任安收还肆意霸占傈僳、独龙、怒、藏等各族农民土地，强派民工，摊派款项，强迫群众搬家让地，大盖教堂作为侵略据点。并且强迫怒、藏、傈僳等族人民放弃信仰已久的喇嘛教，改信天主教，甚至任意毒打藏族喇嘛。各族人民再也容忍不下去了。丙中洛、白哈罗等地各族群众勒令任安收滚开。任安收仗恃法帝国主义的“威风”，负隅顽抗，坚持不走。愤怒的傈僳、独龙、怒、藏等族人民群众立即拿起武器，围攻白哈罗教堂，杀死了五个顽抗的侵略分子，任安收吓得躲藏到牛圈而侥幸逃脱。^①各族群众放火烧毁了教堂，给侵略者应有惩罚。

一九〇八年，德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从事间谍活动的布沦胡拍又以“探险”为名，携带武器潜入云南福贡。当他行抵腊乌村时，也为我傈僳族人民处死。云南昭通彝族人民，从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八年间，先后捣毁了英国教堂，痛打了挂着“牧师”招牌的英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拍格里和索仁里的亲

^①孙代兴：《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云南的侵略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云南历史研究所：《民族与地方史研究》，1975年第1期。

信颇拉德等人，驱逐了传教士。并在一九一〇年，发展成为反抗洋教侵略的武装斗争。彝、汉各族人民在“灭洋”的口号下，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奋起打击侵略分子及其帮凶，“凡信奉耶稣教之村庄，悉被焚毁”，致使那些依附“洋教”，投靠侵略者的教民“无家可归”。传教士狼狈逃窜，无处藏身。最后英国驻昆明领事，迫使云贵总督派兵“弹压，”^①才结束了这场斗争。一九〇八年，英国传教士巴尔克带领仆从七人，由西昌经昭觉，潜入四川凉山腹心地区牛牛坝，以“探险”为名，勘测地形，绘制地图，为英国侵夺凉山地区的地下宝藏作准备。彝族人民十分愤怒，在阿侯瓦吉、苏呷火石古博的组织领导下，将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巴尔克阻拦在连渣涝河附近口士脚地方。巴尔克见势不妙，逞凶作恶，用手枪打死彝族同胞两名。彝族人民群众奋起，用石头把巴尔克砸死，其他六人被俘为娃子（奴隶）。英国政府借此要挟清政府派兵“进剿”。一九〇九年七月清政府指令四川省总督赵尔丰从西昌、马边两路派兵进犯凉山牛牛坝，彝族人民组织起来，沿途截击和坚决抵抗，打死清军很多人，迫使清兵在凉山不能停留，便仓惶逃遁。一九一一年法帝国主义传教士侵入凉山地区，搜集情报，并妄图盗运我国文物，也为德昌彝、汉各族人民截获。法国侵略者气急败坏，竟敢开枪射击，行凶杀人，彝、汉各族人民当场击毙罪犯，截留下全部赃物。

清朝末年，以各族农民为主力的反外国教会侵略斗争，

^①云南省宗教事务处档案：《云南省宗教情况》。

是近代中国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鼓舞各族人民为保卫祖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继续不断地进行英勇斗争。

第 三 章

武昌起义前各族人民反抗封建 压迫斗争的新高涨

一、同盟会建立前各族人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①义和团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从此，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开始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新阶段。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内政的极端腐朽和外交上的投降卖国，引起国内各族人民的普遍痛恨和反对。清朝统治者为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卖国朝廷，一方面加强了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和少数民族中的上层统治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和剥削各族人民。因之，全国各族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斗争的同时，反抗国内封建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也连绵不断，每次斗争都打击了反动的清王朝，

^①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373页。

并加速着它的崩溃和灭亡，同时也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以广西会党组织的反清起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

广西地处边陲，又是多民族聚居区。在中外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下，广西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素来贫苦。在帝国主义的掳掠和清政府赔款摊派以及偿还借款、举办所谓“新政”经费的勒索下，广西壮、汉、苗、瑶等各族人民的负担极其繁重。加上“吏治不修”，^①“酷吏”随便“劫掠民财，草菅人命”，吸尽民脂民膏，把各族人民逼到死亡线上。终于激起广西各族人民，反封建武装起义的爆发。

这一时期，广西各族人民反清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天地会（三点会）会党农民革命组织。广西会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光荣的斗争传统，在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一直十分活跃，是广西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参加二十世纪初年，广西会党起义的群众不仅有汉、壮、苗、瑶各族农民、手工业者和游勇，而且还有一部分清军士兵也曾加入了起义行列。

广西会党起义，在一九〇二年由谢三领导的上思起义首先发难。次年，游勇首领游维翰起义，转战百色、凌云、田阳、田东、田林、西隆、西林等州县。然后起义逐步遍及广西的隆安、西林、泗城、百色、镇边、归顺、镇安、太平、南宁、上思、郁林、潯州、梧州、上林、迁江、宾州等广大地区。到一九〇三年广西全省都沸腾起来了，到处燃烧起反

^①《广西总督岑春煊奏》（光绪癸卯十二月七日），《谕折汇存》。

清革命烈火。正如当时广西总督岑春煊在一个奏折里所说：广西“除桂、平、梧三属外，几乎无地无匪”。^①实际上，桂林、平乐、梧州三府也不是清朝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的“乐土”，人民的反抗呼声很高，活动亦很频繁，只是“伏而未发”^②而已。一九〇四年起义达到高潮。各族农民起义军以柳州和南宁为中心向各地发展。从广西西南的邕宁、宁明和西北的庆远、南丹，到东北的桂林、平乐和东南的郁林、容县，到处燃遍农民起义的烽火。柳城、雒城、永宁、永福、思恩、天河、河池、南丹、马平、庆远、象州、中流等地的起义群众“声势极威”。他们英勇杀敌，鏖战在丛山峻岭之间，给清朝统治者沉重打击。永宁、永福、雒容一带的起义群众“数逾万人”，曾攻克永宁、永福、三隍，造成清朝统治者“危急万分”的形势。同时，在罗城一带的义军，还击毙清军枪炮各营管带，攻克罗城，处死知县。一九〇四年柳州和南宁地区，两大起义中心的主要领导骨干王和顺、谭老发、黄九姑等和基本群众都是壮族人。庆远的壮族妇女黄九姑领导的起义军，不仅男丁英勇善战，苗、壮、汉各族妇女也团结战斗，飒爽“矫健”地驰骋在永福、永宁、雒容、罗城的广阔战场上，四处痛击清军。南宁的胡大嫂、顾二嫂，隆安的谭伍氏等，也是当时广西著名的壮族妇女领导人。其中右江的莫大姑、庆远的黄九姑率领千人的起义队伍，作战勇敢，声名尤为显赫。对此，清朝统治者惊呼不已，说

①《清光绪东华录》第五册，（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第73页，总5059页。

②《清光绪东华录》第五册，（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第86页，总5072页。

“他省之匪，不过壮健”，“兹乃妇女皆是”。^①

一九〇五年广西各地各族农民反清起义，综计全省十五府厅州，除个别府衙外，群众反抗斗争“无处无之”。^②各族起义群众怀着对清朝封建压迫的深仇大恨，所到之处杀逐地主官吏，捣毁官府衙门，焚烧教堂洋行，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广西的反动统治。

在广西各族农民起义军的“凶猛”打击下，清朝统治者陷入“防剿俱穷”的困境，不得不先后调集广东、湖南、云南、湖北，加上广西防军共一百一十五营，数十万反动武装对起义队伍进行“协剿”。广西巡抚王之春还以拍卖广西路矿权为条件，无耻地勾结法帝国主义出兵协同镇压。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恨。海内外掀起“拒法”和“驱王”运动。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愤怒声讨下，卖国贼王之春被吓破了胆，仓皇逃往上海租界躲匿起来。后来，清政府改派岑春煊为两广总督。他“糜饷三百余万”，并利用起义军分散，不协调和缺乏统一领导的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反动策略，才把这次震撼全国的广西各族人民起义镇压下去。广西各族人民的大起义虽遭极大损失，但是，这次大起义的意义则十分重大。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广西的统治，而且对邻近的滇、黔、湘、粤等省各族人民的反清革命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一九〇四年九月孙中山在纽约用英文撰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以广西会党起义为例，指

①户部奏《议复广西巡抚林善后须款办法折》，《东方杂志》卷3，第10期。

②广西《上思县志》第五卷，“兵戈”，（1919年刊）。

出：“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腐朽了”，它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强调中国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孙中山说：“从最近的经验中可以清楚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是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①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宣传革命，赞扬广西会党起义“有胜于前”。从孙、章论广西会党起义中，不仅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从广西会党起义中得到很大鼓舞，对革命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而且也表明广西会党的起义开始敲响了清朝反动统治的丧钟。

除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五年，广西各族广大劳动者参加会党反清起义外，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也接连发生。

抗捐抗税运动是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群众，抗拒清朝统治者苛重勒索的群众运动。各族人民抗捐抗税斗争，不仅在经济上枯竭了清政府的财源，而且在政治上也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

早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内蒙古蒙古族刚布、桑布兄弟二人就领导了以图胡木地方为据点的科右前旗、科右后旗和扎赉特旗农牧民，抗议清朝封建苛刻剥削的起义斗争。一九〇一年蒙古族华来顺、华来延兄弟又领导哲里木盟科右中旗蒙古族人民反对封建主旗扎萨克图什业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布勒索人民的斗争，打击了清朝和蒙古族地区封建势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3页。

力。^①

一九〇一年九月《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清政府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勒索，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也更加猛烈。一九〇三年秋，河南省开封治台村回族李元庆领导回、汉族近万人进行抗粮罢市斗争，深得回、汉族人民的积极支持。李元庆英勇顽强，领导人民愤怒抗击抢粮的地方官吏，阻拦米粮柴草进城。并砍毁电杆十余里，给开封反动统治者很大打击。回、汉族地主勾结地方官吏残酷镇压了这次革命斗争，六十四岁的李元庆被迫自缢身死。但这一带的回、汉族人民都赞扬李元庆“有骨气”，一直流传着怀念他的歌谣：“中牟郑州硬似铁，治台出了个李大爷。”^②同一年，外蒙古札萨克图汗部，达尔罕贝勒旗策格诺尔苏木地区也爆发了阿尤希领导的蒙族劳动人民反封建王公的武装起义。起义群众拒绝承认札萨克的封建特权，要求各阶层居民（包括王公在内）同样承担义务，停止向王公交纳赋税，同时反对清朝的反动统治和高利贷剥削。一九〇二年蒙古族人民又以“独贵龙”^③形式，开展武

①玛尼札布、都陇尔苏荣：《化黎雅顺、化黎彦反封建武装起义始末》，1963年6月11日《内蒙古日报》。

②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回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4页。

③“独贵龙”亦称“多归轮”，是蒙古语，意为“环形”、“圈子”。后引申为“小组”。是近代蒙古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所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各族农牧民在起义反对蒙古王公或清朝统治时，聚集在预定地点，列为环形，席地而坐，共同发表文件时也签字成环形，表示人人负责，避免暴露领导者。初期是自发的，分散的，规模小，以反对封建赋役封建剥削为主。后来发展到有组织的武装反抗，逐步由一个旗发展为几个旗的人民起义。

装斗争，反对封建统治者丈放蒙人土地，破坏牧场。一九〇三年三月，吉林省宾州（今黑龙江省宾县）各族人民爆发抢盐斗争，抢盐群众二千余人，从乡村结队浩荡开进宾县城，捣毁了盐局，将盐抢光。不久，黑龙江省大赉厅（今吉林省大安县）又发生了反对搜查私盐的斗争。各族人民群众三、四百人，冲向大赉，捣毁了官厅盐局。厅官闻耗赶来，“百般劝导，始行解散。”^①同时，云南省镇边厅上改心等地，彝族张朝元聚众三千余人，佤族李三明、刁文林云集五、六千人，先后发动起义，互相配合，“攻据城寨”，^②打击当地的剥削统治阶级。一九〇三年内蒙古乌审旗、杭锦旗蒙族人民也发动抗议“丈放”、“要回户口地”斗争，其中后套一带厂汉卜罗领导的一支“独贵龙”力量最强。他们与那素朝领导的抗垦队伍汇合，团结部分汉族人民，与达拉特旗蒙族人民联合斗争，声势大震，使“局（垦务）人闻者，莫不惊骇。”一九〇四年内蒙古杭锦旗、五原厅蒙、汉各族农、牧民以搭木架、李老先、刘天祐为首开展反官府压迫斗争，占领包头镇同心渠工存粮局“以为久居之计”，并“欲攻教堂”。统治者认为，起义军“纠合之易，啸聚之速，情形实为可虑。”^③同年，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蒙族人民，在朝格都仍等人领导

①《东三省要事汇报》，《东方杂志》卷7，第6期：《中国时事汇录》第138页。

②《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署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及同日片。原件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③《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绥远将军贻谷折》，原件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下，联合郡王旗蒙族人民，持械阻丈户口地，并发动人民拒缴押荒银。同时，卓索图吐默特旗又爆发了以白音大赉为首的蒙族劳动人民反清武装起义。起义群众在法库门地方截取沙俄侵略者的枪械弹药，武装自己，声势大振。曾攻占彰武、洮南、靖安，屡败东三省清军。同年，奉天省复县赫家沟满、汉族农民“聚集百余之众”反抗盐捐。抗捐群众“各执铁锹粪叉争前殴打和驱逐税吏”，并声称“我赫家沟从来不知捐税名目。”清政府在东北各地借清查地亩和牲畜圈底，肆行搜刮，也引起了凤城、岫岩、安东（今丹东）、辽阳各地满、汉各族农民，反抗清朝官吏苛征山荒税牛马税的斗争。^①新疆巴里坤镇迪道清朝统治者强迫移居该地的哈萨克族居民返回北疆，引起哈萨克族牧民的反抗。^②十一月，云南镇边李三明、刁文林又联络景颇、彝、佯各族人民反对土司清查门户，围攻土司署，攻下十余寨。^③傣族人民和南栅、岩帅一带的拉祜族和佯族人民先后响应，参加起义队伍，使义军的活动范围由耿马、孟撒一带发展到临沧，给敌人有力的打击。

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在一九〇五年，也此伏彼起。内蒙古杭锦旗的六个“独贵龙”起来示威，抗议强行

①转引自郑川水：《辛亥革命时期东北地区满族的革命斗争活动》，《民族团结》1961年12月号；拙著：《满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五期。

②《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折》，原件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③《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三日云贵总督丁振铎片》，原件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丈放”土地。准格尔旗蒙族人民联络乌审、郡王、达拉特各旗的蒙、汉族人民共同进行“阻止丈放”户口地，拒缴“押荒银”的斗争达到高潮，声势大震，一时迫使伊盟的“垦务”陷于停顿。与此同时，伊盟的鄂托克旗、札萨克旗等地也发生不同规模的“独贵龙”运动，反对蒙古族封建王公的横征暴敛。^①他们对一切摊派，都拒绝交纳。“独贵龙”群众还聚集民间枪械，开展武装斗争，迫使王公官吏“停征畜产”，“常一夕数惊，岌岌可危”。^②在青海贵德地区，藏、回族人民因“屡受官绅欺虐，压抑莫伸”，在林都完领导下五月召集千余人在扎马山根一带起事，“凶焰风驰，几有燎原之势。”^③

各族工人阶级的斗争也不断兴起。一九〇二年吉林三姓（今依兰）金矿各族矿工举行起义，抗击清军，占领了矿区。一九〇三年云南省临安（今建水县）箇旧一带爆发以各族矿工为主，联合农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压迫的周云祥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群众包括哈尼、彝、苗、汉各族人民一万多人。他们提出“官激民变”、“抗官仇洋”、“拒洋修路”、“阻洋占厂”，反对法帝国主义强修滇越铁路，保护云南厂

①敖腾比力格：《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②邹焕宇编：《伊盟视察报告》第14号：《鄂托克旗军队之成因与现状》。并参考蒙图素德：《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③《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陕甘总督升允等折》，原件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矿资源等革命口号。各族起义群众曾一度攻占临安、箇旧等大片地区，使中外反动派“远近震动，相率徙迁”，惶恐惊呼“滇省震动”，“势成燎原，几难收拾。”^①可见，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者进入广西与农民结合，坚持反清斗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法帝国主义侵略者勾结云南地方政府，强征大理、元江一带的白族人民为他们修筑滇越铁路。各族筑路民工受尽侵略者极其残酷的虐待，他们便采取逃工、怠工、破坏工具、毁坏路基等方式进行斗争。各族工人的英勇反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次沉重的回击。它不仅用行动揭露中外资本家欺压民众，残酷剥削工人的罪行，而且还显示了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在斗争中，各族工人以斗争坚决，联合农民共同作战的特点，表明了中国各族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觉悟的进一步提高。

上述可见，同盟会成立前夕，遍及祖国各地的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媚外卖国，为虎作伥的清朝地方当局，谱写了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斗争的历史篇章。

以农民和工人为主力军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同当时全国以汉族农民为主体的抗捐抗税斗争互相支持、相互影响，密切配合，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有着共同的政治命运和一致的革命要求。

这时期，全国各族工农群众的斗争，虽然还处在自发斗争

^①《清光绪东华录》总5052—5053页。

阶段，但各族人民根据对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相勾结共同压迫中国人民的认识，许多地区的人民斗争都能鲜明地把反帝斗争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而且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全国各族工农群众的斗争，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度打击了封建势力，震撼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基础，造成了迅速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因而给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大鼓舞，推动和鼓舞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爱国走上革命道路。

二、同盟会建立后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兴起

进入二十世纪后，正当全国各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进入高潮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开始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从此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一个领导中心。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吸收少数民族革命志士参加同盟会，然后派回本民族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同盟会又有意识地派革命党人打入清朝的边防军中工作，让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和组织革命。此外，还指派一些革命党人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台湾等省宣传革命，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进步人士，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反清思想，初步产生了谋求民族自由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的民族主义思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据我们现在所知，能够指出真名实姓的少数民族同盟会员就有满、蒙、回、壮、苗、傣、彝等族。显然不只这些。据说云南白族，

新疆一些少数民族都有同盟会员，但有待进一步核实。而且少数民族参加同盟会的人数也不会太少，因为仅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间，广西籍各民族出身的留学生参加同盟会的就有六十多人。^①通过他们更加密切和巩固了同盟会同少数民族人民的联系。少数民族革命志士参加同盟会，不仅说明了同盟会与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密切关系，而且表明革命党人的斗争锋芒所指，正是各族人民所要打击的革命对象。所以，同盟会能够动员少数民族人民参加反清斗争。

同盟会领导少数民族人民反清斗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发动少数民族人民参加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另一方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宣传、组织各族人民，号召他们起来斗争，共同打击各地的反动势力。

（一）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同盟会领导的武装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②同盟会成立后，经过一段革命宣传，从一九〇七年春起，在孙中山领导下，在南方发动武装起义，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用武力来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在革命党人的组织发动下，各族人民踊跃参加革命队伍，百折不挠。其中参加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的起义战士，大多数是

^①李任仁：《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449—450页。

^②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10页。

广西左江一带的壮、汉族人民，其中的一个领导人王和顺（广西邕宁县那造村壮族贫苦农民）就是一九〇四年左、右江各族农民起义的组织领导者。^①一九〇七年十月被孙中山在河内任命为镇南关都督的黄明堂是钦州大寺壮族人。^②镇南关之役后，一九〇八年二月革命党人黄兴又带领二百余人进攻钦州，连战皆捷。壮、汉各族人民踊跃投军，使黄兴奉命组织的一支二百多人的武装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六百余人。驰骋于钦（州）、廉（合浦）、上思一带。所到之处都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四月，革命党人又在云南河口发动武装起义。各族人民热烈支援。当革命军占领河口，乘胜挥兵北上时，沿途的各族人民热烈支持和参加，部队迅速发展壮大。起义军攻克蛮耗，进逼蒙自时，除一九〇三年临安、箇旧一带哈尼、彝、汉、瑶各族矿工联合农民起义失败后，流散在江外的周云祥余部，立即响应加入外，其他哈尼、彝、瑶等各族人民也积极参加，军威大振。十二月，革命党人杨振鸿等又在孙中山的支持和鼓励下，组织滇西傣、傈僳、景颇、汉各族人民于云南省干崖地方（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联合举行反清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偷渡怒江，经里布戛，走蒲缥等地，会合沿途各族响应起义的人民群众数千人到达保山城外的马岭寨，准备夜袭保山。但由于保山敌人防

①《屡建战功的壮族将领——王和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②《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壮族将领——黄明堂》，《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守严密，他们只好暂时撤退到蒲缥，此时杨振鸿不幸恶性虐疾发病，呕血丧命，^①起义遭受挫折，没有达到预定夺取保山占领德宏，实现“将以一隅号召人心，为天下倡”的革命目的。^②但却沉重打击了清朝在滇西的反动统治，显示了滇西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决心和勇气，进一步激发了云南各族人民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意志和信心。

镇南关、钦州、河口和干崖等地武装起义的失败和挫折教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使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看到阶级斗争的艰苦性，但并没有动摇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推翻清朝的决心。革命党人经过筹划，又于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举行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广西罗城县人李德山带领汉、壮族二十多人前往参加。他们在广州起义战斗中打先锋，英勇顽强。从广州小东营出发，沿途杀岗警，冲入广东督署，击毙清军管带金振邦。后攻打小北门高阳里口源盛米店，坚持奋战一昼夜，毙敌十余人。敌人无计可施，便放火烧米店，李德山带领广西同志冲出米店，结果广西平南县籍的韦统淮、韦统铃、韦树模、韦荣初等当场牺牲，其余广西各族参加起义的同志也大多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③如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单中就有广西永淳县（今横县）壮族韦云

①《赵藩杨君秋帆墓表》，《杨振鸿张文光合刊》，1914年日本排印本，藏云南省图书馆。

②《云南辛亥革命参加者列传》，《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122页。

③《广西辛亥革命资料》第157页；韦能宝施、正甫：《回忆“三、二九”广州起义》，1961年10月7日《广西日报》。

卿（同盟会会员）。

这一时期，各族人民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说明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事业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革命要求，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这些斗争，虽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和局限性，终以不能持久而失败。但是，这些武装起义却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它一方面锻炼和考验了革命党人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各族人民对清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更加激发了各族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进一步高涨。

（二）各族人民投身争回利权运动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反清武装斗争的同时，各族人民参加收回利权运动也在凶猛地展开。收回利权运动集中于争矿权、争路权的斗争，是针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清政府出卖主权而开展起来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争回矿权斗争方面，例如一九〇五年从沙俄手中收回黑龙江省汤原县都鲁河金矿，一九〇七年云南各族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对清政府出卖“七府矿权”的反帝爱国运动，都属于这一类。云南省各族人民为了收回“七府矿权”，成立了“云南决死会”，发表了《决死宣言》，留学日本的云南各族学生纷纷来函、来电表示声援。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下，英法侵略者不得不把“七矿权”交回中国。同年，广西各族人民展开了保卫西江航权、反对美国兵舰侵入西江的斗争。一九〇八年东北各族人民还收回中、英合办的暖池煤矿。黑龙江省各族人民在此期间还收回一部分森林权。争回路权的斗争比争矿权斗争

更为激烈。除一小撮卖国贼外，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都卷入这一革命风暴。一九〇八年吉林省资产阶级、士绅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了“吉林公民保路会”，掀起反对清政府把吉长铁路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推满人云祥为总董，吉林省绝大多数满人都支持了这个斗争。满族爱国知识分子松毓在会议上义愤填膺地抨击清政府借款筑路的祸害，申述保卫路权乃是一切爱国人民的正当行动。吉林法政学堂满族学生文元等还呈文东三省总督，要求“吉林铁路仍为公民集股自筑，不认外款”。^①保路会建议预支三年旗饷或以旗地作抵押向官帖局借款，得到满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派出满人云祥等到奉天、北京请愿。^②由于清政府拒绝了群众的正当要求，拱手出卖国家利益，使这个运动终未成功。正当东北各族劳动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捐抗税、收回利权等反抗风暴的一九〇八年，同盟会员、汉军旗人张榕，从日本返回祖国东北，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次年，日本帝国主义继掠夺本溪湖、抚顺矿采矿权后。又复改安奉铁路为双轨，以扩大其侵略势力。张榕等革命者，在奉天发动商学各界人士，起而抵制日货。在奉天省城的师范学堂、实业学堂、陆军小学堂等学习的满族学生参加了斗争。在直隶（今河北省）保定等地军事学堂学习的东三省籍满、汉各族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略，切齿痛恨，在保定召开同乡会，发表了同乡录，呼吁各界“结团体”，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表现了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

①《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二日。

②《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三）各族人民蓬勃兴起的反封建斗争

同盟会成立后，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各地各民族斗争情况虽有不同，但各地均有，现分述如下。

在东北。同盟会成立不久，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即派员前往东北宣传革命，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据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盛京时报》报导说：“有孙文党羽来奉之消息，奉省官场为之惊动。”“此次孙文之来东三省者，不但张某（按，指张继）一人，前营口潜入辽西各属游说者尚有二、三人。”“前数日有革命党人三人由铁岭赴吉林。”“安东地方亦有革命党数名。”^①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和发动，从一九〇六年起，奉天省满、汉、蒙城乡各族人民的抗捐抗税风潮，此伏彼起。一九〇六年三月，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了筹措“新政”经费，奏请清政府准许征收“更名税”。在东北各地增设垦务局，重新丈量土地，勒索农民，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一九〇六年秋，辽南营口地区广大农民，首先举起减租的旗帜，聚众反抗，到垦务局要求减捐。同一时期，辽东地区也随之响应。凤凰厅境内，凤城县雪里站满族鲍化南，于三月四日以“打山荒不服者，到时集齐，上县城找官府算帐”为号召，与满人伊品三、郎振恒等人联合满、汉、蒙等各族农民数百人，爆发了“抗山荒”斗争，“精悍善战”的各族农民杀向县城，包围垦局，同敌人搏斗，要求停止清丈山荒和免除警学各种捐税。反动地

^①《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十九日。

方官派警察夜袭农民，当场打死二、三人，更加激起满、汉、蒙等各族群众的愤怒，踊跃参加斗争行列。^①一九〇七年春，同盟会重要领导人之一宋教仁和吴崑、白逾恒到东北设立同盟会支部于辽东，派人深入基层，宣传组织人民继续开展斗争。二月，鲍化南又率领群众捆绑凤城厅清丈局委员及警丁。反动派残酷镇压，打死满族鲍伍等农民数名，更加激起满、汉、蒙各族农民的仇恨怒火。鲍化南当即领导各族农民持械反抗，打死打伤前来镇压的清朝反动官兵三人，遂发展为武装起义。并联合安东(今丹东)、岫岩等地满、汉、蒙各族农民三、四千人，第二次包围凤城，断绝粮柴出入，坚持斗争二十多天。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城市的工商界也表示同情。终于迫使清政府撤消垦局，停止清丈，暂缓山荒税。各族农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继凤城等地反抗山荒税斗争之后，辽阳满族农民又同汉族同胞一起掀起大规模的抗捐运动。一九〇七年六月，辽阳税捐局派员下乡征收牛马捐，一到村里就借端勒索，“视牛马之大小，任意断捐钱之多寡”。^②激起广大满、汉族农民的无比愤怒。他们一举包围了辽阳城的税捐局，要求取消苛重的牛马税。英雄的满、汉各族农民斗志昂扬。他们“带米作炊，架棚为宿”，聚集起来，冲破巡警、团练的封锁，向省城进发，到总局请愿。刚到任不久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闻讯震惊，急派马队

①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凤城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12—13页。

②《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5日。

前往镇压。次年五月斗争再起。辽阳东南部，东西约百里，南北约百二十里内的满、汉农民共同参加反抗清朝税吏征收牛马税的斗争。满族王九阳等人也趁机发动辽阳东南吉洞峪、兴隆沟、亮甲山、鸡鸣寺、上麻屯等地广大满族农民与汉族农民，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牛马捐斗争。一九〇九年初，庄河二、三千群众，收缴乡勇军械，并“联合各屯，聚众抗官”，^①厅署派兵妄图一举“剿灭”，但各族人民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在一九一〇年又掀起更大规模的抢粮斗争。庄河厅署曾屡次派兵镇压，均无显效。最后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八月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东北的统治。一九〇九年六月，奉天省东平县（今吉林省东丰县）各族人民又掀起大规模抗捐斗争。愤怒的一万多名各族群众涌入盛京城，强烈要求东三省新任总督锡良停止丈量土地、废除警捐。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威逼下，锡良被迫答应群众的部分要求。

在奉天满、蒙、汉各族农民反抗苛捐杂税斗争鼓舞下，不能忍受封建压迫的吉林省延吉一带朝鲜族人民，在一九〇八年也爆发了反对仗势欺人、贪赃枉法的“乡约”和“牌头”的斗争。“乡约”、“牌头”是清朝反动统治者在朝鲜族中所豢养的鹰犬，受州县官府的命令，掌办乡村一切统治事务。这些反动家伙在朝鲜族中胡作非为，肆意欺压人民群众，勒索中饱，为朝鲜族人民所痛恨。愤怒的朝鲜族人民群众奋起包围延吉边务公署，一致要求官府惩处这些欺压人民

^①《盛京时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2月24日。

的坏家伙。经过朝鲜族人民的不屈斗争，逼使官府不得不革除少数民愤极大的“乡约”、“牌头”的职务。打击了清朝和延吉朝鲜族中反动统治者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士气。此后，朝鲜族人民群众性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东北各族人民反清斗争也影响和推动着邻近河北省各族人民的斗争，例如遵化县马兰峪地区的满族农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先后四次同汉族农民群众一起，掀起“抢粮”斗争。最大一次多至一千余人。满、汉族农民冲进地主老财沈明达（父为清朝千总）家开仓分粮。^①

东北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一方面使革命党人看到清朝的腐败统治，已经丧尽人心，无可挽回；另一方面又帮助革命者认识到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重要性。因而，一九〇八年四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了由辽东革命党人寄稿的《辽东义勇军檄文》，愤怒揭露清朝统治东北十三条罪状，指出清朝统治无论“旗（满人）、民（汉人）皆被箝制”，“乃致满汉积不相能，”号召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兴起”，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光复陪都（指沈阳），建设根本，以次进取中原……推倒专政，创立民国。”^②由上述可见，同盟会建立后，武昌起义前，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虽然多属自发性质。但各族人民斗争的蓬勃兴起则跟辽东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和影响有密切关系。辽东各族人民抗捐税和抢粮斗争，互相激荡，彼此影响，造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河北省遵化县满族调查资料》。

②《民报》第20号，第105—112页。

成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又促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觉醒。

在北方。同盟会成立初期，先进的蒙族同胞就在《民报》上发表《蒙古与汉族结合共申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指出：“欲要讨伐清朝满族贵族”，“必先结合汉族”，推翻清朝统治是“绝大事业，要非一族所能办。”只有蒙、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造成“若顺风纵火，莫可或御”的形势，才能倾覆清朝封建统治。^①许多蒙族先进分子纷纷响应号召，立誓献身，决心同全国各族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府”，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当同盟会在全国各地组织和发动各族人民起义时，同盟会员蒙族云亨、经权和汉族王定圻等人，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土默特旗、包头、萨拉齐等地发动士兵，组织各族人民群众，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居住在东北地区的蒙族人民也同东北三省各族人民一起，热烈响应革命党人号召，不断举行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一九〇六年九月，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爆发了蒙族农牧民反夺地武装斗争。这支起义队伍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坚持了数年之久。^②他们驱逐垦务人员，杀死以测量地形和测绘地图为掩护的日本特务。不仅直接打击了清政府对东北地区蒙族人民的统治，也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差不多与此同时，哲里木盟札赉特旗人绰克大赉为反对开垦，领导蒙族牧民三、四百人举行起义，枪毙了该旗蒙荒局总理梅林哈丰

①《民报》第20号，第113—119页。

②《东三省政略》军政篇。

阿，占据了海拉尔迈等地，阻止开垦。这次斗争一直坚持了三年之久。直到一九〇八年，奉天省营务处派兵镇压，绰克大赉才逃走。^①

在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怒潮也汹涌澎湃。清朝政府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统治，是通过直接委派官吏和保留民族反动上层的种种封建特权来进行的。比如，在哈密、吐鲁番两地旧日“回部”地区，就仍然保持维吾尔族封建王公的爵位和特权。这些封建王公自领土地，自治人民，俨然封建诸侯。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立行省后不久，吐鲁番王公的辖地已“改土归流”，但清朝借口哈密王公，从前助清朝平定叛匪功大为名，仍保留旧日的统治，纵容维吾尔族封建王公，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哈密封建王公不仅强迫人民承担各种无偿的苦差役，而且他的部下头目还强迫人民额外替他们当差。按照惯例哈密劳动人民每月要为哈密王服三天无偿劳役，后又增加到七天。^②维吾尔族人民在清政府和本民族封建主的统治下，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倍受剥削，生活十分贫苦。所以，反清必须要同反对本民族反动上层的压迫和剥削结合起来。一九〇七年哈密维吾尔族人民，为了争取改善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掀起反抗哈密封建王公统治的斗争。愤怒的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冲向哈密王府，声讨王公压迫、奴役人民的罪行。他们用土砖堵塞了哈密王府的大门，吓得反动王公贵族丧魂失魄，动摇和打击了哈密封建王公的反动统治。

①余元鑫：《内蒙古历史概要》，196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58页。

②曾向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09页。

清政府为了巩固其摇摇欲倒的统治，极力维护哈密维吾尔族王公对本族人民的残暴奴役，便捏造“叛逆”罪名，将参加哈密劳动人民暴动的维吾尔族领导人，骗到乌鲁木齐加以杀害。然后在哈密对维吾尔族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清朝统治者勾结维吾尔族反动封建王公，虽然暂时把哈密维吾尔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了，但维吾尔族人民却更深地蕴积着对清朝统治者和维吾尔族封建王公及其爪牙的仇恨。

此外，青海省西宁丹噶尔地区的汉、蒙、藏各族人民因不堪忍受清朝地方官吏的苛重剥削和压榨，也于一九一〇年秋掀起了“抄盐局”杀官吏的风潮。这个风潮的倡导者除汉族外，还有东关回民多人（所谓十大弟兄）。原先青海居民食盐，并无税捐，故盐价便宜。自一九〇七年五月食盐由蒙、藏族民办改为“官盐局”承办后，官吏奸商相勾结，抬高盐价，并且买卖出入多方刁难，搜稽察捕，又借罚款、勒索、贿送种种名义走私榨取，坑害人民，激起蒙、藏、汉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聚众捣毁盐局，抢取盐库，并捣毁替盐局服务的绅士住宅多家。在这次风潮中，藏族青年还劫杀了西宁噶尔厅官孚慧的儿子，对清朝官吏恣意勒索各族人民的行为，给予严重惩罚。^①

广东、广西两广地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组织和领导反清武装起义活动频繁的地区。各族人民深受革命思想影

^①石殿峰：《甘宁青人民武装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59—460页。

响，反清热情很高。除了积极参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两广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外，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也层出不穷。如一九〇九年广西怀远（今三江县）一百余村以侗族农民为主体，联合壮、汉、苗、瑶各族，发动反抗加抽油捐的武装斗争，攻占古宜，拆毁县分署及税所，一直坚持三年之久。^①同年，广西永淳壮族酿酒工人黄朝吉还领导了武装抗捐斗争，在“官府害民，百姓除害”的号召下，武装抗捐队伍达四千多人，沉重打击了地主官绅的统治。一九一〇年，藤县岑溪各族人民又爆发了浩大的抗捐运动。武装群众万余人攻破岑溪，筑垒自守。^②广东海南岛黎族人民也和汉族人民一起积极参加由“三合会”（有些地方称天地会）组织和领导的反清斗争。“三合会”活动地区多在黎、汉杂居的儋州、澄迈、琼山、定安、乐会、文昌、会同等地。琼山县的喃唠峒、陶家坠、指马峒等十余黎族峒寨人民，在“三合会”组织下，从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聚众”、“焚劫”和“杀掳”当地封建统治者的事件接连发生。^③一九一一年，琼山县黎、汉族人民联合举行的反清武装起义，曾一度攻占岭肚市一带地方，给清朝地方当局造成巨大威胁。

在华东。除台湾高山族人民以不断反抗和暴动来回答日本殖民主义者的“讨伐”外，沿海畬族人民反抗清朝地方官

①广西《三江县志》卷7。

②《南报》（1910年）第一期，第31页。

③《广东琼山县志》第12卷，第25—26页。

吏残酷压迫的斗争也不断发生。例如一九一〇年浙江省赤木山村畚族人民，以两端镶有铁箍的扁担作为武器，愤怒驱打全副武装勒索苛税的官吏，^①显示了畚族人民对清朝封建官吏压榨人民的极大义愤。

在西南。各族人民反清斗争也蓬勃发展，如火如荼。除前面谈到的云南各族人民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外，在成都保路同志军起义的鼓舞和推动下，一九〇八年，同盟会派彭家珍等到茂汶一带羌族地区联络各界人士，组织反清斗争。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夕，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川西一带积极活动，羌族地区也卷入革命浪潮。一九一一年八月后，川西南西昌、德昌等地的彝族，川西北茂汶一带的羌族，松潘一带的藏族，都爆发了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西昌彝、汉族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张耀堂领导的起义，“杀官安民”。他们在“推翻满清，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口号下，猛攻西昌城，斩杀了西昌县令章庆，沉重打击了清朝反动势力。在西昌彝、汉族人民斗争鼓舞下，德昌彝、汉族人民群众也在“攻城杀官”口号下，逐官吏、毁教堂，杀伤法国传教士及护送他的清军。会理地区彝、汉、藏各族群众宣布起义，进攻会理，打击法国天主教司铎贾元贞。川西北茂州、威州一带羌、藏、汉族人民联合起义，打垮了前来镇压的清朝巡防军，并得到灌县民军的大力支持，一举光复了威州城（今汶川县），使川西北灌县与威州间这一片广大地

^①张旅：《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民族团结》1961年第8—9期。

区尽入各族民军手中，隔断了成都与清政府治边重镇松潘的联系。同时，茂汶的羌、藏、汉各族人民又把松潘的巡防军打得溃不成军，造成很好革命形势。在各族人民起义影响下，瓦寺土司与五屯守备的藏族土屯士兵也响应起义，在汶川土司索代赓率领下，集合三百多人到灌县参加川西同志军起义，与川西、川北起义军一起，“转战于郫县、崇宁、灌县等地，屡予敌人以重创。”^①一九一一年川西各族人民响应成都保路武装起义，不仅结束了清朝在这些地方的反动统治，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四川全省和其他地区各族人民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

综上述可知，同盟会成立后，由于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各族人民逐步明确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和共同的根本利益，推动了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高涨。少数民族人民在边疆地区的斗争，不仅壮大了革命声势，而且牵制了清军势力，造成清朝反动统治者顾此失彼，穷蹙应付的困境。在各族人民的有力打击下，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分崩离析。所以，武昌起义前，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领导人民赶跑封建皇帝，推翻帝制，起了很大作用。

^①索观瀛：《松、理、茂、汶藏族人民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227—229页。

第 四 章

各族人民热烈响应武昌起义

一、各民族反动上层的垂死挣扎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是以孙中山为旗手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向封建清王朝夺取全国政权的信号。革命党人领导的新军，经过两天英勇奋战，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象一声春雷，响彻中国大地，震撼了清王朝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给渴望早日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中国腐败政治局面的各族人民带来极大鼓舞和希望。因此，各族人民响应武昌起义的革命斗争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但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与各民族的反动上层，为了维护旧政权，保护既得的特权和利益，便以百倍增长着的疯狂向人民作最后挣扎，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妄图“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①

还在武昌起义前，正当各族人民反清斗争在全国蓬勃兴

^①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页。

起，造成清朝统治危机时，清朝皇室的满族贵族和甘为清室卖命的反动地方官吏，为维护即将倒坍的清朝封建政权，便狡猾地交替使用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在血腥镇压革命的同时，又策划政治欺骗来强化其反动统治。一九〇八年清朝搞了一个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就是一场政治大骗局。所谓“预备立宪”，就是清朝统治者妄图通过颁布一个所谓《钦定宪法大纲》，来达到清朝封建“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总揽统治权”的政治目的。并给资产阶级上层一点好处，来拉拢他们结成反革命同盟，抵制革命运动。可是这个骗局一经戳穿，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枪声一响，满族封建贵族看到通过拉拢汉族资产阶级上层来抵制革命的图谋已破产，便转而用歪曲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纲领来蒙骗那些不明真相的满人。本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满”宣传，是要推翻清政府。而清朝满族封建贵族则竭力渲染为是汉人要杀尽满人，妄图通过煽动起民族仇杀来抗拒革命，保护他们的生存。但种种欺骗阴谋都被汉、满各族人民识破后，清朝满族贵族便无计可施，立即撕下假面具，严令满族出身的全国清朝驻防军队的将军，裹协旗兵残酷镇压革命。如在西安，清朝驻防反动将军文瑞奉命顽抗新军，驱迫旗兵“分陴固守”、造成汉、满各族人民的极大伤亡，尤以“旗卒多死亡”，仅在东门“巷战一夜，旗卒死二千多人，妇孺投井自焚者尤众。”^① 南京将军铁良、福州将军朴寿等满族反动将领都甘为清朝卖命，血

^①尚秉和：《辛壬春秋》。

腥镇压革命。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之献身奋斗与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政权终于诞生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庄严宣告清朝政府的垮台和两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结束。它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成果。这一胜利，大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团结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的发扬。但是，清政府的垮台，使作恶多端的满族封建贵族及其所代表的各族反动派失去了种种封建特权，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他们常常怀念过去显赫一世的反动权势和骄奢淫佚的腐朽生活，因而有“亡国之痛”（清朝灭亡）。他们叫嚷什么：辛亥革命给他们留下“寒怆的记忆”，时刻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他们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串通汉族封建地主阶级，妄图东山再起。在奉天，以赵尔巽为首的东北反动官僚、军阀，在加紧派遣军警镇压各地群众起义活动的同时，还对领导革命的联合急进会进行公开镇压，疯狂残杀革命者。一小撮清朝满族封建贵族也站在革命的反面，企图进行顽抗。据当时《盛京时报》记载：“探闻恭王、肃王、泽公、铁良等来东、潜谋独立。俟共和发表，即举恭亲王即皇帝位，以赵尔巽为总理。”^①这一小撮满族王亲贵族，妄图在东北重建“小朝廷”的图谋虽未能实现，但却表现了他们对革命的仇恨。对此，日本帝国主义则从中打气，肆意

^①《盛京时报》，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四日。

煽动，说什么：如果“满帝出奔至东省，可立一小朝廷，受该国之保护。”^①为了能在帝国主义卵翼下苟延残喘，奉天各旗佐也蠢蠢欲动，“主张君主，反对共和”，密谋“扣留俸饷，编练旗兵廿营”，准备“南征勤王”。盛京德都护认为这是作垂死挣扎的好主张，极力赞同。但由于各旗壮丁竭力反对，“乏人应募”，又因“德都护赴京无人主持”，“故添招旗队”^②一事才未能进行。在当时的甘陕、新疆的反动势力，如伊犁将军志锐，陕甘总督长庚，西安将军允升等为首的一批满族官僚，为“偷活旦夕”，还“谬倡迎銮之说”，^③企图割据潼关以西地方，“联络新、甘、蒙古为一气，拥溥仪西迁”，^④暂时偏安西北，组织各民族反动剥削阶级上层，抵抗革命，重整大清的一统天下。

在新疆。新疆巡抚袁大化、伊犁将军志锐在各地严密防范革命党人，并将同盟会员、伊犁陆军协统所辖各团、营军官士兵全行解散。一九一二年一月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后，袁大化不仅拒绝共和，反而要伊犁取消革命，并暗中调兵遣将，伺机向伊犁发动进攻。一月九日，袁大化通电陕甘总督长庚、塔城参赞大臣额勒浑，叫嚣对伊犁革命党“惟有兵戎相见”。同时请清政府“攻讨”伊犁民军。即将崩溃的清政府，于十二日复电袁大化、长庚、额勒浑，指令对民军

①杨甦民编：《满夷猾夏始末记》，外编“各省联军北伐之大计”。

②《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二十八日。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六），第53页。

④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93页。

采取“剿抚兼施”。袁大化随即对伊犁民军公开威吓，说：

“如能和平了结，固属甚善；倘不听劝导，即着派队前往，剿抚兼施。”^①一九一二年一月，以袁大化为首的极端反动分子，调动重兵向伊犁民军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把革命者歼灭于伊犁孤城之中。但由于伊犁革命党人，乘清军还未调集，就向东发动进攻。并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屡败清军。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才未能挽救清政府和新疆反动官吏的覆灭命运。

在内、外蒙古地区。当蒙族先进分子坚持同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时，一小撮蒙古族的反动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初则发誓“效命朝廷”、竭力抵制和破坏革命，继而投靠沙皇俄国，搞所谓“独立自主”，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他们幻想在沙俄的卵翼下，自成一个“独立”局面，照旧保护他们的封建特权。

在西藏。清政府鉴于英、俄侵藏形势日益危急，一九一〇年二月，指派川军二千人开入西藏，进驻拉萨，加强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控制。十三世达赖在英、俄煽动下，再次背叛祖国，逃离西藏，投入英国怀抱，充当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的可耻工具。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给西藏广大爱国人民极大鼓舞。一九一二年初，拉萨一部分军、政、商代表，曾组织代议机关和临时政府，向西藏人民发布了祖国共和的公告。达赖乘机于

^①张开枚：《辛亥新疆伊犁乱事本末》。

一九一二年六月返藏。英、俄帝国主义也乘机加紧收买西藏叛国分子。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纵恿下，一小撮阴谋复辟帝制的人物，勾结西藏大农奴主，制造内哄，暗杀进步人士。他们提出“内渡”、“勤王”等反动口号来涣散人心，破坏藏、汉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达赖煽动民族仇视，蒙骗部分藏军进攻驻藏川军。他们企图通过恶化西藏局势，制造汉、藏人民仇杀事件来破坏革命，分裂中国的统一。

在四川省。川西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川西北阿坝藏族自治州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武昌起义后也趁机大肆活动。他们串通一气，制造流言，残酷屠杀革命人民，使川边地区从民国初年起便陷入混乱状态。

但是，剥削统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各族人民革命潮流的冲击下，眼看清朝封建大厦将倾，也有的被迫对革命保持中立或寄以同情。例如，清朝派往云南省顺宁府任知府的满族官员琦璘接到云南省城新军打败旧军，宣布独立电后，就“深为欢跃”，^①表示拥护，并集绅耆专议保民，出俸银五百两备公用。因而反动派把他捕获，“剖其腹杀之”。^②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也表示赞成“政治改革”，^③此外，黑龙江道员庆山，游击马队管带瑞禄等满人官员，也都是对革命抱有同情的人。^④又如，内、外蒙古一些卖国王公贵族，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六）第558页。

②尚秉和：《辛壬春秋》。

③《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四期，第31页。

④参见郑川水：《辛亥革命时期东北地区满族的革命斗争活动》，《民族团结》1961年第12期。

在沙俄的挑唆和策动下搞所谓“独立”、“自治”，分裂祖国，不仅激起广大蒙族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奋起反抗。就是大多数蒙族爱国王公，也坚决反对。北京的蒙族爱国王公通电全国，指斥外蒙古一小撮卖国贼妄称独立，伪立政府的分裂卖国行为。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东蒙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在长春开会，一九一三年一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一致决定“赞助共和”，请求民国政府反对外蒙独立。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去文，陈述“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①维护祖国统一。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内部确实存在着激烈的革命与反革命，团结与分裂，前进与倒退的激烈斗争。清朝满族封建贵族勾结各民族反动上层，对各族人民的统治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各族劳动人民的统治。各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实质上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各族人民反对清朝满、汉封建地主阶级和各民族反动上层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跟我国各民族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利益都是休戚相关的。所以，各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不仅要打击清朝满族封建贵族，也要打击各民族的反动剥削阶级的上层。这是正义的革命行为。绝不能把它说成是什么反对“异族人压迫”的种族仇视运动。

^①《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第15—16页。

二、各族人民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参加反清斗争

武昌起义的枪声震动神州大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全国各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朝统治，在各民族地区发生巨大反响。在各民族反动上层进行垂死挣扎，拚死顽抗的同时，各族劳动人民却纷纷起来支持革命。很多少数民族革命志士流血牺牲，为革命作出贡献，在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东北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反清斗争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东北，各族各界顿时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额手称庆，“兴奋的坐立不安”，到处都在酝酿着起义。面对东三省各族人民蓬勃兴起的革命形势，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首的军阀、官僚，组织了代表东三省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安会，立即动员反动军警防止与镇压革命。根据东北各族广大群众的革命力量薄弱，而革命本身的组织又很涣散，群龙无首；同盟会“驱除鞑虏”笼统“反满”革命口号，又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族隶旗籍”革命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等情况，汉军旗人、同盟会员张榕，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更好地组织和领导各族人民起来斗争，便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与满族爱国知识分子宝崑等人，在沈阳成立“奉天省联合急进会”，作为领导东北地区革命的总机关。于是以赵尔巽为首的保安会和以张榕等人为代表的联合急进会，围绕着保清与反清，在东北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联合急进会成立后，一面派会员分赴吉林、齐齐哈尔等地“扩展会务”，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群众；一面决定发动起义，然后夺取东北革命的中心沈阳，实现东北革命。因此，除以张榕等少数人留奉天“居省调护”外，其余负责人多被派赴吉林和黑龙江省以及奉天的庄河、宁远、辽阳、安东、凤城等地运动军警，组织民军，策划武装起义。联合急进会根据东北地区满、汉、蒙等各族杂居，以及旗人观望革命的情况，明确提出东北地区革命的任务是：“响应南方（革命），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赵督（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不敢中立”，^①彻底推翻清朝在东北的反动统治，“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②庄河、复州、辽阳一带的起义军，为了粉碎当时反动派利用“民族隔阂”，阻挠革命发展的阴谋，特申明革命旨在反对专制统治，争取自由，并非种族复仇。庄河起义军在军律中还规定：无故“杀戮满人者处斩。”^③辽阳革命军也申明革命宗旨：“以政治革命为主义，非种族革命”，^④并号召各族革命力量，一起推翻清朝统治。革命党人的这些宣传与行动，有力地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把“反满”口号，歪曲为什么“杀伐满人”、“旗人遭难”的谣言，团结和争取了东北满族人民，使许多满族人民投身革命，把东北满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推向

①东北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辛兵字第138号。

②《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十月四日。

③《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六日。

④《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八日。

新的高潮。

十一月下旬，联合急进会派人到奉天省凤城与抗捐领导人满族鲍化南等共同组织革命军，准备起义。经过革命党人进行反清革命和救民脱苦的宣传后，满族农民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他们纷纷拥护联合急进会的革命主张，不数日就组织成一支有二百多名满、汉族农民参加的革命武装队伍。联合急进会正在组织各族革命人民，准备揭竿而起时，满族农民王双益等人，由雪里站到榆树林活动，不幸消息走漏，王双益等二十七人被捕牺牲。在异常危急情况下，鲍化南毅然奋起，遂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率领革命军举行起义，准备攻打凤凰城，点燃了武装斗争烈火。十二月八日鲍化南的部队又在火焰沟与清军激战，满、汉各族革命战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苦战数月，突出重围。但终因弹尽，撤退至庄河。在凤城武装起义前后，庄河、辽阳等地满、汉各族人民也举行武装起义，尤其是以庄河、复州为据点的胜利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这些地方的反动统治。革命形势迅猛异常，阶级敌人惊恐万状。反动派为了求得他们的生存，以百倍增长的疯狂，凶狠地向革命者开刀，实行血腥镇压。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以张榕“私结匪党，图谋不轨”为罪名，杀害了他。并同时诬害满族宝崑“包藏祸心，联合逆党”，与张榕“同恶相济”，将 he 处死。^①妄图以反革命的暴力来扑灭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但是，反动派的猖狂，只能更加激起人们的愤怒。张榕、宝崑等革命者虽然倒下去

^①辽宁省图书馆：《奉天省公署档》辛兵字第1386号。

了，但反动派终将无法阻挡奉天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在吉林，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奉天联合急进会成立后，即派赵元寿赴吉林组织联合急进会分会。分会各族各界代表公推满族爱国知识分子松毓^①为会长，农、工、商、学各界各族代表纷纷入会。吉林省学堂各族学生，奋勇当先，掀起反清浪潮。他们倡言独立，宣称即使砍头流血牺牲，也“非学界之所畏也。”^②恩溥、承志等满族革命青年，参与黑龙江革命志士在吉林密谋起义，不意事泄失败，英勇牺牲。吉林急进分会长松毓等曾联合各族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在吉林阎省中学堂成立吉林省团体联合会，企图通过成立省临时议会，驱逐吉林都督陈昭常，宣布脱离清朝统治。^③但由于他们脱离人民群众，只是想通过成立一个临时省议会，宣布一纸独立的空文来逼走都督，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而这个计划在遭到督抚赵尔巽等坚决反对之时，即陷于失败。然后，他们又想取得吉林第二十三镇统制的支持，逼走都督，使吉林取得独立，但也未获成功。这说明，当时吉林各族革命群众，虽然蕴积着巨大的革命热情，但缺乏革命党人的有力领导，因而，革命武装起义始终未能发动起来。吉林满、汉各族人民反清革命热情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黑龙江省，革命洪流也滚滚向前。奉天联合急进会曾

①关于松毓的情况，可参考张穆安：《吉林旧闻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72—574页。

②《京盛时报》，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八日。

③《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7）十一月二十五日。

派员赴齐齐哈尔组织急进分会，遭到当地反动官僚的惨杀；对此，黑龙江省革命者无比愤慨。满、汉、蒙、回等各族各界革命爱国人士和各族人民一起，发传单、拟章程，积极响应革命。他们强烈要求黑龙江巡抚周树谟联合各族各界成立“国民联合会”，脱离清朝统治。但由于反动派的坚决反对，终未告成。之后，各族革命者组织了“新民爱国委员会”，公推代表孙中山到黑龙江省组织革命斗争的秦广礼为会长，满人文璞为副会长兼组织部长，满人荣采臣、福继五等二十三人为委员，响应武昌起义，策划黑龙江省独立。^①

“新民爱国委员会”，在商、学、军警各界发展革命力量，军、学各界倡言独立。一时齐齐哈尔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致使黑龙江的清朝统治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黑龙江巡抚无可奈何地哀叹：“江省形势危急，若不独立，必有意外，各署已将龙旗尽撤，以待音讯。”^②反动派大小头目为了自谋生计，纷纷携眷逃离。这说明满、汉各族人民革命声势和影响的巨大。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当时旅居上海的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统率北伐军进军山东和东三省，给东北满族和各族人民极大鼓舞。由中学堂学生在齐齐哈尔成立的“黑龙江国民联合会”，发出《国民联合会通告书》，号召各族人民“为今之计，急宣合满、汉、回、

①才子明：《在黑龙江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81—585页；《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日。

②《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

蒙及索伦（鄂温克）、达呼哩（达干尔）各族，化除私见，共矢共忠。”^①要求黑龙江巡抚，宣告脱离清朝统治。奉天庄河、复州满族人民参加的起义军也纷纷出击。铁岭、开原和哈尔滨等地也有满、汉各族农民举行起义，响应北伐军。满族革命人士连承基、鲍化南还分别由吉林、庄河转赴烟台与北伐军进行联络工作。然而，就在东北革命斗争出现新景象的时候，软弱的资产阶级却让出了领导权，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蓝天蔚奉命停止北伐，并解散关东都督府。对此，东北各族革命者极其愤恨。吉林省满族爱国人士松毓致书孙中山，陈述东三省革命事宜，欢迎“吊民伐罪”，“以救东省之水深火热”的各族人民。^②

东北满族和各族人民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斗争，有的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有的成为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这是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辛亥革命运动史上应当予以重视的事情。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两座大山依然压在各族人民身上。但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不仅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民立下的一大功劳，而且对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也发生了深远影响。

（二）蒙古各族人民闻风而起

武昌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给蒙古族人民反清斗争

^①郭孝成：《东三省革命纪事》，《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七）第402页。

^②《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初九日。

的发展,造成了新的推动力。蒙、汉各族人民闻风而起,积极投身革命。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驻扎绥远地区巡防队里的蒙古族骑兵,在曹福章领导下,首先响应武昌起义,举起义旗和蒙、汉各族人民一道,在大青山、武川和萨拉齐厅(今土默特右旗)等地与清军激战。后因萨拉齐厅同知樊恩庆及防守包头镇管带王子寿出卖革命,使义军遭受挫折。起义领导人曹福章等被杀害。与此同时,蒙、汉各族人民还在陶林厅、宁远、隆盛庄与丰镇等地举行武装起义,抗击清军,砍杀清朝官吏。十二月各族起义群众一度攻占了丰镇,焚烧了衙署,并成立了分军政府,分兵屯聚隆盛庄、察哈尔八苏木、二大营子等处。阿拉善旗的反清起义队伍攻入河套,烧毁垦务局。^①当时正在北京学习的土默特旗蒙族云亨和汉族王定圻、刘兆瑞等革命者,闻讯赶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萨拉齐、包头等地同留在当地的蒙族革命党人经权等人一起,加紧“运动军队,响应起义”,支持山西方面的革命军。^②因此使曾遭挫折的归绥地区的革命势力为之一振。一九一二年一月山西革命军在蒙、汉、回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击溃清军,占领了包头,建立了革命政权。在攻占包头战斗中,回族人民表现得特别勇敢。^③攻克包头四、五天后,革命军在蒙、汉各族人民的支

①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蒙古族简史》第123页。

②杨云阶:《辛亥绥包革命史实记述》,《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③崔毓珍等:《辛亥包萨革命经过》第17页;李致方:《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在归绥的反清斗争》,转引自戴学稷:《辛亥革命时期呼包地区的起义斗争》,《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

持和革命党人云亨、经权等蒙族革命者的策应下，又攻占了萨拉齐厅。他们还和晋西北的同盟会员续桐溪和张家口的李飞仟等取得联系，准备一起行动“光复（晋）西北。”^①

蒙古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并肩战斗。他们的革命活动，代表了广大蒙古族人民、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蒙古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对于蒙古族人民阶级觉悟的提高、革命热情的发扬以及加强各族人民的战斗团结，都有着积极意义

（三）西北各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

武昌起义胜利，给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的西北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参加反清武装斗争。

西安首先响应武昌起义。这有它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原因。早在一九〇五年冬，革命党人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回陕运动革命后，经过二、三年的努力，直到一九〇八年夏，陕西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革命党人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作出在西安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决议。一九〇八年十月，同盟会西安分会召集各方面的会员在西安大雁塔开会，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光复旧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的政治口号，^②从这里我们看到，尽管陕西革命者在对待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上有些不同意见，特别表现在“平均地权”上，但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基本原则问题上，意见则是一致的。陕西革命党人根据求同存异原则，

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第一章“光复之役”。

②陕西省政协：《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86—87页。

制定自己的纲领口号，这不仅使陕西革命者有了较为统一的革命思想和奋斗目标，而且对于团结当时陕西革命者也创造了思想上的前提。由于陕西革命党人比较注意在新军和会党中工作，同盟会、新军和哥老会三方面力量有了某些联合，因而群众基础较好。武昌起义，清政府异常惊慌，连忙派北军武装南下镇压，同时电令陕西巡抚钱能训，要极力防范陕西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固门户”。钱能训和西安将军文瑞，为了阻止陕西革命，根据清政府的训令，采取了一系列反革命措施，把新军调离省城，然后立即逮捕革命党人。在这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严重关头，陕西革命党人立即决定提前于十月二十日（旧历九月初一）举行起义。由于同盟会、哥老会、新军的紧密配合，在各族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第二天就开始攻西安“满城”，虽然遇到清军顽抗，但不到一天功夫即攻下“满城”，将军文瑞跳井自杀，巡抚钱能训等被群众缉获。^①在西安武装起义斗争中，回族革命者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例如，西安新军下级军官回族马玉贵积极参加和领导了陕西光复战役。光复后马玉贵被革命群众推为“总理粮饷兼管军务都督。”他和他所率领的回、汉各族士兵在乾州（今陕西乾县）战役中，给清朝的奴才甘军马安良部队严重打击。西安革命党人推翻清朝在陕西的统治后，回族革命者即以鸡毛传帖，促使宁夏（今银川市）会党响应，宁夏帮会首领刘华堂当即与各帮会首领及会友回族马四虎等聚议联合陕西会党，响应武昌起义。十一月刘华堂在宁夏举行反清起义，回、汉各族人民

^①陕西省政协：《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39页。

参加的义军,攻衙门,杀官吏,打开牢门,放出被害群众,给封建反动势力沉重打击。连清朝反动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宁夏)被‘土匪’(按,指起义的各族革命群众)陷踞,焚掠甚惨。”^①与此同时,青海的乔寿山、任得慧等人亦积极发动各族人民群众,“响应民军起义”,提出“推翻清朝、杀尽洋人”革命口号,在西宁附近的元尔地方起义。起义群众多为各族农民及游勇流民。起义者夺城池粮草,驱逐清官,毙伤不少官兵。

武昌起义前,新疆已是“一夫振臂,应者四起”^②的革命局面。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首先响应,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甘肃、陇东、宁夏、河西等地,纷纷发动起义,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给新疆各族人民极大鼓舞。由于革命党人的鼓吹提倡,哥老会在全疆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各族人民群众纷纷加入哥老会,成为新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以刘先俊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哥老会弟兄和当地少数民族百余人在迪化(乌鲁木齐)举行武装起义。刘先俊,湖南人,日本陆军学校学生,通过新疆巡抚袁大化的私人关系,来迪化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袁大化接到刘先俊即将起事的密告,对刘先俊严加防范,派马队营官刘雨沛跟踪,迫令出境。但侦骑四出,不见踪影。刘先俊却加紧联络标营、会

①《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陕甘总督长庚致内阁请代奏电》,《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六)第119页。

②钟广生:《辛亥新疆定变纪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七)第441页。

党，组织起义。十二月二十八日（旧历十一月初九日），叛徒出卖党人，交出起义者名单。袁大化捕杀了起义总统唐小云、帮统陈光模。刘先俊发现事泄，乃带领部众百余人于当天薄暮起事，计划夺枪登城，轰击各官署及军械局。但由于起义没有作好准备，又被叛徒告密，起义刚一发动，就被清朝新疆巡抚袁大化镇压了。刘先俊被捕遇难。同时阵亡的烈士数十人。起义暂告失败。^①消息传到伊犁，人心激愤。新疆革命的烈火又在伊犁燃烧了起来。一九一二年一月，以伊犁协领杨赞绪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伊犁发动武装起义。杨赞绪早年为湖北将弁学堂优等生，留学日本户山陆军大学，参加同盟会。归国后，历任湖北各军营操教习和管带，暗中进行革命活动。后调伊犁新军充任步兵标统，一九一一年十月底升署协统。^②武昌起义后，武汉革命党人曾拍一密电由上海陈其美交俄国领事转给伊犁革命党人冯特民，约期起义响应。^③当时，冯特民在陆军模范营协统杨赞绪部任书记，因为条件不成熟，没有立刻起事。适当其时，伊犁将军广福（蒙古族）和杭州将军志锐对调，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隙。冯特民、杨赞绪等约定，分别运动模范营和游勇，给游勇以厚饷，令其四出宣传，动摇军心。为了开展革命活动，冯特民、杨赞绪将革命党人分布于军队各个单位任职，以公开身份作掩护进行工作。冯特民主持伊犁同盟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80页。

②《军机处硃批奏折档》、《陆军部档》、《责任内阁档》。

③邹鲁：《新疆伊犁举义》，《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七）第428页。

会工作，一面发展会员，一面利用各省会馆，联络各界人士，逐渐形成了伊犁革命的主力。为了“振聩起聋，开通民智”，冯特民在惠远城创办汉、满、蒙、维四种文字的《伊犁白话报》，宣传革命，宣传爱国，宣传民族平等。报上辟有“爱国话史”专栏，大声疾呼筹还国债，收回主权。杨赞绪等在宁远县（今伊宁市）陕甘新回族大寺（又名坑坑寺，为当地名胜古寺），召开筹还国债大会，当地文武官员，各族群众踊跃参加大会。当场有回族周姓孀妇，损献金镯一只。回族知识分子韩玉书也上台悲痛陈词，表示民气不馁，自有奋起图强之日。新满营、锡伯营、索伦营来函报馆表示：要是“伊犁举办国会……，情愿首先提倡”。察合尔、额鲁特、哈萨克“亦不能落在人后”。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宣传，伊犁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很高。伊犁新军起义枪声一响，当地汉、回、维吾尔、哈萨克、蒙古、锡伯等各族人民，积极支持和参加起义。在革命进程中，回族人民奋起，哥老会回族首领马得元和韩玉书率领一百多名回民敢死队参加。回族马凌霄还被革命党人指定为联络回族人民的代表。冯特民率领义勇团攻打惠远城时，维、哈、回、汉各族人民群众，战斗激烈，士气极振。维吾尔族阿奇木伯克、巨商玉山巴依、牙合甫巴依在起义前也都表示赞助革命，并愿出资财，为革命效力。伊犁起义后，许多爱国的维吾尔族商民为起义军支援皮靴、马鞍以及其他用品。^①当伊犁革命军（即四

^①邓宝珊：《伊犁革命回忆录》；杨逢春：《伊犁辛亥革命概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10—522页。

营官兵)在西湖、精河一带的托托、沙泉等地与清军激战时,锡伯、蒙古等族爱国军民,除了在物质上大力支持革命军外,还派遣自己的子弟二千多人,参加战斗,有一百多名锡伯族人民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博尔塔拉地区的蒙族也组织了骑兵部队,积极参与战斗。在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参加下,起义军击毙了伊犁将军志锐,消灭了清朝伊犁驻防军,占领了伊犁。经过一番交涉,起义军各首领和各方代表集议于商会,成立汉、满、蒙、回(指维吾尔族)、藏“五族共进会”,宣布实行五族共和,共同组织了中华民国新伊大都督临时地方政府。察哈尔、厄鲁特的总管,哈萨克的千户长等都表示拥护新政权。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派专人到伊犁,表示拥护革命。^①二月二十日又开办《新报》,自称是新伊都督府的喉舌。它提出民族之间,不分畛域,汉、满、蒙、回、维、哈均应一视同仁。并禁止对少数民族有污辱性的称呼,违犯者处以一至五两罚金。又特别劝谕满族群众,不要作游手好闲的废物,应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这个报纸起了宣传政策,鼓动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

在伊犁革命胜利鼓舞下,一九一二年二月以铁木耳为首的哈密维吾尔族农奴,也举行了反抗哈密世袭维吾尔王残酷统治的起义。维吾尔族人民这次起义,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起义军迅速扩大,并与巴里坤汉族人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屡败敌军。哈密维吾尔王沙木胡苏特,一方面派宗教界

^①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45期,第17页。

首领和绅耆进山劝说铁木耳，一方面派人到镇西去请镇台易盛富率兵前来镇压。当铁木耳得到这个消息后，即在南山口设下伏兵，捕杀了前来镇压哈密维族人民起义的凶手易盛富。然后围攻哈密王府，声势大振。^①在这次战斗中，维族妇女也参加了。她们缝制了好多面旗帜，并用树枝扎成假人，插在山上，在战斗时她们呐喊助威。在哈密各族人民打击下，沙木胡苏特陷于无法自存的境地。喀什噶尔道（今疏勒）的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也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七日发动起义，杀死喀什道尹袁鸿佑等清朝官吏，宣布光复。这一胜利给南疆各族人民极大鼓舞，哥老会组织中的各族群众纷纷起来响应，在焉耆、阿克苏、库车、轮台、和田等地“杀官起事”，击杀清政府派在各地的贪官污吏。

天山南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使新疆巡抚袁大化穷于应付。清朝驻新疆各级官吏闻风丧胆，争先逃逸入关。一九一二年六月，新疆全省正式宣布共和，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从此宣告结束。^②

（四）西南各族人民掀起反清浪潮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南各省，各族人民闻风而起，反清浪潮汹涌澎湃。

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四川省西昌彝、汉各族人民首先发难。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张耀堂在西昌地区举行反清武装起

^①哈密维族起事经过，见张建勋译：《新疆哈密民变之经过》，《边事研究》第4期。

^②杨筱农：《伊犁革命回忆录》，《天山》杂志，1934年第一卷一期。

义。在“推翻清朝，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革命口号鼓动下，彝、汉各族人民踊跃参加起义队伍。他们攻占了西昌县城，杀死了西昌知县章庆，毁教堂，驱教士，人心大振。反动统治者慑于人民的威力，不敢用武力镇压，便通过和战两手兼用的办法，首先佯示和议，欺骗起义军退出城外，然后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暗中调兵遣将猛扑过来，把义军置于死地。再加以混进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奴隶主阶级知识分子如赖荣廷等，在危急关头发生动摇，叛变投敌。郝龙光又倒戈攻打义军，致使这次起义遭到失败。起义领导人多被捕杀，各族起义群众也大部壮烈牺牲。

在西昌张耀堂领导的彝、汉各族人民举行反清斗争影响下，德昌也发生类似的“攻城逐令”事件。起义者杀死了欺压人民的德昌县佐贾瑞德。会理县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土司、土目也宣布反清，联合进攻会理县城。川西北松潘、瓦寺一带的藏族同胞，也纷纷拿起武器，反抗清政府的当地驻军。道孚的藏族人民群众同汉族人民群众一起进行反清武装斗争。川边的乡城、理塘、丹巴等地藏族群众也响应武昌革命，纷纷起来参加反抗清政府的活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贵州各族的村寨，人们兴高采烈，群情振奋。

早在武昌起义前，滇西腾冲、保山一带傣、景颇族人民就“伏莽四起”、“群策群力”、酝酿着起来造反。同盟会腾越（今腾冲）支部，利用民心，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腾冲发动各族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攻占了腾越，镇压了

清朝总兵张嘉玉等一批清朝反动官吏，深受当地傣、景颇、汉族人民的拥护。起义者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首的“滇西军都督府”，同盟会员张文光为都督。起义军订军约、申纪律，严禁奸淫抢掠。当地各族人民踊跃参加义军，使这支军队在两日内，就发展到近万人。二十九日，腾冲起义军分兵三路，进军永昌府（今保山县）、顺宁府（今凤庆县）、云龙州（今云龙县）等地，并约期会攻大理。军锋所至，敌军丧胆，民心大振。起义军东进途中，又有大量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以及会党成员加入，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人。十一月一日，龙陵县清朝驻军士兵，又杀死清军管带，宣布起义，加入腾冲起义军。到十一月中旬，腾冲起义军已控制了腾冲、保山、龙陵、凤庆、云县、临沧、云龙等大片地区。但由于领导这次起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敌人过于宽仁，不晓得镇压反革命，给敌人得以喘息和反扑的机会。加上掌握“云南军都督府”领导权的立宪党人的出卖，使这次轰动滇西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各族革命人民惨遭杀害，许多为推翻滇西清朝反动统治立下彪炳功勋的革命党人献出了生命。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的各族人民，武昌起义后也“乘间思起”，成立了云南省“迤西自治机关总部”，草拟章程，并“通行各属，宣布反正”，^①悬旗庆贺武昌起义的胜利。在昆明读书的十几名剑川白族学生回乡宣传革命，并发动群众冲进清朝设在当地的衙门，烧毁刑具，打开牢门放出无辜

^①由云龙：《迤西各属光复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77页。

受害的各族人民群众。在滇南蒙自一带清军里服役的各族战士，在各族人民起义反清的鼓舞和感召下，也发动了兵变，驱逐了蒙自原清政府云南七十三标教练赵复祥和地头蛇朱朝英。与此同时，贵州省贵定县的苗、彝、汉各族人民，在彝族革命知识分子、同盟会员黄济舟的领导下，进攻府署，赶走了知府陈庆慈。黔东南和滇南的苗族人民也与各族人民一起，赶走了清朝地方官吏，使这些地区迅速得到光复。

（五）湘西各族人民发动武装起义

邻近武昌的湖南省，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区之一。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共进会员焦达峰和陈作新率领会党，联络新军起义，夺取长沙。喜讯传到湘西，世代生活在那里的苗、土家和汉族人民额手称庆，欢欣鼓舞，并在革命党人的策划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清朝在湘西的反动统治。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田应全等人便深入湘西联络反清的帮会，发动苗、土家、汉族人民起义。为了争取各方支持，他们还与凤凰厅守城清军联系，争取他们附义，里应外合。田应全等人还派人到凤凰厅长宜哨组织“光复军”，约定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晓袭击凤凰厅。消息传开，苗、土家、汉各族人民踊跃投军，不到十天，先后集合了一万六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苗族。与此相应，贵州松桃厅的苗、汉族人民也迅速组织了二千多人，由张子衡率领，星夜赶到凤凰厅境，准备共同起义。这时距离原定起义时间还有一个多月。但情况的发展，拖延时间十分不利，为此便决定提前在十月二十七日起义。各族革命群众星夜赶到长宜哨集中，然后分三路

进攻凤凰厅。各族人民在田应全领导下以长矛、梭标、弯镰、为武器，英勇顽强地战斗。但由于起义时间提前，未能得到守城附义官兵的响应，这次起义蒙受沉重损失，牺牲各族革命者一百七十多人。在撤退途中，又遭到苗族守备反动武装的截击，牺牲了部分力量。接着驻凤凰厅的辰源兵备道道员朱益濬，利令智昏，连忙大肆搜捕起义群众。自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六日，被清朝地方官吏捕杀的各族革命人民多达一千多人。然而，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吓不倒各族起义群众。他们掩埋了同伴的尸首，又继续坚持战斗。加上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清王朝已面临总崩溃，无力顽抗抵御，苗、汉各族人民终于攻占了凤凰厅，迫使朱益濬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交出政权。愤怒的起义各族群众处决了作恶多端的朱益濬，成立了“湘西军政府”，取得了光复湘西的胜利。^①

湖南的近邻广西，武昌起义后，以各族农民为主体的“民军峰起”，声势浩大，各地纷纷宣布独立，清朝在广西的统治土崩瓦解。十一月六日，广西革命党人率领民军，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进入省城桂林，巡抚沈秉堃“知大势已去”，大局难于支持，也被迫同意宣布独立，脱离清朝，成立军政府。^②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武昌起义后全国各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在内地和边疆地区奋起痛击清朝地方统治者，

①黄穆如：《辛亥革命湘西光复记》，《民族团结》1961年10—11期。

②邹鲁：《广西光复》，《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七）第220页。

充分显示了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血肉关系，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反封建斗争的史册。

各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说明，在阶级社会里，革命问题对任何民族都是最根本的问题。少数民族中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它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紧密结合着。

第 五 章

武昌起义后各族人民反抗 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一、东北和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粉碎沙俄策划 外蒙古、呼伦贝尔“独立”阴谋的斗争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面临灭顶之灾。帝国主义为了挽救摇摇欲倒的清王朝的命运，维护其在华的既得利益，便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妄图把中国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扼杀在摇篮中。在破坏和绞杀辛亥革命的罪恶行径中，沙皇俄国显得特别疯狂和无耻。

早在武昌起义前，沙皇俄国便竭力帮助清政府，残酷镇压革命人士。例如，一九〇八年沙俄军警在哈尔滨俄国饭店就逮捕了安庆起义的组织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熊成基，并把他杀害。一九一〇年沙俄哥萨克骑兵又杀害了长期在东北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蒋大同。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武昌起义前一天，汉口沙俄租界的巡捕又侦探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组织起义的机关，并协助清政府湖广总督瑞澂调动大批军警，按它们获得的名册逐个搜捕革命党人。这些事实充分表明，沙皇俄国为了扩大它对中国的侵略，对辛亥

革命进行了恶毒的干涉和破坏。

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主要是不断地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它是攫取侵华利益最多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武昌起义前，沙俄政府在两次内阁特别会议上就制定了吞并我国东北和蒙古等地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武昌起义刚一爆发，沙俄就同日本勾结，阴谋同时出兵我国东北和华北，镇压革命，占领中国领土。它除了在中俄接壤的中国北部及东北地区策动叛乱，制造所谓“独立”丑剧外，还公然出兵入侵我国西北的唐努乌梁海，在新疆进行颠覆活动，同日本密谋瓜分内蒙古等。

沙俄蓄谋侵略蒙古地区，由来已久。早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当时沙俄统治集团为了取得对日战争失败的“补偿”，便掀起了侵略蒙古地区的喧嚣。特别是一九〇七年俄、日两国签订了第一次密约，重新划分日、俄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势力范围以后，沙俄便更猖狂向蒙古派遣所谓“探险队”、“考察队”、“远征队”，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充当“霸占蒙古的先锋队”，深入蒙古腹地，广泛搜集情报。沙俄还指使驻华公使加紧笼络和收买蒙古上层喇嘛和封建王公贵族，培植亲俄分裂势力，挑拨蒙古族与满、汉等各族的关系。并通过向蒙古族败类提供基地、武器弹药，组织别动队作为沙俄对蒙古侵略的工具。充分暴露了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

关于沙俄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侵华政策，一九一二年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一份上沙皇的奏折中曾回顾说：几年来

沙俄政府“曾想通过使用武力和夺取中国某些地区的办法来达到加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以便在我们需要把力量集中在我国对外政治活动的其他方面的时候，在这些地区不致冒引起麻烦的风险。”^①他所说的“夺取中国某些地区”，主要是指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这位外交大臣不打自招的回顾，正好表明沙皇俄国在辛亥革命时期妄图夺取我国东北和蒙古领土的狂妄野心。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清封建王朝的末日已经到来。引起沙俄强盗的惶恐不安。为了绞杀中国革命，实现沙俄“吞并中国领土”的“宿愿”。^②沙俄趁辛亥革命给清朝政府造成的危局，认为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时机已到，便在北部中国制造事端。它一方面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另一方面阴谋策动和组织外蒙古一小撮民族败类封建王公贵族和喇嘛活佛搞所谓“独立”、“自治”，分割中国领土。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七日沙皇政府召开内阁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吞并外蒙古的问题。这次特别会议的记录说：“在蒙古问题上发生的危机，并不出我们的意料，因为很久以来我们一直给予蒙人支持和庇护；我国一些驻蒙代表在颇大程度上促使蒙人确信，若要与中国脱

①《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2辑，第19卷，第2册，第33—34页，第379号文件。

②《俄国外长沙查诺夫给沙皇的奏议》，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416页。

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①由此可见，外蒙古一小撮民族败类的“独立”叛乱，完全是多年来沙俄政府一手精心策划的，是沙俄向外蒙古封建王公挑唆和煽动的结果，是沙俄乘辛亥革命“大好时机”对中国实行“瓜分”政策的一种表现。

为了实现肢解中国外蒙古的反动图谋，沙俄参谋总部拟定了题为《蒙古即将来临的政变及其实现的方法》的意见书，并交给了沙俄外交部。这个意见书，包括有建立武器贮藏网、组织叛乱队伍、发动叛乱夺取政权等内容的详尽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九一一年七月沙俄派出军队八百余名闯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并供给一小撮叛国分子大量枪支弹药，公开怂恿和支持他们在外蒙古进行脱离中国的叛国活动。十一月三十一日在沙俄驻库伦总领事馆一手指挥下，杭达多尔济等一伙叛贼向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要三多立即离境。然后，沙俄侵略军率领叛匪围攻清政府在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十二月五日，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被沙俄哥萨克侵略军押解出境。十二月十六日，沙俄策划以卖国贼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粉墨登场，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哲布尊丹巴当“皇帝”，以“共戴”为年号，并在沙俄的卵翼下组织傀儡政府。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沙俄内阁总理科科弗采夫在同

^①《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第二辑，第18卷，第一分册，第340页，第329号文件。译文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日本驻俄大使密谈时，就曾表示：俄国以国境与中国接壤过长，打算先占外蒙，然后再图南下。^①这个谈话清楚表明，沙俄在外蒙搞“独立”叛乱，侵占中国领土，是按照预先考虑的计划进行的。侵占外蒙是沙俄分裂、侵占我国领土的第一步。

一九一二年一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又策动该地蒙古族封建贵族札萨克图汗发动叛乱，驱赶清朝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致使该城陷落。

然后，沙俄与外蒙傀儡政府签订一连串所谓条约，诸如什么《俄蒙协约》、《通商章程》、《开矿合同》、《筑路条约》、《电信条约》等，通过这些所谓“协约”，沙俄政府取得在中国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同时又使沙俄同叛国分子互相勾结，残暴勒索和压迫外蒙古各族人民合法化。

由此可见，沙俄策划外蒙古反动封建王公贵族、上层喇嘛的所谓“独立”，正如当时内蒙古伊克昭盟爱国王公所揭露的：“蒙古早为‘中华领土，环球各国，共见共闻’，俄国所谓‘保护我蒙’，是为了‘涎我利权’的侵略野心。”^②

蒙古地区位于中国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沙俄策动外蒙古一小撮甘心充当沙俄儿皇帝的反动封建王公贵族

①《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第498页。转引自彭泽周：《辛亥革命与日本西园寺内阁》，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6册。

②西盟王公招待处编：《西盟会议始末记》第8、11、12页；亦见《民国经世文编·正编》第18册、第3——5页。

和宗教反动上层如活佛等，叛卖祖国，分割中国领土，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外蒙古库伦一小撮亲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虽然打起“独立”旗号，但响应者却寥寥无几。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拒绝响应，喀尔喀四部的蒙古族王公活佛也大多不赞成所谓“独立”。

一九一二年一月，清王朝倒台。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孙中山曾多次致电内外蒙古王公、活佛，劝诫他们不要投靠外国，上沙俄分裂中国的圈套，希望他们把南京临时政府“五族共和”的民族团结政策，迅速“遍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①取消“独立”。但这些卖国贼一意孤行，不听劝诫，擅自与沙俄于十一月三日签订了《俄蒙协约》。消息传出，全国各政党、团体和各族人民纷纷集会，发出通电，愤怒谴责沙俄的强盗行为，强烈要求抗击沙俄侵略，讨伐外蒙傀儡集团。各族人民抗俄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在全国各族人民反对《俄蒙协约》的影响下，当时中国外交部在十一月七日发出声明，指出：俄国与外蒙古所订立的任何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并抗议《俄蒙协定》“侵犯中国主权”。^②蒙古各地的爱国人士也纷纷集会，坚决拥戴“五族共和”，愤怒声讨哲布尊丹巴的分裂叛国罪行，要求外蒙叛国者取消“独立”。在北京的蒙古族爱国王公、活佛组织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发表通告：不承认非法的《俄蒙协约》，痛斥哲布尊丹巴一小撮民族败类，

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

②《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405页。

“妄称独立，伪立政府”的叛国罪行。并庄严宣布：“中华民国建设以来，内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藏人民共建新国。惟外蒙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勾结图什业图（即土谢图）部落、车臣汗部落内三数王公，妄称独立，伪立政府，实则外蒙四部落及其迤西两部落各旗并未赞同。”他们通电全国，宣布外蒙一小撮分裂卖国贼的所谓“独立”，“蒙古全体，并未承认”。并严正指出：“伪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①这个通告，表达了大多数爱国王公的意见，也反映了广大蒙古族人民的呼声。

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东蒙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在长春开会，“解释共和真理，俾晓然于五族联合利益”，责令外蒙卖国王公“取消独立”，确认“蒙边要隘地点，许政府派兵镇驻”，“蒙人应遵民国法律。”^②一九一三年一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不承认俄库协约”，请求民国政府“保护西盟要地”。^③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去文，陈述“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

①《时事日志》，《庸言》第一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

②《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九卷第6号。

③《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第13—15页。

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①《俄蒙协定》的签订，即使是在外蒙古，也激起不少爱国王公的不满。他们纷纷指出：沙俄策划外蒙“独立”，签订所谓《俄蒙协定》有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无非是把蒙古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使外蒙成为“布哈拉或高丽（指朝鲜）第二而已。”^②这些就连沙俄驻库伦领事在给沙皇的密电中也不得不承认：

“自俄库协约发表后，外蒙古各王公、台吉等迭次开会反对，而内蒙各盟旗对抗尤力。”^③这说明蒙古叛国分子的分裂，不得人心，沙俄的侵略引起全民的愤慨。

《俄蒙协定》公布后，“土谢图王即电致政府，言该部并无承认协约之举动。”^④全国各族人民也纷纷集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和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卖国行为。沙俄觉得要“并吞蒙古，其势有所不能。”^⑤便改变策略，以退为进。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沙俄以承认中国在外蒙有“宗主权”^⑥的方式，否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完全主权。在中俄互换的照会中，沙俄“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由于卖国贼袁世凯出于复辟帝制，要通过出卖领土主权来换取沙俄对其搞帝制自为的支持，便承

①《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第15—16页。

②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第63——64页。

③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民立报》。

④高劳：《独立后之库伦及俄蒙协约》，《东方杂志》第九卷第8号。

⑤张中绂：《中华民国外交史》。

⑥《中俄声明文件》，转引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第345页。

认了所谓外蒙古的“自治权”，接受《俄蒙商务专案》。外蒙古由“独立”改为“自治”。字面改了，其实即由“俄立”，改为“俄治”。

沙俄在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又武装强占了唐努乌梁海。

唐努乌梁海位于我国最西北部。它的东北、北部、西北部紧邻萨彦山和俄国相接壤，南依唐努山。总面积十七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直到一九一一年沙俄入侵这个地区之前，唐努乌梁海一直隶属清朝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①贪婪的沙皇俄国对这块有丰富金矿、煤矿、盐田和出产珍贵毛皮的中国领土，早就垂涎三尺，把它称之为“移民之天国。”一九一一年初，沙俄《新时代》杂志发表文章，公然叫嚣唐努乌梁海“当属俄境”。^②一九一一年底，沙俄一手制造外蒙古“独立”，将唐努乌梁海同中国其他领土隔开。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上沙皇的奏折中报告说：沙俄驻华代办谢金主张“立即占领乌梁海边区”，而沙查诺夫自己则认为“俄国在法律上没有权利占有乌梁海地区”。尼古拉二世在看完沙查诺夫这份奏折后，作了如下的批语：“恰恰相反，朕完全同

①唐努乌梁海清朝时属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可参见：《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祥麟等关于沙俄侵犯唐努乌梁海的奏折》，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78卷，第14——16页；《库伦都护使陈毅呈文》，转引自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二篇，第152页。

②《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75页。

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地区的问题时起，已逾三月有余，中国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在沿中国边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为自己捞得好处。请回忆一下我们占领阿穆尔边区的历史。”^①所谓三个多月来，“中国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沙俄一手制造了外蒙“独立”。尼古拉二世这个批示表明，在他看来，强占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时机已到，找不到什么法律依据，也要强行占领。于是在一九一二年初，沙俄侵略者在乌梁海地区策动了暴乱。一九一二年七、八月间，沙俄又指使外蒙古傀儡集团出兵唐努乌梁海，强迫当地各族上层追随外蒙古“独立”，脱离中国。接着，沙俄政府公然非法决议，把唐努乌梁海地区宣布为在“俄国保护之下”，并在那里设立“边疆特使”，实行侵略性移民，象野兽一样，硬把我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强行占去。

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唐努乌梁海各族人民的愤怒反对。沙俄强盗对人民的反抗进行血腥的镇压，当地汉人“悉被驱除”。然而，爱国的唐努乌梁海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不断派人到乌里雅苏台，向中国官员声诉沙俄的侵略暴行，“沥陈眷恋祖国之心。”^②唐努乌梁海的爱国王公、官吏，珍藏清政府发给他们的印信。沙俄侵略者多次胁迫交出，都被拒绝，表现了他们忠于祖国的爱国深情。

①《（使俄萨荫图致外部）俄外部搜集乌梁海凭据欲为辩论地步电》（一九一一年四月二日），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09卷，第40页。

②远东外交研究会编：《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157页。

沙俄在策划外蒙“独立”和强占唐努乌梁海的同时，又在黑龙江省、内蒙古等地发动武装进犯和策动叛乱，继续推行侵吞中国领土的瓜分政策，和库伦的所谓“独立”呼应。

黑龙江省西部的呼伦贝尔地区是额尔古纳河和兴安岭所在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早为沙俄侵略者所觊觎。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驻海拉尔（呼伦贝尔首府）领事，也乘机收买达斡尔族和额鲁特陈巴尔虎蒙古族的总管福胜、东扎和等人为主的民族分裂主义叛国分子。在沙俄侵略者的幕后导演下，一九一一年九月，福胜等召集部分蒙古族王公举行秘密会议，阴谋宣布“独立”。他们的叛国行为，遭到蒙古族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清政府拒绝之后，便与外蒙傀儡集团串通一气，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在沙俄驻海拉尔领事的指挥下，发动叛乱。沙俄调动西伯利亚边防部队的大批马、步、炮兵，带领叛乱分子先后攻占海拉尔和胪滨府（今满洲里），声称“独立”。在胪滨成立了以福胜为头子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①库伦叛乱当局授予福胜为库伦傀儡政府驻海拉尔的总督，把呼伦贝尔地区并入所谓“大蒙古国”。事实上，呼伦地区继外蒙古之后，又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自治”，就是沙俄殖民统治，它给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蒙古等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沙俄的分裂阴谋，不久即被爱国的呼伦贝尔各族人民看穿，遭到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额尔古纳河流域的爱国边卡士兵和蒙古族人民进行武装反抗，占领了室韦（又名吉拉

^①《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篇》第103页。

林)一带。中国各族人民纷纷起来愤怒声讨沙俄肢解中国领土，吞并呼伦贝尔地区的可耻阴谋，坚决抨击卖国贼，终于挫败沙俄这一侵略图谋，呼伦贝尔重新归回黑龙江省。

一九一二年八月，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反动蒙古族王公乌泰，受沙俄的驱使又策动叛乱。乌泰勾结本旗和科右后旗部分反动王公，在沙俄的支持下组织反动武装，分三路进犯洮南府，并陷镇东县。同时散发了《东蒙古独立宣言》，公然狂叫要投靠“库伦皇帝”，在沙俄的支撑下“宣布独立，与绝中国。”^①乌泰叛变激起各族人民的公愤，蒙、汉各族人民和蒙古族爱国王公奋起反对，叛匪处境极其孤立。北京政府趁人民反叛的大好形势，及时调派军队前往平叛。在各族人民的合力支持和坚决打击下，叛军溃败。沙俄为“声援”乌泰叛匪，一九一二年十月派外蒙伪军数千人进犯内蒙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及苏尼特旗。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沙俄雇佣军窜犯了内蒙西二盟及察哈尔、锡林郭勒全盟、昭乌达盟的克什克腾及两巴林旗的许多地方。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罪恶滔天。蒙、汉各族人民无比憎恨。他们和爱国的军队协同一致，奋力歼敌，到一九一三年九月，这批作恶多端的俄国雇佣军被消灭了大半，其余败逃外蒙古，沙俄侵略内蒙古的阴谋，终被各族人民粉碎了。

^①滨田纯义、柏原孝久合著：《蒙古地志》，大正八年（1919年）长春版（日文本），上卷，第1544页。

二、新疆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和

分裂活动的英勇斗争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先后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等地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在当地反动统治。新疆的革命引起沙俄的恐惧和仇视。正如列宁所指出：伟大的“中国革命在欧洲资产阶级中间所引起的不是对自由和民主事业的热忱，……而是对掠夺中国、开始瓜分中国、攫取中国领土的欲望。”^①沙俄政府“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再发出不要“将机会错过”^②的命令下，沙俄侵略者叫嚣要“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几个省份”。^③一九一二年初，沙俄侵略者以“保护”侨民、俄商为借口，分兵三路进犯阿尔泰、伊犁、喀什噶尔，镇压新疆地区的革命活动，乘机扩大侵略，妄图把我国新疆变成自己独占的殖民地。

沙俄在新疆的侵略活动有许多都是以披着合法外衣的领事进行的。自从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在我国新疆设立领事馆以来，就在领事馆区非法建立和不断扩大武装卫队，干涉我国内政。此外，沙俄领事馆还通过在未设领事的地方非法指派“乡约”（亦称“商董”或“阿克沙哈勒”）充当沙俄在新

①列宁：《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列宁全集》第19卷，第9页。

②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第11页。

③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

疆地区各个角落的爪牙和坐探。据当年曾任塔城领事的泄戈亚夫连斯基供认，乡约的任务是定期向领事汇报“边境地区的情况”，送交“商业贸易”和“当地一切重大事件”的情报资料，支持领事向中国政府当局“保护俄国方面的利益”。^①因此，自十九世纪末叶沙俄在我国新疆非法指派乡约以来，到辛亥革命前夕，被指派的乡约遍布整个天山南北的城镇乡村。这些乡约，在俄国领事的直接支持与庇护下，狐假虎威，骄横恣肆。他们公开侵犯中国主权，包庇奸商，鱼肉中国人民，胁迫、诱骗我国各族人民加入俄籍，不断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九一二年初，喀什道玛喇尔巴什地方，叶尔羌城及和阗州等地各族人民，相继掀起了反对沙俄侵略分子的斗争。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终于在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于田县爆发了轰动中外的“策勒村事件”（当地群众称为“安见扑哈拉事件”——即“俄侨事件”）。这是武昌起义爆发后，新疆各族人民英勇反抗沙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反帝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策勒村（今策勒县）原是南疆于田县的一个村子。自从一八八一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的侵略势力就伸向这里。辛亥革命前喀什噶尔总领事索柯夫曾三次到达于田策勒等地，指派阿克沙哈勒（乡约），煽动新疆人民投俄。

^①泄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西部中国》，1906年彼得堡版，第三十七章，第369页。译文转引自何王畴：《一九一二年策勒村人民反对沙俄侵略者的斗争》，《新疆历史论文集》，197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第415页。

马尔格兰籍的赛义德·阿吉，原系我国新疆维吾尔族人^①，生于和田县。十六岁，随同去乌孜别克斯坦的商人到俄国，卖身投靠沙俄官府，加入俄籍。赛义德·阿吉，一九〇五年伪装成商人被沙俄派到喀什噶尔，在贸易圈鬼混了一段时间，就被沙俄总领事派到策勒一带活动。赛义德·阿吉在沙俄领事的支持下，勾结新近私自加入俄籍的地痞流氓，在策勒村成立俄侨组织，依仗沙俄侵略势力，独霸一方，干涉地方政权；肆意逞凶，非法吊杀华人；霸占田地，任意敲诈勒索；纠集打手，拼凑侵略武装。武昌起义后，赛义德·阿吉，在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索柯夫的指使下，在策勒村公开散布“中国发生混乱”，诱迫中国居民投靠沙俄，向他们缴纳钱粮。赛义德·阿吉还从沙俄驻喀什领事馆领得武装弹药，阴谋伺机叛乱。他狂吠：“中国现无力量”，“中国官吏再不能管束”，煽惑群众“从速投俄”，^②明目张胆地进行颠覆活动。沙俄的挑衅，激起各族人民的义愤，策勒村维吾尔族人民群众涌进于田县府告状，指控赛义德·阿吉“结集殷实户民，逼令买票投俄”，欺压各族人民的侵略罪行。赛义德·阿吉在沙俄领事索柯夫和副领事贝伦斯的支持下，带领一帮打手闯入县府闹事。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于田县府将赛义德·阿吉关押。但在沙俄领事的胁迫下，地方官吏将赛义

①赛义德·阿吉，一说是乌孜别克族人，见王宗维：《我国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英勇斗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②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02页。

德·阿吉交沙俄驻喀什副领事贝伦斯带到喀什噶尔保护起来，后来又擅自释放。结果，赛义德·阿吉更加嚣张。五月间，他带着领事的指示，返回于田县，对当地人民进行疯狂报复。接着又在六月十日，无故毒打当地群众多人。被激怒的各族人民群众“呼声若雷，奋勇当先”，“蜂涌上前”，包围了赛义德·阿吉一伙在策勒村的巢穴。穷凶极恶的沙俄侵略者，竟开枪射击斗争群众，当场打死各族群众多人。愤怒的各族人民当即还击，当场击毙赛义德·阿吉的几个爪牙，放火烧了侵略者盘踞的花园^①。赛义德·阿吉连夜逃窜，潜入喀什噶尔沙俄领事馆。二十八个沙俄侵略者及其走狗被击毙，作恶逞凶的沙俄侵略分子遭到可耻的下场。

“策勒村事件”是沙俄政府蓄意挑起的，是它妄图利用新疆地区的革命，乘机侵吞我国新疆地区罪恶计划的一个具体步骤。“策勒村事件”发生后，沙俄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无理派兵五百侵入喀什城，强迫中国喀什噶尔道尹公署官员答应处死中国反抗沙俄侵略的爱国官民。同时又通过沙皇政府威胁中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查办，并提出惩办凶手一百八十人和赔偿恤款白银八十多万两等无理要求，并以战争相威胁。八月二十七日，俄军逞凶作恶，擅自炸毁中国新疆喀什噶尔城门，入城挑衅，妄图挑起更大的冲突。^②并收买叛国分子马福兴在南疆组织所谓“独立回教国”，然后进犯北疆，妄图把我国新疆划入沙俄的版图。为粉碎沙俄的

①《外交部交涉节要》，《喀什噶尔和田州属俄人被戕案》，1912年7月。

②杨增新：《补过斋牍》乙集二，第41页。

侵略阴谋，南疆维吾尔等各族人民，纷纷组织团勇到处掀起反抗怒潮，决心用战斗来保卫乡土，以致形成杀一会党或人民群众，“即有激起暴动”^①之势。在哥老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发展。喀什哥老会众编成新军，作为抗俄爱国武装。新军包括汉、维各族群众，“甚至远在和田、莎车等属之缠民（指维吾尔族），亦招来喀什当兵。”新军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并且列队示威，抗议沙俄的侵略罪行。各族人民终于挫败了沙俄企图处决中国各族爱国农民的阴谋。但最后沙俄还是榨得白银七万两，并有四十名被控放火烧了赛义德·阿吉岳父家宅花园的策勒人被判四至十年徒刑。

策勒村事件是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斗争。这次斗争充分显示了我国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不甘屈服于沙俄帝国主义侵略的顽强反抗精神，严厉地惩罚了沙俄帝国主义及一小撮民族败类，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在策勒村人民斗争精神鼓舞下，天山南北，到处发生了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它标志着中国新疆各族人民的新觉醒。

一九一二年六月，沙俄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还侵占了我新疆北部伊犁重镇。在伊犁，沙俄强盗肆意掳掠，实行血腥镇压，残暴屠杀我国反侵略的各族人民，为全国人民所切齿痛恨。

在侵入伊犁的同时，沙俄又唆使外蒙伪军进攻新疆北部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03页。

的阿尔泰地区。这一地区居民大多是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其次是汉族和维吾尔族。蒙古族居住在阿尔泰山区及阿尔泰山东南，哈萨克族居住在阿尔泰山西南，汉族、维吾尔族分居于布尔津河一带及各地城镇。阿尔泰地区，包括阿尔泰乌梁海、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三部，原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参赞大臣管理地方军政，在行政区划上直隶中央。一九〇四年，清政府为加强阿尔泰地区抵抗沙俄入侵的力量，设阿尔泰办事大臣，治承化寺（今阿勒泰县）。辛亥革命后，阿尔泰办事大臣改称阿尔泰办事长官，由中央直接管辖。

沙俄为夺取阿尔泰这块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以盛产黄金驰名中外的地区，早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就指使亲俄走狗、蒙古族大封建领主海山带领叛匪五千对科布多城发动围攻。由于科布多形势危急，北京政府曾命令新疆统治者派兵往援，但援军尚未集结，科布多就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失陷。北京政府为收复失地，派新疆援军于九月进至科布多城附近的大营盘。沙俄驻科布多领事极力阻止，中国军队退驻察罕通古。十月，因我国东北三省地方部队进军外蒙平叛，科布多的外蒙叛匪大部撤回。新疆方面的各族爱国士兵激于义愤，要求趁机进军，收复科布多。但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不准士兵出击。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及俄军头目趁机声言恫吓：“若你们官兵前来，我必有以回敬。”^①一九一三年五月，外蒙伪军头目向察罕通古驻军“下战书”，进行战争叫嚣。中国驻军团长驳斥了外蒙叛匪的谬论，严正指出：“蒙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15页。

古地方，本为中国完全领土”，“岂能放弃！”外蒙所谓“独立”是“库伦一部分之行为，非蒙古全部之行为”；如若外蒙叛军“妄开边衅，则我国领土所在，我国官兵势难稍为退让。”^①六、七月间，外蒙叛军在沙俄侵略军协助下大规模进犯察罕通古，遭到我爱国军民迎头痛击，两次毙敌三百多人，战马五百余匹。察罕通古保卫战的胜利，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沙俄见武装进占不成，便转而扶植傀儡，收买阿尔泰地区蒙古族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煽动他背叛祖国，宣布阿尔泰“独立”。消息传来，全国群情激愤，许多团体、个人纷纷要求袁世凯政府派兵进剿，取消所谓独立。在全国舆论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不得不下令解除叛国分子帕勒塔职务，宣布由帕勒塔非法签订的所有“条约”，一概无效。

沙俄煽动阿尔泰蒙古族封建贵族分裂祖国，极其不得人心。阿尔泰地区各族人民誓死反抗沙俄的侵略和叛国分子的“独立”活动。当外蒙叛军入侵阿尔泰时，新土尔扈特正盟长率所辖三苏木（即佐，属于旗）的蒙古族迁移新疆内地。叛军撤走后，新土尔扈特副盟长、新和硕特、乌梁海等各部，纷纷表示忠于祖国，反对分裂。经过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终于挫败了沙俄策划阿尔泰“独立”的罪恶阴谋。

在外蒙叛军西犯阿尔泰时，沙俄侵略者又亲自派兵侵入阿尔泰地区西北的承化寺（今阿勒泰县），在哈巴河、布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19页。

尔津河等地行船开埠，移民占垦，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新疆各族爱国军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击沙俄侵略，粉碎了沙俄帝国主义分裂我国新疆的罪恶阴谋，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可是，沙俄侵略军却长期赖在阿尔泰地区不走，只是在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疆各族人民才全部把沙俄侵略者和外蒙叛军赶出了新疆。

三、西藏各族人民抗击英、俄侵略和

维护领土主权的斗争

武昌起义后，英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武装进犯我西藏的洛渝、门隅和下察隅等地，企图掠夺今中印边界东段大片中国领土。与此同时，英国又怂恿和唆使西藏“亲英派”反动集团制造所谓“独立”，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从而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一九一二年六月逃亡印度的达赖十三世在英军护送下回到拉萨。在英、俄侵略分子的支持下，达赖等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对坚持反帝爱国的藏族僧侣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和屠杀，并煽动民族仇恨，声言要驱逐“汉人”，实现“独立”，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英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西藏的用心可谓“良苦”，但中国人民包括藏族同胞，要求祖国统一，要求自由、解放的运动则不可阻挡。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藏族爱国僧侣们向民国政府发出民族团结的呼吁。藏族广大农奴拿起武器

反抗农奴主的分裂活动。西藏最大的寺院如布 资 绷（即哲蚌）、色拉、丹吉林等数万名藏族爱国僧侣投入战斗，公开与达赖分裂叛国集团对抗，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当时在西藏的英帝国主义分子贝尔也不得不承认：西藏众多僧侣仍“倾向中国”，而藏族农民更是“不喜藏官而愿中国之复返。”^①

英帝国主义策动西藏分裂，在中国各地也引起强烈的反抗。全国许多报刊愤怒谴责英国及其走狗的叛国罪行。各地人民一致抗议，并严正指出：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煽动西藏“独立”，以遂其开疆拓土的野心，就是“扰乱东亚和平的戎首。”^②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一九一二年六月，北京政府出兵西藏平乱，坚决打击叛军。达赖伪政权因为与祖国人民为敌，处境十分孤立。英国政府直接出面干涉，向袁世凯北京政府送来照会，提出“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③等无理要求，并声称以此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交换条件。当袁世凯北京政府予以驳复后，英帝国主义便趁机与叛国分子勾结，并以武力“助西藏独立”相威胁。但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趋衰落，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英帝国主义分裂我国西藏的企图最终成泡影。

沙皇俄国也趁此时机拼死向西藏伸入魔爪。一九一三年

①贝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214页；宫廷璋译《西藏史》第192页。

②《东方杂志》九卷1号：《内外时报》第34—37页；九卷5号：《内外时报》第21—25页。

③北洋政府外交部编：《西藏问题》，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93页。

四月二十五日，沙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写信给沙俄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表明俄国在一九〇七年与英国达成关于西藏的协议，^①旨在不牺牲俄国重大利益的条件下限制英国在西藏扩大势力。而今英国通过达赖谋求改变西藏地位，使之脱离中国，当由英国承担起修订一九〇七年协议的责任。还说什么达赖请求俄、英两国政府正式承认“西藏的不可侵犯性和中立地位作出新的保证”，以便“按其他方式调整不再符合于一九〇七年条约精神的既成局势。”这就是说，要重新审定英、俄条约，承认“西藏独立自主。”^②为与沙俄争夺侵略西藏的时间，当沙俄正在策划侵略阴谋时，英国则抢先用武力冒犯，侵入我西藏的帕里、江孜、日喀则、拉萨等地。九月，我国在拉萨的驻军被迫撤出，许多藏族同胞随军转移，继续坚持斗争。他们赶走了英军侵藏头目贝尔，痛打了叛贼擦戎，使侵略者和一小撮民族败类惶恐不安。

英、俄策划西藏“独立”和抢占我国西藏领土的阴谋，虽然遭到我国各族人民坚决反对，未能完全得逞。但是，英、俄侵略者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为了各自的侵略目的，英国

^①1907年8月31日的《英俄专约》，是英、俄两国彼此协议和争夺我国西藏的产物。专约共五款和一个附件。其内容是在承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原則”下，限制对方独霸在西藏的一切权益。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二分册，第239—241页。

^②原信见列宁格勒《国立中共历史档案库档案》，转引自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第三章：《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扩张》，第二节。

决定诱使袁世凯和西藏的亲英分子同意，以西藏实行“自治”为名，行分裂之实。出于这种卑鄙的政治目的，一九一三年十月，英帝国主义胁迫当时中国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妄图通过造成西藏“自治”的既成事实，把我国西藏变为英国的属地。袁世凯为了实现其做皇帝的狂妄野心，无意御外，竟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同意召开出卖中国主权的“中英藏”三方的“西姆拉会议”，给了英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这次会议是英国侵略者勾结西藏反动派瓜分我国西藏的一次最露骨的阴谋会议。实际上是由英方代表麦克马洪，操纵西藏叛匪，导演的一场瓜分中国领土的丑剧。在会议期间，麦克马洪抛出了一个所谓《西姆拉条约》草稿。在会议的中途，英国代表又揭开一个把西藏地方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范围称为“外藏”，把现在的四川、青海的一部分藏族地区称为“内藏”的秘密地图，策划所谓“外藏独立”，“内藏自治”新阴谋，要当时的北京政府就范。显而易见，英国的企图是要首先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立在其卵翼下的所谓“西藏国”，把西藏变成英国的殖民地。然后再进而侵占我青海、西康等所谓“内藏”地区。^①并乘机侵占我西藏与印度毗连地方的大片领土。

英国侵略者的罪恶阴谋，遭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西姆拉条约》草稿的内容传到北京，就连袁世凯控制的北京政府亦不敢同意在条约上签字，并立即召回代表。英国代表蛮不讲理地限中国一星期内答复是否接受，否则即宣

^①北京政府外交部：《藏案纪略》；《西藏交涉略史》，第五章。

布会议破裂。袁世凯政府作了让步，但英国始终坚持原约、不准改议。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英国竟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协约上签字。中国代表陈贻范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拒绝在协约上签字，并在七月三日会议上正式声明：“凡英国同西藏地方政府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①英国侵略者策划的这次会议遭到可耻破产。此后，中国历届政府，也从未承认《西姆拉条约》。

在西姆拉会议进行期间，沙皇俄国唯恐落在英国之后，积极策动蒙藏地方反动势力，企图将蒙古、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入俄国。沙俄一面通过它在外蒙古扶植的傀儡哲布尊丹巴拉拢达赖，一面又指令大间谍德尔智加紧在西藏上层分子中进行分裂活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达赖委派德尔智为“代表”去库伦参与投靠沙俄的外蒙古傀儡当局议会，秘密签订了非法的“蒙藏条约”。两个傀儡在沙俄导演下，互相“赞同和承认”各自“成立独立的国家”，叫嚷什么：“蒙古与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立，自成两国”，又说什么“西藏达赖喇嘛承认蒙古之自治权，蒙古政府承认西藏之自治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之独立”，^②等等。这一“条约”因遭我国各族人民的誓死反对而成为废纸，可是，它也成为老沙皇策划攫夺中国蒙藏地区的铁证。

^①《陈贻范七月四日上外交部电》，《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0页。

^②（英）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第23章《蒙古》；附录十三《相传之一九一三年蒙藏协约》。按，条约所署之年月，应为一九一四年一月。见一九三〇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第 六 章

台湾高山族等各族人民英勇抗击 日本殖民主义野蛮统治的斗争

一八九五年四月，因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悲剧。

日本殖民主义者占领台湾后，便在那里设立总督府，任命军事头目任总督，对我国世代代生息繁衍，英勇战斗在台湾的高山族和汉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压榨和非人的摧残。日本殖民主义者通过所谓“清庄运动”和颁布“特别法”、“‘匪徒’惩罚令”等，把凡是不服从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各族人民都诬称为“匪徒”，肆意捕杀。仅桦山资纪初到台湾任台湾总督后的三个月间，平均每天就有六、七名台湾爱国者被绑赴台北西门外刑场处死，然后暴尸数日，投诸荒野^①。诗人毛乃庸记录了这种惨景：“赤嵌城头鬼夜哭，白骨如山压城麓。炮雷一震城门开，长须虾夷（指日本侵略者）海上来。……虾夷得意肆荼毒，日日括金还括粟，……横行淫掠复何堪！轻则拘囚重诛戮。城中碧血化青磷，城外狐狸饱残

^①王芸生著：《台湾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68页。

肉。”^①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其军事殖民统治，在台湾建立起严密的警察制度，进行法西斯统治。台湾各族人民一举一动都受遍布台湾各地警察的严密监视。它们随时可以“违警例”为借口给台湾各族人民施以酷刑、甚至处死。日本殖民主义者还通过推行保甲制度，厉行“连座法”，肆意逼迫台湾各族人民承担各种捐税和服役义务。台湾人民完全失去了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稍有反抗，就要受到残酷镇压。台湾人民起码的生活条件都被剥夺净尽。

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剥削台湾各族人民的过程，也就是台湾人民英勇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日本侵略者既不能凭一纸《马关条约》而安然割台，它也同样不能在占有台湾之后而安然治台。日本殖民者以屠杀的恐怖手段来统治台湾，台湾人民就以“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来进行反抗。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二十多年中，台湾各族人民武装起义有一百多次。英勇爱国的台湾各族人民给予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不仅使日本每年送掉不少侵略者的尸骨，还负担大量的“战费”，这又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加深了日本内部的阶级矛盾。在台湾各族人民无数次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武昌起义以前，比较著名的有一九〇一年的詹阿瑞起义和一九〇七年的蔡清琳起义。詹阿瑞是台湾著名的爱国者。他为了驱除日寇，收回台湾，长期隐蔽深山，联络各族抗日群众，坚持进行驱逐日

^①毛乃庸：《剑客丛撰》“赤嵌城”，见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一卷。

本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他经过一番准备，便于一九〇〇年传檄起义。檄文说：“……倭奴强横，侵占我国，鱼肉我民，羁我财产，置吾民于水火；陷我境于烂糜！极恶穷凶，于斯已甚！……还我疆土，吊民伐罪，保障台彭，救民脱苦，惟倭是征！大军过处，鸡犬不惊，有纪有律，号令严明，……令我全军士卒，协力前进，则家国重光，早救生灵”。^①文到之处，人心激动。高山族人民踊跃参加义军，并在一九〇一年三月同汉族人民一起奋勇搏击，曾攻克台中，击毙日寇军事头目，乘胜收复了丰原、东势等地。在激烈战斗中，詹阿瑞身中数弹，犹大声疾呼：“前进杀敌！”^②他牺牲后，余众退入深山，作长期斗争准备。这次起义虽受挫折，但由于台湾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强盗的殖民主义统治，使日寇在台湾“开拓番地”政策无法进行。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对于台湾人民的反抗恼羞成怒，从台北调集大批军队前来镇压，大肆烧毁村庄，残害汉族和高山族人民。台湾人民也针锋相对，以不断反抗来回答日本侵略者的凶暴横行。

詹阿瑞起义失败后，他的部下黄茂松，于是年四月又率残部起义，曾攻嘉义厅朴仔脚支厅，击毙日本办务署“署长”庄崎惣次郎，乘胜攻克嘉义。日寇纠集兵力大举反扑，义军在放弄山同日寇展开血战三昼夜，黄茂松等四十余人壮烈牺

①彭子明：《台湾近世史》第83页。

②施联朱：《台湾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光荣斗争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1—2期。

牲。这次起义众逾万人，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起义失败后，台湾各族人民群众被杀达万人以上。^①据日方文件公布，从一八九七年到一九〇二年的五年中，台湾抗日志士被捕八千零三十人，其中处死三千五百一十八人，处无期徒刑六百八十二人，处十年徒刑三百一十一人，处五年徒刑二百六十二人，处五年以下徒刑十三人，^②这当然也是打了折扣的。至于在战斗中死难者更不知有多少。但是，日本侵略者的屠杀政策并没有吓倒具有反侵略斗争传统的台湾高山族和汉族人民，为了回答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屠杀政策，台湾爱国志士经过总结，又组织人民继续开展斗争。武装起义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新竹厅北埔，有一个革命青年蔡清琳，平时向往朱一贵，怀抱“覆满兴汉”的愿望，对日本侵略者的凶暴横行，尤其愤慨。一九〇五年，蔡清琳成立“复中兴会”，自任总裁。并在台湾各地设立分会，积极宣传和组织革命力量，准备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使台湾重返祖国怀抱。一九〇七年十一月，蔡清琳宣传祖国大陆兵马来援，传檄全台，号召各族人民共起抗日。蔡清琳自率响应起义的大坪“隘勇”（日本侵略者组织把持山隘的兵士）及大隘社高山族人民猛袭鹅公髻日本警察分遣所，杀了日警及日本隘勇之后，继袭大坪日寇警察，杀了许多为非作恶的日寇，一直杀到北埔，包围北埔支厅，杀毙日警四十

①汤子炳：《台湾史纲》第179页；杨开渠译：《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之台湾》第220页。

②转引自王芸生：《台湾史话》第73—74页。

八人，获得全胜。大湖、中坜、大溪、竹东等地人民也响应起义，分别歼灭各地敌人。后来高山族人民还和汉族人民联合起来，并肩战斗，攻陷新竹城。新竹县辖下的地方遂为台湾人民控制。日本台北守备队得报，急调大军赶到北埔应援，蔡清琳率领汉、高山族人民武装英勇抗击，奋战至十一月底，给敌人沉重杀伤，打得日本侵略者手忙脚乱。终因弹粮俱绝，起义军不支，蔡清琳率余部冲出重围，退入深山，继续坚持抵抗，但不久也遭捕。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北埔临时法院将蔡清琳等九人判处死刑，九十七人处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但它是汉族和高山族人民联合的抗日起义，表明台湾各族同胞为反对共同的敌人，团结一致，并肩战斗的爱国主义深情，记下高山族和汉族人民为保卫台湾英勇战斗的动人史实，给后人留下深刻影响。

蔡清琳领导的北埔各族人民起义被镇压后，日寇进行搜捕持续半年，被残杀者达二千余人，被判处徒刑者达八百多名。日本侵略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暂时把北埔人民的起义镇压下去了，但它得到的不是胜利，而是全台湾各族人民更激烈的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了摆脱困境，制定了一整套“征服”行动计划。所谓“征服”，就是采用残暴的血腥屠杀手段来镇压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反抗。他的具体行动之一，就是用所谓“迫进隘勇线”和“讨伐番社”的办法妄图征服高山族人民。“迫进隘勇线”，就是配置守备关隘的兵士，不时推进“防番”的路线，屠杀高山族人民，蚕食高山

族人民的土地。“讨伐番社”，就是大举入侵高山族人民的村寨，疯狂屠杀高山族人民。罪恶滔天的日本殖民主义者，从一九〇一年以后发动“剿办”高山族人民的所谓“征服”行动，史书记载是很多的。例如，一九〇二年十月“剿办”马那番社，一九〇七年十二月进攻南投番社，一九〇九年十月“剿办”楷洛机思番社，一九一〇年五月大攻额济根番社，等等，都是日寇凶残“讨伐”、屠杀高山族人民的罪恶事件。但是高山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仍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地坚持抗日战争，不仅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还不断出击打乱侵略者的“讨伐”计划。例如，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台东七脚川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一九〇九年四月台东巴塆卫高山族人民暴动，一九一〇年高山族人民袭击卡孔溪驻在所，一九一一年袭击新竹厅合流分遣所，一九一四年杀阿缙厅枋寮支厅日本侵略者二十余人，等等。此外，加奥根、大鲁阁、马利柯昆、大芬都、基那基、北势、玛斯赫尔、果查博刚等社高山族人民一直进行了十多年的抗日武装斗争。高山族与汉族人民一起联合共同袭击日寇的事例不计其数。据日警务局调查报告供认，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中，重大的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就有九次之多。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①可见，高山族人民是永远征服不了的英雄人民。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爆发辛亥反清起义，并由此导至

^①转引自施联朱：《台湾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光荣斗争史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

了全国革命高潮，最后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台湾各族人民受到莫大鼓舞，增强了驱逐日寇收复台湾的勇气和信心。因而，各地人民纷纷起事。一九一二年三月，南投厅新寮庄民众领袖刘乾与庆兴人林启祯联合抗日，准备以庆祝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胜利的时机，召集南投、林杞埔一带民众举行起义，驱逐日寇。刘乾的动议得到林启祯为首的农民群众的响应，推举刘乾为起义领袖，积极筹募枪械，准备起义。后获悉敌人阴谋破坏，三月二十三日，刘乾即率领革命党人和武装农民百余人袭击日寇林杞埔支厅和顶林庄警察派出所，杀死日本警官多人，缴获敌人大批枪械和货物，起义军与赶来的日本侵略援军激战至月底，即退入深山，作长期斗争准备。这次起义失败后仅三个月，即一九一二年六月，又爆发了嘉义厅打猫地方雇农林朝和黄老钳二人为传播辛亥革命消息，响应祖国辛亥革命，而举行的土库庄起义。义军攻占土库庄后准备围攻嘉义，遭日寇疯狂镇压，林、黄被杀害，起义群众有二百余人英勇牺牲。^①土库庄各族民众为配合大陆辛亥革命而发动的武装起义被镇压后，台湾南投地方义民陈阿荣以“光复台湾”，驱逐日寇为号召，联合各地各族爱国抗日志士，密谋在辛亥革命周年时动员人民起来庆祝，同时发动起义。但因消息走漏，日寇调来军警把正在开会的数百各族人民逮捕下狱。^②陈阿荣等爱国者在狱中英勇不屈，义正词严地申述爱国主张，怒斥日寇的侵略暴行，表

①王芸生：《台湾史话》，第75页。

②彭子明：《台湾近世史》，第100页。

现了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

正值台湾各族人民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掀起抗日高潮时，同盟会员罗福星被派往台湾进行革命活动。

罗福星原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人，一九〇三年随祖父到台湾。幼时曾在日人学校读书，深深体会到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毒害，目睹日寇暴政，早就抱着抗日救国志向。其后，因不甘心日寇压迫，全家搬回广东原籍。一九〇六年在厦门参加了同盟会。曾奉广东省督学邱逢甲之命赴爪哇视察学务，后任爪哇中学校长。他响应革命党号召，归国应募为义勇军，参加一九一一年广州“三·二九”黄花岗之役，并光荣负伤。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被派到台湾组织革命斗争。罗福星到台湾后，择居新竹厅苗栗一堡牛桐庄。并以此作为据点到各地介绍大陆革命情形，宣传民族革命思想，联系爱国人士及民间会党，组织抗日力量，形势发展很快。新竹大甲、大湖地方的张火炉、台南李河齐、台东赖来、南投赖阿荣等，群相呼应，约期起事。以后，罗福星回到苗栗，开始组织抗日机关，并分派同志到南北两路开展组织活动，不到几个月，发展会员九万五千六百余人，另在大陆及南洋也接收会员三万多人。^①一九一三年三月，罗福星在苗栗召开大会，发表《大革命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暴虐统治的罪行，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响应辛亥革命，举行武装起义，“驱逐日寇，收复台湾”。罗福星的宣传受到台湾全省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影响很大，也引起

^①杨克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第68页。

了日寇的注意和惊恐。日寇为了防范这场即将爆发的革命，即在各地密布特务侦察，少数抗日志士和一部分革命党人和许多群众遭逮捕。随后又进行连续四个月的大搜捕。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罗福星弃家而逃，在淡水被捕。罗福星身藏党员名册，也被搜出，于是日寇按名单查捕，结果被捕者多达一千二百一十一人，判死刑者二百二十一人，判徒刑者二百八十五人。^①罗福星也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三日在台北监狱受绞刑而死。在就义以前，他以“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的英雄气概，写下《祝我民国词》和《绝命词》^②慷慨就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

罗福星虽然被杀害了，但继承罗烈士革命精神的抗日斗争仍在台湾继续爆发。

与罗福星在台湾发动革命的同时，苗栗县下罩兰人张火炉也在南湖、大湖等地发动各族民众起义。^③罗福星等革命党人被日寇破获后，张火炉和其他革命人士也被捕，先后英勇就义。辛亥革命时期，台湾同胞和祖国人民心心相应，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而英勇战斗。他们不仅用鲜血和头颅支持了大陆各族人民的反清、反帝斗争，而且用他们的顽强斗争保证了台湾与祖国，汉族与高山族，高山族与各兄弟民族的骨肉关系。

①王芸生：《台湾史话》，第76页。

②苏子衡、苏新：《辛亥革命后罗福星领导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95页。

③汤子炳：《台湾史纲》第180页；彭子明《台湾近世史》，第122页。

第 七 章

少数民族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与辛亥革命对少数民族的深远影响

一、少数民族人民在辛亥革命 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在当时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和影响下进行的，因而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人民在这一时期，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号召和影响下，不仅开展反清武装起义和各种斗争，在反帝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多数聚居我国边疆地区。他们不仅承受清朝专制政府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而且还要惨遭帝国主义的蹂躏和殖民主义的奴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在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人民对待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态度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派要坚决得多，勇敢得多。他们在边疆地区奋勇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武装进犯，粉碎了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西藏、新疆、内蒙、黑龙江等地的颠覆和分裂图谋，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从事精神侵略活动的罪恶行径，充

分表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觉性的革命运动。少数民族人民除了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有领导、有革命纲领和理论指导下的各种斗争外，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少数民族人民还在革命党人的号召或影响下，开展各种形式的自发斗争，有以会党为主要代表的城乡劳苦群众（包括农民、城市贫民和工人）的武装起义，也有抗捐、抗税、抢米、抢盐等各种群众性的自发斗争。这些斗争的形式虽有不同，但都是当时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发展的各族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和武装起义，推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更加注意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乃至武昌起义后的几个月里，东到江浙，西到新疆，北到松辽平原，南到两广，各族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给封建地主阶级很大打击。反动统治者在以各族人民为主力军的斗争面前，不是叫嚷“土匪乘势而起”，“‘不逞之徒’，攘臂蜂起”；就是惊号“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丧失了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信心。这说明，各族人民的斗争，对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辛亥革命不同于一般自发的造反运动。它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的变革，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的领导下，企图按照西方的榜样，改造中国，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反动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因而，孙中山从成立兴中会起，就非常重视武装斗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南方发动武装起义时，不仅注意发动少数民族人民参加反清斗争，而且还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爱国革命人士参加同盟会；并通过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同盟会的纲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号召他们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通过革命者旷日持久的革命宣传，不仅使相当多的少数民族群众逐步从奴隶和封建的精神枷锁中觉醒，而且还出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知识分子。他们组织人民进行武装斗争，通过“武器的批判”的巨大威力，不仅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打得乱七八糟，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稳定，而且还由于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思想的扩散，对于少数民族是一次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给后来的思想解放和革命运动以莫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这不仅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中国历史建立的丰功伟绩，也是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这场革命，我们不但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历史的地位和充分的估价，而且也应该遵循同样的

原则，给少数民族人民以历史地位和适当的估价。通过上面
对少数民族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事的叙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数民族人民对辛亥革命是有贡献的，
他们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抹杀不了的。

（一）各族人民通过共同斗争，更加加深了革命情谊，
巩固和发展了民族间的团结、友好关系。

各族人民群众热烈响应革命党人的号召，积极参加辛亥革命，
表明我国各族劳苦大众处在共同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一起承受着
残酷的封建剥削，同样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因而结成了同呼吸、
共命运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民族关系的变化。
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共同斗争，
不仅取得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而且经过战斗的洗礼，各族人民结下了
更加深厚的革命情谊。各族人民通过共同的斗争，不仅进一步促进了
各民族的联合和团结，而且也加速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加激发了
各族人民爱国革命思想的发扬。

在辛亥革命时期，不仅汉族出现了象孙中山这样主张民族团结和
共同联合革命的伟大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少数民族里面也出现了不少
主张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战斗的生动事例。例如，在东北，汉军旗人
张榕和满族革命者宝昆等人，都号召满人要 and 汉人一起革命，明确
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满汉共和政体”的革命主张。在内蒙古，
最先到呼包地区工作的同盟会员汉族王建屏，不仅在汉族中宣传革命，
在蒙古族青年中也进行了许多工作，“萨拉齐蒙古少壮派的人，

都是他的朋友。”^①同盟会员蒙古族云亨、经权等人都积极主张“蒙汉化除私见”，共同革命，一起反清。所以，在内蒙古赞同革命的不仅有汉族、蒙古族，而且还有回族，甚至还有满族人士也赞同革命。在新疆，以刘先俊、杨赞绪、冯特民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新疆创办报纸宣传民族团结，鼓吹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五族共和”，还深入下层发动各族人民团结斗争。因而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伊犁、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各地组织的反清起义，都是各民族共同参加的。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地区不仅有回、彝、苗、壮、傣等族革命者参加同盟会，还有许多民族参加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斗争。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群众团结战斗，共同反清，有利于克服明末清初以来，会党和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鼓吹汉民族反对满族的种族主义情绪；促进了新的民族关系的发展，为各民族的正常交往和共同发展奠下基础。

（二）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

各族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奋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的封建压迫，在各民族地区打击敌人。这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切齿愤慨，也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造成高涨的革命形势，并堵绝清朝皇帝东归和西逃的去路，为推翻清政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巴靖远、刘映元、李秉智：《包萨革命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255页。

（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大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①随着辛亥革命时期国家要独立，民族要平等，人民要民主精神的广泛传播，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各族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的革命热潮。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通过办报刊，编译书籍，建立自己的思想阵地。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他们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社会情况、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哲学、文学等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去反对中国的封建集权专制主义和其他封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并根据民族独立的国家学说去改造中国，以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这种新学（或者说西学）的传播，在少数民族中发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国家“独立”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对于长期遭受封建主义，甚至奴隶主义思想束缚的少数民族人民，确是极大的鼓舞。所以，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宣传，不但能够动员各族人民起来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的命，而且也加速了各族人民的思想觉醒，对各民族的发展，发生深远的影响。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89页

二、辛亥革命对满族历史所发生的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各族人民赶跑封建皇帝，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且对中国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发生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同志在谈到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时说过：随着清朝封建统治的倒台和中国封建君主制度的结束，“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①董必武同志说：“这一胜利，对于推动中国广大人民的觉醒，对于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再也不可能从新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不能不日益向着广泛和深刻的方向发展。”^②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不仅对汉族是这样，对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满族也没有例外。

过去有一些中外学者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把辛亥革命说成是满族人民的“灾难”。这是绝对不能令人信服的。

①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万人集会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开会词》，196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②《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付主席董必武的讲话》，195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

因为这种论调，不仅与历史事实相悖，跟满族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也相反。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能为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所迷惑。表面上看，随着清政府的倒台，满族所享受的特殊照顾取消了，暂时地给满族人民的生计带来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不必讳言。但是，从本质上看，辛亥革命推动了满族历史的前进，对于满族社会的发展发生深远影响。

首先，扩大了满族劳动队伍，促进了满族社会的深刻变化。

清朝政府不仅残暴地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对满族人民的阶级压迫和统治也是极端腐败和残酷的。八旗制度和各种规定，束缚着满族人民和满族社会的发展。危害最大的是不让驻防各地的满人参加生产劳动。对此，满族人民深恶痛绝。他们蔑视清朝的反动规定，参加生产劳动，但终未能冲破羁绊。

辛亥革命冲毁了满族贵族二百多年来确立的一套奴役本族人民的八旗制度。随着旧制度的废除，使旗人得以参加正常的劳动生产，开始了新的生活。例如，辛亥革命后，广州旗兵改为粤城军，三个月后解散，每人发给十元毫洋，停发八旗钱粮，广大的满族人民自此之后，依靠从事各种劳动谋生。新疆，革命后解散旗营时，每人发银十两，或分给土地，“化兵为农”。奇台县城的满人被遣送到该县西北开荒种地；伊犁的满人大部分安排到伊宁县二区苏拉宫乡务农，小部分在伊宁城从事各种职业。甘肃，一九一四年撤消旗营时，便停发粮饷，武威、永登在同年三月成立“处理满人工

作”的“善后局”，给每个旗兵发银四十两，作为“生计银子”，让旗兵去参加生产劳动。四川省成都阖城旗族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分之一、二。不能自立者，均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或做小商贩，以谋补“衣食艰难”。宁夏，革命后余下满人五百余户，一九一四年解散旗营时，除少数孤寡酌予救济外，其中绝大部分送到湛恩渠附近开荒种地，小部分学习手艺或制售食品为业。在北京，辛亥革命后旗下兵丁和闲散，大部分都是做各种小工，如泥水匠、纸糊匠等，年轻一代还有不少人到工厂当工人，成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满族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人民，大多数本来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由于八旗军差干扰，使北京及驻防各地的满人中也有一些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人。这不是满族人民不爱劳动，而是清朝对满族实行的罪恶制度造成的。革命后，随着八旗制度的崩溃，驻防满人便摆脱满族贵族的控制，并随着旧制度的废除，从前清朝对他们的限制，一律取消，各州县满族“听其自由入籍”。^①这就为原驻防各地的满人参加劳动生产创造了条件，使那些原来过着兵丁生活的满人逐步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仅改变了满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一改过去人们对满人“不工、不农、不士、不贾”的评品，对满族的进步和发展产生深远的有益的影响。

其次，根除了满族农奴制生产关系的残余，促进了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①《宣统政纪》卷70。

清初，满族贵族为了扩大剥削范围和保证兵源，在畿辅和东北大建皇室庄田（官庄）。那是清皇室私产。官庄土地主要是掠夺、圈占汉人土地或强迫“百姓带地投充”得来，由庄头对庄丁实行残酷的农奴制剥削。庄丁世代充当皇家奴仆，严禁逃亡与冒入民籍，不许应试为官。庄丁由庄头量给口粮、衣服、耕牛、种子、房屋和器皿等，庄丁自己几乎一无所有，却要担负沉重的贡赋，除交租粮、差粮外，尚有许多额外负担。皇室严禁庄丁拖欠钱粮，“欠一分鞭六十，欠三分鞭一百，欠四分、五分，枷号两月，鞭四十。”^①少交者，亦“照章责打”。皇室可以任意赏赐庄丁给官吏。庄丁的婚姻也受严格限制。可见，庄丁一方面领种土地，有自己独立的经济，遭受沉重的租役剥削；另一方面，人身极不自由，实为皇室农奴。庄丁终年辛劳而每不免于“坐受饥寒之苦。”^②

十八世纪初，不堪残酷剥削的庄丁进行反抗斗争，迫使统治者准许他们“出外谋生”，“载入民籍”，使大批处于农奴、奴仆地位的庄丁摆脱农奴制的枷锁，成为“良民”。从此官庄主要是由庄头招民佃种。封建的租佃关系代替了农奴制。清末，官庄农奴制剥削方式所占比重已经很小，但农奴制残余依然存在。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不根除，作为满族劳动人民主体一部分的“奴仆”不彻底解放出来，就严重阻碍着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辛亥革命后，畿辅和东北的官

①雍正《大清会典》卷232。

②中央档案馆：《乾隆十年内务府会计司三旗两庄头处呈稿》。

庄、王公的亲丁、庄丁激烈地掀起反抗封建依附关系和剥削关系的斗争，他们“藐视王公”^①，径自入籍州县。这样经长期斗争，终于彻底摧垮农奴制的残余。所以，辛亥革命后随着庄田制的取消，种地的庄丁即摆脱奴仆身分。满族经济基础发生的这些变化，对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再次，摧毁了清朝满族贵族隔离民族关系的藩篱，加强了满、汉各族人民的团结。

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对满族实行一些不利团结的特殊政策。政治上，满族在政府中占有特殊地位；经济上，任意圈占汉人土地，给满人“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占田多至数百顷”。^②至道光年间，还在近京五百里内圈占土地，把满人“移居在屯，自行耕种。”^③并给八旗兵丁规定粮饷制度。顺治元年（1644）规定“八旗前锋、护军、领催、甲兵，每名月给饷银二两。匠役每名月给饷银一两。”^④康熙九年（1670）“前锋、护军、领催、月给饷银四两。甲兵月给饷银三两。”康熙二十四年（1685）“马兵每岁给饷米四十六斛。”^⑤此外，旗兵出征另有行粮。应该说粮饷尚可维持家用。清末，虽因“生齿日繁”、“食饷有限”，但这种

①东北档案馆：《奉天公署档》第9415号。

②《清世祖实录》卷127。

③《清宣宗实录》卷21。

④《定例全编》卷14。

⑤《八旗通志》卷29。

制度仍未取消。在法律上，满人有特定的诉讼衙门、关押监狱和换刑办法。这是满族贵族要满人“巩固本根，未便远离”^①而制定的。法律规定“凡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能、议勤、议贵、议贤、议宾）者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行奏请，议定奏闻，取自上裁。”^②法律对许多满人其实没有什么约束力。此外，清政府还实行封禁政策，强迫旗、民分居分治，不通婚，不交产，划分地界，限制汉人出关，等等。这种人为的生活差异和民族间的不平等，造成民族间的某些隔阂和歧视，对民族团结很不利。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政府的垮台，取消了满族的某些特殊待遇，并在《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明确规定：满、蒙、回、藏“与汉人平等”。^③这就摧毁了清朝满族贵族所设置的隔离民族关系的藩篱，加强了兄弟民族的团结，为各族人民共同革命奠下思想基础。

此外，通过辛亥革命的共同斗争使满族人民初步认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各族人民一致的革命要求，更加激发了满族人民革命精神的发扬。

总之，辛亥革命决非满族人民的“灾难”，而是大好事。辛亥革命后，满、汉各族人民同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为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各族人民又继续团结战

①《清史稿》刑法志二。

②《大清律例集解》卷1。

③《宣统政纪》卷70。

斗，这就进一步把各族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各族人民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使满族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革命后满族不是“衰落”了，而是向前发展了。所谓“灾难”、“没落”之说，纯属别有用心的荒诞无稽之谈，跟历史事实丝毫没有相同之处。

三、辛亥革命失败后各族人民的

新灾难和继续奋斗

一九一二年三月，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

袁世凯刚刚上台，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就断言，中国一定要发生封建复辟，而这种复辟活动，很可能由袁世凯来扮演。他说：“看来皇帝一定要把封建地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①后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列宁的论断。

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为了摧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军阀的武力，一上台便和保皇党分子梁启超和前清的一些孽子孤臣互相勾结，相互利用，公开提倡复辟帝制。他大刀阔斧地向共和制发起进攻，毁约法、杀民党、散议会、停自治，自任

^①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

终身总统，自揽“传贤传子，悉由总统决定”的权力，实际上成了封建世袭皇帝。为了投靠帝国主义，争取靠山，当儿皇帝，他还丧心病狂地拍卖国家主权，牺牲民族利益，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卖国贼。他们与各民族地区的军阀、头人、恶霸、僧侣上层相互勾结，串通一气，仗势欺人，大搞阶级报复，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

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京政府，在实行阶级压迫的同时，又变本加厉地继承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穷凶极恶地摧残和迫害少数民族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对满族。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根本不承认满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胡说是什—么“宗族”，对满族实行歧视政策。居住在北京和关内驻防城市的八旗人丁，在辛亥革命后，解散了八旗兵，取消驻防制度，结束了清朝满族贵族八旗制度对满族人民的束缚，这本是好事。可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对各地的满族上层如官僚、贵族给与安排、照顾，但对广大的满族劳动人民则不加处置，造成他们衣食艰难。有些地方的反动派还凶恶地迫害满族人民，制造新的民族矛盾和隔阂。不少满族人民为免遭迫害，隐名匿姓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广大满、汉杂居地区，由于满汉族人民共同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建立了良好关系，满、汉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但是，人民之间的友好，无法改变盘踞各地的大小军阀，不顾人民死活，摧残虐待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动政策。因而，各族人民积怨很深，反抗也就不断。

对蒙古族也是如此。袁世凯政府极力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将内蒙古分为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特区，盘踞在内蒙古的军阀、官僚不仅大肆挑动满、蒙、汉民族关系，而且对蒙族人民动辄捕杀。为了防止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反抗，袁世凯北京政府还采用高官厚禄的办法来收买蒙古族封建王公，使之为其效忠卖命，维系其对蒙古族人民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不仅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蒙古族封建贵族压迫蒙古人民群众的制度，而且还颁布《蒙古王公待遇条件》，规定：（一）各蒙王公原有之统治权，一律照旧；（二）蒙古汗、王公、台吉的世袭爵位名号，照旧承袭，其所享有之特权，亦照旧保存；（三）蒙古各地呼图克图（活佛）、喇嘛等原有封号，概仍其旧；（四）蒙古王公世袭俸饷，应从优支給，等等。以上四条都是为巩固蒙古僧俗封建主的特权而设，实际上是宣布蒙古族王公、贵族、僧侣上层有对蒙古族人民进行压迫、剥削、奴役的特权。

袁世凯通过上述反动措施，便在内蒙古形成军阀与蒙古族反动上层结合统治各族人民的专制制度。他们上下勾结，串通一气，恣意横行，拼命侵夺农、牧民的土地，勒索人民的钱财，抢夺人民的牛、羊、马匹。专门从事买卖土地的商人和豪绅、地主又恃强豪夺蒙汉各族人民的耕地和牧场，迫使各族农、牧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在新疆。一九一二年六月宣布共和，清王朝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结束了。清朝巡抚袁大化去职。封建官僚杨增新被荐为新疆都督。所以，新疆的所谓“五族共和”空有其名，而

无其实。因为革命后新疆政权仍然掌握在保皇自由派与旧官僚军阀手上。

杨增新充任新疆都督后,接受袁世凯的密令,立即着手清除新疆的革命党人。首先将伊犁起义的领导者分散到全疆各地,调杨赞绪(同盟会员)任喀什提督;继而将伊犁起义的领导人冯特民、李辅黄等秘密杀害。不久,新疆的革命党人便被彻底肃清。伊犁的起义成果化为乌有。^①

杨增新封建军阀政府还承袭了清朝的一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用“以夷制夷”的罪恶手段来分化、瓦解和压制少数民族的反抗,并挑起汉族与新疆少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与另一个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破坏和削弱民族间的团结。

杨增新将他的民族压迫政策具体为“牵制主义”与“怀柔政策”。

“牵制主义”,即所谓“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缠”牵制汉人,即以汉人牵制回缠,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从而“使各省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②“怀柔政策”,即以封官许爵的办法来收买、笼络少数民族封建上层,使各族封建主成为杨增新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忠实奴仆。

杨增新上台后,为巩固其统治,对各族封建头人及地方官吏采取纵容态度。但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则变本加厉。赋

^①参考少数民族史志丛书《维吾尔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第79页。

^②杨增新:《补过斋文牍》;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16页。

税繁多，各级官吏的任意盘剥有增无已。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六年的五年中，新疆各族人民交纳的赋税总额增长将近三倍。一九一三年新疆田赋收入五十五万两，一九一六年增至一百八十万两，较三年前骤增一倍多，且为近年所不及，因疑此数恐未准确。^①但从这个不确数目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后新疆各族人民的赋税负担是逐年骤增的。此外，封建官吏和各族封建主对劳动人民的勒索、榨取也空前严重。例如，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在一九一三年一次便向哈萨克族派收骆驼三千峰，马三千匹，牛五百头，羊一千只，以当时的价格计算，共达银三十五万五千两。^②柯尔克孜族牧民所放羊只，每年每只也要交税款红钱八文。对维吾尔族人民的搜刮也极其苛刻。以至杨增新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那些以榨取劳动人民为目的的封建官吏“一旦得官，即以‘缠’回为鱼肉，横敛为全国所无，第得署一优缺，无不满载而归。”而各族封建统治者又利用征税的机会加倍勒索，本来所收的实际经费只不过十分之一，而绅约之滥派则十分之九。^③各族人民在封建军阀政府和本民族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下，处境十分困难。

在西藏。辛亥革命后一小撮藏族亲英反动上层，在英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挑唆下，以极端野蛮的报复手段对坚持反帝反清的爱国藏族僧侣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和屠杀。他们竭力煽动满藏、藏汉民族之间的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

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28页。

②、③杨增新：《补过斋文牍》。

统一。

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及各地的大小军阀，民族反动上层，对所谓“五族共和”中的满、蒙、回、藏少数民族竟然采取如此反动的压迫、歧视政策，可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和“五族平等”主张，在军阀官僚统治时期，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他们实行的一直是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统治。“五族共和”已经成为他们用以骗人的口号。对其他少数民族就连这个空洞的口号也没有。例如对回族。回族人民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以宁夏、甘肃、河南、河北、青海、山东、云南、安徽、新疆、辽宁等省（区）分布较多，其中大部分居住农村，小部分居住城镇。因为孙中山所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回族，指的是新疆（又叫回疆）的维吾尔族。所以，回回族连一个空洞的“平等”口号也沾不上边。

袁世凯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根本就不承认“回回族”是一个民族，他们把回族叫做什么“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北洋军阀政府不仅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就连“回回”人自己称为民族也被禁止。如一九一二年回族人士要创办一个团体，呈报备案，当时的内政部长却批作“中国回教联合会”，而不能称为“回民联合会。”北洋军阀政府，一方面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另一方面却又采取对付异族的手段，对回族人民实行民族歧视和政治迫害。他们实行“以回制回”反动政策，利用回族的反动上层作为鹰犬来欺压本族人民。辛亥革命后，回族上层马安良、马福祥

等取得了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的部分军权和政权。他们长期统治西北，成为西北回族人民和各族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为了维护其反动透顶的统治，不惜采取种种手段，挑起回族与汉族的不和。为了便于统治，又在回族内部挑动教派斗争，使回族人民自相残杀。

在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军阀和立宪派掌握政权，各民族的地主阶级、土司、头人和军阀便勾结在一起，通过制造民族隔阂来分裂民族团结，发泄对革命人民的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又施行“以夷治夷”的民族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和经济掠夺。

由上述可知，各族人民虽然流血牺牲，赶跑了封建皇帝，但革命后，各族人民所得到的不是民主、自由和幸福，而是痛苦、失望和灾难。辛亥革命是失败了。各族人民继续受苦受难。出路何在？是忍辱负重，甘当奴隶，还是奋起反抗，继续战斗？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各族人民，在这新的形势面前，选择了用武器进行再批判，用战斗去寻找新的解放的道路。

东北地区。满族人民通过辛亥革命摆脱了八旗兵役的牵累与汉族人民一样积极地进行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发展了生产。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掠夺也比前沉重。有增无已的地租、捐税，使满族农民的苦难更深。他们感到只有斗争才能指望摆脱受苦受难的地位。为此，一九一五年奉天省海城县四方台，爆发满族佃户“持枪阻丈”，要求减低地价的斗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阿城县满、汉各族人民

三千余人，团结战斗，杀向县城，抗议增加田赋，愤怒的革命群众“痛打农务会头子，捣毁了清丈局牌匾、屋宇、器皿、击伤数人，击毙一人。”^①锦县牛家屯等地反抗清丈旗地的斗争也“声势汹汹”，“势焰不可响迓。”^②此外，法库等十一县佃民，自清丈局丈放内务府官庄以来，也与庄头涉讼，控告到高等审判厅，共有三十八起^③。正由于各县满、汉族“佃民煽惑阻扰”，使清丈局丈放八旗地亩、勒索地价的行为“几乎无从入手。”^④

辛亥革命后，吉林省沿边地区的地方官吏，与封建豪绅相互勾结，对朝鲜族人民敲榨勒索，残酷摧残。例如，和龙县豪绅陈天障与县知事杨培祖狼狈为奸，巧立名目，肆意剥削人民，引起朝鲜族人民的公愤。他们选派代表到延吉审判厅控告。检查厅不仅拒绝了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而且还把群众代表监禁起来。这就更加激起朝鲜族人民的强烈愤慨，掀起群众性的大规模斗争。坚持了一年多，最后不仅迫使官府释放了群众代表，陈天障和杨培祖也被迫逃离县境。人民群众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一九一三年八月初，局子街（今延吉市）附近祥发源一带的群众又掀起反抗朝鲜族恶霸分子横征暴敛、勒索民财的斗争。这场斗争由祥发源的朝鲜族人民发起，得到延吉、和龙、汪清等各县朝鲜族人民的热烈支持。他

①《盛京时报》，民国四年（191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②《盛京时报》，民国五年（1916年）五月二十五日。

③《盛京时报》，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二十八日。

④民国五年（1916年）《奉天公报》，第1651号。

们包围了延吉道尹公署六、七天，要求道尹亲自出面谈判。道尹陶彬吓得不敢露面，被迫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为了反抗北洋军阀政府在东北地区丈放土地，增设垦务机构，任意勒索。一九一二年，昭乌达盟东西扎鲁特两旗人民在土门杰尔嘎喇领导下，设伏杀死垦务局人员，攻占了开鲁城，驱逐北洋军阀派去的地方官，并打死了高利贷商人。这一斗争的浪潮波及邻近的旗县和锡林郭勒盟东部。袁世凯调动东三省军队合力“围剿”，起义者与官军进行英勇战斗，坚持一年多。与此同时，昭乌达盟昭格庙一带也爆发了人民起义，杀死西扎鲁特和东扎鲁特福晋等人。^①一九一四年冬，辽宁省朝阳、绥东、建平等县蒙、汉族人民也掀起抗捐税斗争。

在北部蒙古族地区。反抗袁世凯反动专制统治和大小军阀勒索的斗争也蓬勃兴起。

辛亥革命后，老同盟会员蒙族经权、云亨和汉族王定圻等人在内蒙萨拉齐、归绥等地坚持反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曾到北京、上海等地会见孙中山、黄兴等人，表现了不屈不挠、英勇献身的精神。

一九一二年，内蒙古后套地区蒙古族厂汉卜罗领导的“独贵龙”武装队伍，与掠夺蒙古族人民耕地、牧场和牲畜的军阀、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展开激烈斗争。他们夺回了不少耕地、牧场，震撼了北洋军阀在这一带的统治。一九一三年

^①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等126页。

七月，宁夏总兵马福祥诱捕了“独贵龙”运动的领导者广汉卜罗等人，关在太原监狱，用酷刑折磨他们。但他们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直至最后英勇牺牲。一九一四年达拉特旗又爆发由梅林阿尧尔扎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反对该旗王公，斗争坚持了三年之久，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军阀统治。

此外，乌审旗蒙古族人民在锡尼喇嘛（乌勒吉吉尔格勒）的领导下，以六十个安答（盟兄弟）为核心，在全旗组织了十一个“独贵龙”，反对旗扎萨克察克都尔色楞残酷统治。一九一五年“独贵龙”，赶跑了察克都尔色楞，控制了全旗大权，摧毁了北洋军阀和蒙古族王公对该旗的统治。

在西北的新疆。辛亥革命后，维吾尔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反对杨增新统治的斗争，遍于全疆各地。各族人民参加的哥老会迅速发展，在南疆的焉耆、阿克苏、库车、轮台、喀什、和田等地，击杀反动官吏，打击官僚军阀和封建豪绅地主。在北疆，锡伯族人民群众反对锡伯营内部官僚集团苛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兴起。如一九一三年察布查尔农民柯克色春等人，要求撤换佐领巴哈春，锡伯族农民闯进旗下档房，把牛录地亩册子拿了出来，将公地分给群众。总管派兵前来镇压，逮捕了柯克色春等人，更加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农民桂信又把锡伯族人民组织起来，反抗五牛录佐领达哈春，他们闯进佐领档房教训贪官污吏，解救出被捕群众。八牛录锡伯族农民对佐领伊尔格春，恨入骨髓。他们关闭城门，将他和防御、骁骑校等痛打一顿，并把档房印章夺取过来，由农民自己管理。这次斗争虽然最后被总管法里山率领披甲兵丁

所镇压，但也打击了封建势力，激发了锡伯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①

在西南。云南各族人民除了积极参加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直接组织领导下，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云南护国之役”外，各族人民反对土司残酷压榨的斗争也接连不断。例如，一九一三年大勐笼沿边傣族人民因不堪土司的残酷压榨，掀起反抗土司斗争，驱逐了土司的代理人士弁叭目。曼竜揽寨的土司叭被附近几个寨子的农民杀死。傣族农民岩宰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经常打击土司，给封建统治者造成威胁。他们的声威震动了整个西双版纳，并迫使一些地方的封建领主减轻官租。

云南武定地区的彝、傈僳等各族人民群众，从一九一二年起反土司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他们要求废除土司特权和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

在东南沿海的畲、黎族人民，辛亥革命后也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样，掀起反军阀统治的斗争。一九一五年浙江省景宁县地方当局向人民征收苛重的酒税及其他杂捐。人民每每拖欠抗交，当局便派出巡丁挨户搜查，如发现家有藏酒，则加罚税款三倍。

这引起畲族农民的极端不满，起而痛殴税员，并联合附近汉族农民共三千多人，攻打县城，捣毁了县烟酒稽征厅。

辛亥革命后，海南岛成为军阀混战和争夺的场所。在军

^①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第28页。

军阀统治下，海南岛成了黑暗地狱，政治腐败，卖官鬻爵风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各族人民痛苦不堪。军阀又经常以“剿匪”为名，纵容兵痞到黎族地区奸淫掳掠，栽赃加祸，诬良为匪，无恶不作。黎族人民不仅自发地起来抗击军阀的劫掠骚扰，同时还积极参加革命者领导的讨袁和反对军阀龙济光的斗争。一九一四年二月，万宁县兴隆地区的黎族农民武装四千多人，参加了讨袁军，曾先后攻破由袁世凯爪牙盘踞的万宁和陵水两县城。随后在白沙县牙叉地区，黎族人民也多次拿起武装伏击龙济光匪兵的骚扰。同时，陵水县的黎族农民也武装起来，把勾结龙济光的“总管”王义（即王维昌）杀掉，并参加了当时民军反龙济光的斗争，使民军活动的范围一直扩大到五指山中心地区附近的番阳峒（今属乐东县），严重地打击了反动军阀统治，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可见，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通过这次革命大大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却依然在各族人民中发扬光大。当着袁世凯疯狂复辟帝制，造成军阀混战、生民涂炭的时候，各族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前仆后继地投入反袁和打击地方军阀、官僚、土司、头人的英勇斗争。每一次斗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民族社会向前发展，为民族和国家作出贡献。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原因，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每次都被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了，最后归于失败。但是，各族人民总是不屈不挠，在斗争中苦心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开展新的革命斗争，永远前进！

结 语

写到这里，应该对这一本小书作一结束了。

《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一书，前面一共写了七章和一个绪论。绪论写的是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个伟大的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概况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撰写这本小书和企图达到的目的。通过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概况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族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中国的历史不仅是汉族的历史，同时也是全国所有民族共同的历史。正由于全国各族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利益、民族前途，所以他们有一致的政治命运。因此，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兄弟，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同战斗，共同发展的。第一章写的是少数民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的客观和主观的直接原因。二十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公开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加紧对各族人民的搜刮盘剥；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造成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加深了少数民族的苦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各民族一切爱国人士都在开展爱国救亡运动。我们通过对这些情况作梗概的阐述，是要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出自于反对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爱国主义

深情。第二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少数民族人民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情况。第七章写的是少数民族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辛亥革命对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要说明这场革命对满族历史所起的积极作用。辛亥革命最后是失败了。但各族人民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以坚毅不拔的精神继续奋斗，探索新的解放道路。此外，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少数民族开展反对本民族反动上层压迫和奴役的斗争，在有关章节中曾有所涉及，就不另外写成专章了。

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少数民族是中国的兄弟民族。这一个事实和真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散布的中国少数民族“不与中国同”的“民族外敌”分裂论调，是注定要失败的。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严重地打击了以清朝统治者为首的各族反动统治阶级，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与汉族人民一起共同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封建帝制，也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进犯，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分裂、颠覆阴谋，表现出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斗争的伟大气魄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本书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当时汉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互相配合、互相支援，这反映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促进了汉族人民与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促进了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从全书，我们还看到，二十世纪初，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跟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民主革命宣传对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而汉族与少数民族人民蓬勃兴起的自发斗争，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迅速觉醒和组合又起了促进作用。同盟会成立后，少数民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三种形式：（一）参加革命党人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武装斗争；（二）参加以汉族为主体的反抗斗争；（三）在汉族地区革命斗争影响下，自发兴起的反抗斗争。各少数民族人民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各有不同，所起的作用也有大小，但都属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范畴，对革命都作出过贡献。

从全书，我们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对于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重视的，并曾派革命党人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组织工作，表现了有自觉地担当起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领导核心的决心和行动。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认识和处理中国民族问题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的存在又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其表现是：

第一，看不到各族人民，特别是各族农民这个“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伟大力量，不敢始终相信和依靠各族人民。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任何一次大的革命斗争都离不

开民族问题。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首先是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下解放整个中华民族和挽救国家的问题。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清除“家贼”，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赖以生存的走狗清政府。所以，作为领导阶级，如何调动各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团结各族人民来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任务就是当时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其走狗封建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实质上是人民群众的民族解放运动，即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领导这些革命运动的或者是农民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但革命的主体力量则始终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中华各族人民通过生死与共的革命斗争，用鲜血换来了社会的发展，各族人民的血肉联系也在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巩固了。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而留下的民族间的隔阂、猜疑，却不是做几件事就能彻底消除的。辛亥革命前，由于清朝推行一民族“宰制于上”的民族压迫政策，中国境内仍然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民族问题，就是能否更好发动和调动各族人民革命积极性的关键所在。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86页。

上面说过，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内民族问题是重视的，但孙中山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的民族观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刻揭示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也不可能深刻认识民族问题在革命中的突出地位。因此，在宣传和组织革命时，虽然提出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革命纲领和“反满”口号，并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注意发动少数民族支持革命。武昌起义后，又提出了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主张，这无疑都表明孙中山比起他的前辈和同辈来思想境界高得多。他的上述作法，无疑也都是进步的、革命的。但可惜，在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党则始终未能提出一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实施办法。至于其他革命者比起孙中山来，在民族问题上就差多了。他们看不到农民这个“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需要力量时就去暂时借用农民的力量，但从来没有给各族农民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历史证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①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惧怕群众革命的大发动，在革命中没有依靠广大人民，只限于在各民族社会中的上层进行活动。例如，在

^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7页。

贵州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还错误地认为贞丰、安顺等地人民支持革命的行动，是“夷人蠢动”，并率师“安抚”。^①这样错误地对待各族人民群众的行为，越来越使自己孤立起来，当敌人猖狂反扑时，就显得软弱无力。

由于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把革命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城市团结学生，发动新军和部分开明士绅，在一定时期造成革命声势，形成革命力量的优势，秩序井然地进行革命。这就使这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束手束脚，规模不大，地域性、分散性明显，未能形成一股较强的力量，因而对封建主义势力的打击不力。这正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片面性，在民族问题上的一种表现。

第二，不懂得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表现了对各族反动封建上层的妥协性。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统治，而是满族封建贵族勾结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反动上层对各族人民的地主阶级专政。反清不仅是反对满族封建贵族，而且也要反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所以，辛亥革命只把主要锋芒针对满族贵族统治，这不仅放跑了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而且也没有把汉族军阀、官僚、豪绅、

^①周春元：《辛亥革命时期贵州两党之争》，《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第561页。

^②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地主和少数民族的反动土司、官家、头人作为革命对象，而是把这些人当作可能的同盟者来争取，表现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性。正由于存在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派对清朝统治者与各族反动派相互勾结压迫各族人民的反动本质认识模糊，在少数民族人民打击清朝地方官吏的时候，革命的领导者未能领导少数民族人民给本民族的反动上层来一个根本性打击，反而对地主阶级和少数民族的封建头人加以保护，有的还让其参与各级政权。这样就无法调动各族劳动人民这个革命的主力军去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人为地把自己摆在孤立地位，当然不可能获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因此，“资产阶级期望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是半途而废，是半自由，是跟旧政权和地主勾结起来。”^①而各族人民在革命后所得到的的是失望，是新的灾难。

第三，在革命进行的始终，都未能提出各民族团结的革命口号，未能把分散的斗争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

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在全国各民族地区从不同的方面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成为辛亥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由于革命党人提不出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口号，这就未能把各族人民的斗争结成统一整体，而基本上是孤立进行。这就局限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为阶级敌人各个击破提供了可能。这是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的反

^①列宁：《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列宁全集》第12卷，320页。

抗斗争即起即灭的一个原因。这不仅损害了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挫伤了革命热情，而且也是辛亥革命未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原因之一。

问题当然不在于领导革命的革命党人有没有发表民族团结、互相支援的宣言和声明，重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懂得只有“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融合”，^①才能夺取革命胜利和巩固胜利成果，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辛亥革命中，民族之间的团结问题始终未能为革命党人普遍重视，需要你就利用，不需要就漠不关心。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好说明，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阶级的局限性。因为资产阶级仍然是剥削阶级，所以为保护其本阶级的私利，它们不可能对于弱小的民族给与真正平等的权利。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宣扬的“民族平等”，虽然对于长期遭受奴隶制或封建制压迫的各族人民是一大鼓舞，在思想意识上是空前突破，但实际上，它只是纸上空文，根本不准备也不可能实现。因此，各族人民也不能指望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

第四，只反国内民族压迫，不敢正面领导各族人民反对外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

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造成中国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和陈天华等革命者是深有觉察和认真揭露过的。但一般说来，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度比

^①列宁：《关于民族政策问题》，《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7页。

起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态度来则软弱得多。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少数民族人民出于“保家卫国”的精神，总是奋起反抗，掀起股股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造成很好的反帝斗争形势。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抱着幻想和畏怯心理，反清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就是不敢触动其洋主子，坚持所谓“文明革命”，“秩序革命”，把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视作“自然的暴动”，从来不敢提出彻底反帝的战斗纲领和口号，生怕激怒帝国主义，招致干涉和瓜分的严重后果。因而，对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不仅不敢领导，有些地方的革命党人还把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视作革命的同情者，错误地相信了“洋大人”。比如，在归绥，革命军进入包头后严禁士兵侵犯“洋教堂”反映了他们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错误认识。特别是还规定了“凡是清朝的军官投诚，每人发给五百两安家银子，眷属不便随军的托教会的外国人给保护”。^①把中国人的眷属交给外国侵略教会“保护”，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敌为友的表现。这种只反国内民族压迫，不敢正面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结果，不仅反封建不彻底，而且还为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绞杀革命提供了可能。

正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对待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存在上述弱点，所以它不能也没有把各族人民广泛动员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横扫封建势力，而只能是在强大的阶级敌人面前软弱怯步，不敢进击，这就决定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①巴靖远等：《包萨革命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262页。

列宁说：“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要坚决地给予支持的”^①。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压迫是不可能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②，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所以，“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③。

①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23页。

②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6页。

③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3页。

后 记

《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一书，是我在一九七六年应邀为章开沅、林增平同志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撰写有关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参与辛亥革命运动的书稿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詹承绪同志，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杜玉亭、孙代兴同志，云南大学尤中同志先后为我提供了一些资料和线索。此外，还参考和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学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本书初稿写成后，曾蒙河南省历史研究所王天奖同志，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给我以极大的帮助。

在此，我对上述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粗疏挂漏和不妥之处，一定难免，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林家有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封面设计 刘俊民
书名题字 黄思源

统一书号 1110

定 价 0.56 元